

※ 研究動態 ※

當代中國大陸唐代文學研究述論

陳友冰*

五十年來的大陸唐代文學研究，走過了一條百轉千迴但又值得自慰自豪的歷程。五十年來研究道路之曲折，研究者精神之堅韌，研究觀念變化之巨大，研究手段之多樣和研究成果之豐碩，都堪稱空前。傅璇琮在回顧百年來古典文學研究歷程時說過一段充滿感情的話：「我們走過的這一百年，對於中國社會來說，也確是變化最巨大、最劇烈、最深刻的時期，對於學術研究者來說，也是最牽動感情的時期。上半個世紀有連續不斷的戰爭，下半個世紀的前三十年又有頻繁掀起的政治運動，這樣的社會環境對於學術發展所起的嚴重影響，可以留待一定的時間對此作歷史的估量。但是我們作為本世紀的人，確曾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學者，儘管身處逆境，歷盡坎坷，但仍不畏艱辛，以難以相信的毅力處於難以容忍的境遇，堅韌不拔地從事文化事業，寫出一篇篇、一本本專文、專著，為我們民族的文化積累作出可貴的貢獻。」^①唐代是中國古典文學中最輝煌的一個時段，唐代文學研究也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最活躍、最富有成果的一個領域，因而上述情況表現得更為集中、更為典型，而大陸近二十年來的唐代文學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更是百年以來前所未有的。概言之，大陸當代中國的唐代文學研究，五十年間基本上是兩種局面：前三十年，百轉千迴，步履維艱；後二十年，復甦漸進，成果漸豐。具體來說，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五清除與固守的交錯期；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停滯荒蕪期；一九七七至二〇〇〇活躍新變期。

* 陳友冰，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海峽兩岸唐宋文學研究交流中心主任。

① 傅璇琮：〈序〉，《百年學科沉思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1。

下面以此為框架加以述論。

清除與固守的交錯期 (1949-1965)

毛澤東對古典文學研究的態度方針乃至整個文藝政策，實際上在一九四二年前後就形成完整的體系，其標誌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只是局於當時地處延安的政治格局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中心目標，當時沒有可能在全國推行並形成廣泛的影響。直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個方針才得以真正執行。所謂清除，是指在指導思想上破除傳統的歷史文化觀念，執行「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②這個研究古典文學的總方針。做到「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一切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出發，讓學術研究為階級鬥爭服務，為當時的政治鬥爭服務。具體的判別標準有兩個：一是政治標準，即看這個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另一是藝術標準，即從社會效果上判別藝術水平的高低。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之間，又有個主次之分：「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③。在執行這兩個標準的實際過程中，「人民性」又往往被狹隘地理解為只有揭露封建黑暗，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才具有人民性，民歌、民謠、民間故事等民間文學才真正是中國古代文學的主流和代表：「不把民間文學放在文學的正統地位上就不能反映文學發展的真實面貌，也就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偽科學」^④，而藝術水平的高低也被簡單地規定為是否採用了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根據這一標準，白居易是「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而「從唐初的宮廷貴族文學、王維、孟浩然的隱逸田園詩派，一直到中晚唐的各種形式的唯美主義詩派，構成了唐詩發展中的反現實主義逆流」^⑤，一概應予否定和排斥，因為「內容愈反動的東西愈帶有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加以排斥」。就是對白居易，也要「一分為二」，他的「新樂府」、「秦中吟」等諷喻詩揭露了封建社會黑暗，應該肯定；而像《春寢》、《閒居》這類閒適詩，則是糟粕，必須

②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668。

③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頁826。

④ 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4。

⑤ 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頁212。

否定。

這種清除在古典文學（包括唐代文學）研究中所造成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因為它在形式上似乎在肯定人民在歷史上的主體地位，實際上卻否定了中國古典文學真正的創作主體——歷代文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否定了由他們所創作的、包括詠歌山水、歌頌友誼、愛情、忠誠、氣節、風骨等表現中華民族優美情操的一切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在民族傳統文化上張揚了一種虛無主義觀。正如唐代文學研究專家郁賢皓後來所指出的那樣，當時「一切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出發，認為封建社會的文學作品，絕大部分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都必須加以批判，只有極少數像『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反映階級矛盾和對立的作品，才予肯定，而大部分作家作品都遭貶抑」^⑥。

當時破除的動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來自歷次政治運動的壓力。從一九五一年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胡適唯心史觀起，經一九五二年批判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一九五九年「拔白旗、插紅旗」運動，包括古代文學研究在內的思想文化領域一直把上述標準作為衡量是非與謬誤，乃至革命與反動的界尺。這種接連不斷地運動迫使大批學者不斷地作自我批判或批判他人，對學術事業和人際關係造成了深重的傷害，而且用這種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方式來達到「推陳出新」的目的，會使學者喪失人格的自尊和學術的自信，這是更深重也是更永久的一種傷害。一開始，有的研究者接受這個標準可能是迫於形勢、是被動的接受，但年復一年、長期以往，也就變成了一種習慣，一種思維定勢。五十年代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學人，由於當時國門的封閉，「不知有漢，遑論魏晉」，更是把此當成天地之間唯一正確的標準和價值觀。另一種則是來自研究者發自內心的真誠。這批人或是投身於當時的解放運動，或是留在大陸未去海外。他們懷著對新中國的期待和美好未來的憧憬，也出於對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新鮮感，想去適應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並嘗試學習和運用這種新的觀念和方法，特別像「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等，聽起來讓人耳目一新。陸侃如、馮沅君於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在《文史哲》月刊上連載兩人合著的〈中國文學史稿〉。「史稿」即是根據「是否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來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同情人民疾苦」這一標準

^⑥ 郁賢皓：〈中國唐代文學研究述評〉，《南京師大學報》，1995年第4期。

來對作家作出評價。其「引言」和「結語」兩度歷舉中國歷代偉大作家名字，詩人中有白居易而無李白，劇作家中李玉而無王實甫。其原因就在於白的「秦中吟」和「新樂府」主題思想非常明確，主要是批評社會上、政治上種種不合理現象，特別對於統治階級的罪行予以無情的揭露。李玉則是因為他的《清忠譜》「直接取材於當時社會的現實生活，政治傾向性比較鮮明，鬥爭性比較強烈」，「表現著群眾抵抗人民公敵的戰鬥熱情」^⑦。今天看起來，也許會覺得不可理解，但在當時，確是這批學者很努力的嘗試。蕭滌非在一九五九年出了本古典文學論文集，書名卻叫《解放集》，以此來「紀念祖國解放第十周年」，扉頁有首詩，寫於一九五一年作者在北京「革命大學」結業之時，很能代表當時古代文學研究者上述的心態。詩題為《感謝黨的教育》，詩曰：「起死回生手，翻天覆地人。二年剛解放，萬事盡鮮新。廢鐵能成劍，熔爐大有神。我今從此去，服務為人民。」書中有篇專論，〈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六周年而作〉，題為〈堅持文藝為政治、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⑧，亦可看作當時的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五十年代大陸古典文學方面有幾次規模較大的討論，都是集中在如何學習運用上述標準來判定古代作家作品，如一九五三年展開的「怎樣看待和處理古典文學遺產」大討論，一九五六年前後進行的「中國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問題」大辯論，一九五七年前後進行的「古典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關係」的大討論，一九五八年前後進行的「中國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大討論等。馮至的〈我們怎樣看待和處理古代文學遺產——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光明日報》，1953年10月17日）；劉大杰〈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問題〉（《文藝報》，1956年16期）；譚丕模〈發掘古典文學的人民性、鬥爭性〉（《新中華》，14卷22期）；程千帆〈關於對待祖國文化遺產的幾個問題——對翦伯贊關於歷史人物評論中的若干問題異議〉（《文藝報》，1953年第4期）；詹安泰〈對我國目前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意見〉（《光明日報》，1956年6月）；余振生〈批駁詹安泰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非馬克思觀點〉（《光明日報》，1957年12月29日）；李澤厚〈評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一些錯誤觀點〉（《光明日報》，1955年4月10日）；冬尼〈對「評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一些錯誤觀點」的意見〉（《光明日報》，1955年

^⑦ 1957年改名為《中國文學史簡編》，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

^⑧ 蕭滌非：《解放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頁18。

8月21日)；萬雲駿〈試談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鬥爭的規律〉(《中國文學史討論集》)；向真〈對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問題的探索〉(《光明日報》，1960年8月21日)等，可作為當時的研究者轉換觀念、適應上述批評標準的努力。例如嚴敦易在〈論元雜劇〉一文中根據「人民性」這一原則，認為元雜劇是「蒙元統治王朝欣賞觀覽的，是宮廷承應的一個劇種」，因而它缺乏「強烈的人民性」，不能與農民的詞曲並論，因而不是精華而是糟粕^⑨。鄧紹基則從自己對「人民性」的理解出發著文予以反駁，認為「嚴敦易同志的這種錯誤，在於他沒有研究雜劇在具體歷史條件下的人民性，也沒有由此來分析最高統治者欣賞雜劇與人民喜愛雜劇兩者之間的出發點有所不同，因此也就不理解雜劇進入宮廷後並不就排斥它仍然有許多作品是人民所喜愛的東西……這種簡單化地把作品貼上宮廷標籤的做法正是庸俗社會學傾向的突出表現」，而「在古典文學研究中，我們除了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唯心主義的思想外，還必須反對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庸俗社會學傾向」^⑩。對上面提到的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文學史稿〉，余冠英就如何理解古代作品中的現實主義精神，以及是否一定要表現現實生活中的重大題材，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余冠英認為，「現實主義精神並非只表現於從現實生活取材，有些作品儘管寫的是理想事物、虛構世界，它的精神卻仍可以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比某些描寫現實生活的作品更現實」。另外，「作品是否描寫了社會上的重大事件或是否表現階級鬥爭，也不能作為衡量思想高低的唯一標準，作品的社會意義大小不能單從題材來看，要從經過藝術表現後的總效果來看」^⑪。另外，在一些特定的時段，如一九五六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的前後^⑫和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文藝八條」頒發之後，文藝創作和文學研究都產生過一個相對寬鬆的時期。對古典文學研究來說，此時的討論較為充分，也較為自由，而且可以說是真正學術意義上的討論，既不像五、六十年代通行的那種「打棍子」、「戴帽子」政治大批判，也不像時下的把學術討論會變成恭維捧場和商業炒作。如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初黃岑、向錦江等關於高中語文課本中古代文學教材的分量是輕了還是重了的討論；一九五六年五月至年底的劉射和徐澄宇關於

⑨ 《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78期。

⑩ 鄧紹基：〈反對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庸俗社會學傾向〉見《光明日報》，1956年4月15日。

⑪ 余冠英：〈反對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庸俗社會學傾向〉見《光明日報》，1956年4月15日。

⑫ 這一口號的提出是1957年2月，見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毛澤東論文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93。

〈評「樂府古詩」〉的批評和反批評；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二月郭沫若、江逢僧、憩之等關於《周頌》〈噫嘻篇〉的爭論；一九五七年一月前後俞平伯、任二北關於李白詞真偽之爭；一九五五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底吳穎、鄧魁英等關於李煜詞的評價之爭；一九六〇年底至一九六一年陳育德、曹濟平、葉秀山、林庚、羅方等關於山水詩階級性的討論；一九六一年底至一九六二年馬茂元、詹瑛、廖仲安、周振甫等對《文心雕龍·風骨篇》的不同理解；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關於李白一些問題的爭論等。這種爭論往往旗幟鮮明、針鋒相對。賈流有篇對曹操評價發表不同看法的文章，題為〈曹操的「人道主義精神」在哪裏——對評價曹操的一點意見〉（《解放日報》，1959年3月16日），郭豫適則發表一篇針鋒相對的文章〈曹操的「人道主義精神」在這裏——評復旦〈中國文學史〉對曹操的評價並與賈流同志商榷〉（《解放日報》，1959年3月16日）。據陳貽焮〈關於李白的討論〉（《光明日報》，1954年10月24日）介紹，當時北京大學中文系召開的關於林庚〈詩人李白〉討論會，不僅中文系的教師，研究文學的外系學者亦踴躍參加，大家自由發表意見，直率批評，既不為專業所限，也不為名人所畏，更不搞恭維捧場，這種嚴謹求實、自由率真又無芥蒂的學術討論風氣，一些「老北大」的學人至今談起來，仍緬懷不已。

必須指出的是，除上述的特定時段和少量文章外，這種破除或爭論往往過於生硬和簡單化，凡是不符合這個判斷標準的就要遭到否定和批判，甚至會變成對研究者政治傾向乃至政治身分的界定。例如，林庚在一九五八年寫了篇〈盛唐氣象〉，該文以磅礴的氣勢、邃密而又深厚的論證來證明唐詩無愧於那個時代，「盛唐氣象是一個具有時代性格的藝術形象」，「盛唐氣象所指的是詩歌中的蓬勃氣象，這蓬勃不只由於它發展的盛況，更重要的乃是一種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時代性格」^⑬。眼光的闊大、立論的純正和內在的熱情，四十多年後的今天讀起來仍讓人砰然心動，但當時卻被當成資產階級學者「歪曲社會本質來為自己的文學觀點服務」的「一個典型例子」^⑭，並在《北京大學學報》上受到點名批判。另一位唐詩研究者傅庚生〈說唐詩醇美〉（《光明日報》，1962年2月25日）發表後，馬上就有人站出來批判，說「醇美」，「這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美學家唱濫了的調子」，並由此推而廣之說：「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入，階級鬥爭表

⑬ 林庚：〈盛唐氣象〉，《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3期。

⑭ 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頁6。

現得特別尖銳複雜，這種階級鬥爭反映為意識形態領域內資產階級思想與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尤其表現得激烈尖銳。傅先生今天提出這種醇美標準，只能把人們引上歧途，絕不能讓它自由泛濫」¹⁵。作為反映當時時代主流的代表之作，當首推北京大學中文系一九五五級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和一九五七級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發展簡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62年）。

但是，中國畢竟有著幾千年的文明傳統，不為曲學阿世也畢竟是中國學人的傳統品格，所以在破除的主流之下，也有著抗拒和固守。其表現形態除了在個別時段、少數人身上表現為激烈的對抗和衝突之外，大多數是一種曲折、隱晦的形式。瞭解和承認這種形式，對體諒那一代學人的苦衷，正確認識他們的學術品格和成就，是很有幫助的。

第一、穿靴帶帽之法。文章的主幹保持作者原有的觀點，但開頭或結尾加上點人民性或現實主義之類的論說或批評。游國恩先生在六十年代初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用的即是此法。其唐代開頭部分的〈概說〉，強調杜甫的詩歌和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詩論，皆是繼承了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在最後的「小結」中，又再次強調了「人民性」。中國科學院「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唐代部分的第一章是這麼解釋「變文」產生的，這個時期，「由於帝王們變本加厲地宣揚佛教以愚弄人民，僧侶們就用說唱的形式對聽眾宣講佛理，產生了『變文』。後來逐漸加入歷史故事和現實生活內容，使『變文』從宗教迷信工具轉變為通俗的文學式」¹⁶。如果除去其中的「愚弄人民」、「變本加厲」、「宗教迷信」等政治術語，它對「變文」的產生、最初的傳播方式、內容以及世俗化的過程，還是作出了客觀的、符合原貌的論述。類似的情況還很多，如蕭滌非的《杜甫研究》在一九六二年出版時，作者寫了段「引言」，表示要「貫徹毛澤東文藝思想，遵循魯迅先生的有關教導」，把杜詩介紹給廣大勞動人民。林庚的《詩人李白》在一九五四年出版時，書前有個內容提要說：「作者對李白的認識，從過去『詩仙』、『雲端裏的詩人』等等脫離政治的概念中糾正過來；恢復了作為一個真正詩人的李白的原來面目。全書結合著

¹⁵ 李裕光：〈應當正確引導讀者鑒賞古典詩歌〉，《光明日報》「文學遺產」459期。

¹⁶ 中國科學院中國文學史編寫組：《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頁333。

盛唐時代的精神面貌、政治鬥爭、階級矛盾的發展，讓李白又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出現在古典詩壇上，成為那典型時代中最典型的詩人」。王士菁的《唐代詩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1964年再版）在當時是很有影響的一本唐詩通論。作者在書中的「引言」和「結束語」中以加著重號的形式強調以下幾句：「勞動人民創造了詩歌，詩歌永遠屬於人民」，「人民的生活和鬥爭是起直接作用最重要的因素，對待人民的生活和鬥爭所採取的態度如何，便是一切作家和他作品的試金石」，「歷代的封建統治者和封建文人，近代的資產階級和一些資產階級學者，他們企圖通過對於古典文學研究來為他們的反動階級政治服務；那麼，無產階級也就應該通過對於古典文學研究來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今天讀起來，也許覺得很奇怪，也有人據此對他們批評或揶揄，這實在是不瞭解當時的政治氣候和他們的苦衷。因為即便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文化大革命」前山雨欲來之際，這些論著皆無一例外地被當成「宣揚封建主義毒素」的典型而加以批判，游國恩本和中科院本的《中國文學史》仍被指責為「誇大了封建帝王的作用」，甚至追根求源，說是與「買辦資產階級文人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和封建文人劉昫的《舊唐書》一脈相承」；蕭滌非的「人民的詩人杜甫」的「人民」二字也被郭沫若詰責和揶揄。從這些批評者來說，他們倒是看的很準，並沒有「冤枉」這些論著——這些研究者並沒有把也不可能把「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這根紅線」貫穿到他們的論著之中，僅僅是穿靴戴帽式的表面文章，其基本觀點和結論依然故我，宛如一個紅皮白心的山芋。到了八十年代塵埃落定以後，蕭氏用「不堪回首」來形容當時的情景，很能代表這代學人當時的處境和心情。

第二，避開需要評論、分析作家思想和藝術觀點的作家作品論，從事古籍的校勘、整理。清代的《全唐詩》，計有功的《唐詩紀事》，趙殿成的《王右丞集》，王琦的《李太白集詳注》，仇兆鼇《杜少陵集詳注》以及《教坊記》、《本事詩》、《唐才子傳》等皆在此時再版。這當中又以一九五七年為界，分作前後兩個階段：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由當時的「文學古籍刊行社」出的唐人集僅五種：《孟浩然集》、《白香山集》、《杜少陵集詳注》、《白氏長慶集》、《元氏長慶集》，而且集中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這個時段。這五種古籍也只是在成本上影印或加以斷句，未作進一步的校勘和整理，可能是因為建國之初，百廢待興，還沒有顧及此事，也可能當時的學者有更感興趣的事要做。一九五七年以後，整理的古籍突然增多。從

這年起，北京、上海成立了專門的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又成立了古籍規劃小組，制定了「三至八年整理出版古籍重點規劃」，打算到一九六六年前後，整理出版古籍一千四百五十種，其中唐代詩文別集、年譜、筆記就近百種（這個計劃在一九六三年中斷）。在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這六年中，共出版了二十六種唐人詩文集和一部《全唐詩》。像中華書局排印的《皮子文藪》（1959）、《陳子昂集》（1962）。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校補排印的《柳河東集》（1958）、《唐人選唐詩十種》（1958）、《王建詩集》（1959）、錢仲聯編注的《韓昌黎詩繫年集釋》（1959）、《張司業集》（1959）、蕭滌非整理的《皮子文藪》（1959）、孫望點校的《元次山集》（1960）、《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1962）、《樊川詩集注》（1962）；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王仲聞校補的《南唐二主詞》（1957）、王重民編校的《敦煌變文集》（1957）、李一氓校的《花間集校》（1958）、華忱之校訂的《孟東野集》（1959）、向迪琮校訂的《韋莊集》（1960），文學古籍刊行社出版的顧學頡點校的《白氏長慶集》（1955）等，皆產生於一九五七年以後這個時段，個中曲折，不言自明。

再版古籍之外，還有一批學者專門從事古籍資料的集佚、集釋、編年、考證。如岑仲勉的《元和姓纂四校記》（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唐人行第錄》（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楊公驥《唐代民歌考釋及變化考論》（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年），陳友琴《古典文學研究資料·白居易卷》（中華書局，1962年），吳文治《古典文學研究資料·柳宗元卷》（中華書局，1964年），華文軒《古典文學研究資料·杜甫卷（上編，唐宋之部）》（中華書局，1964年），任半塘《敦煌曲校錄》（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年）、《唐戲弄》（作家出版社，1958年），周紹良《敦煌變文彙錄》（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王重民、向達《敦煌變文集》（商務印書館，1958年）等。這批考論、集釋，後來都成為大陸當代唐代文學研究的開山之作，這批研究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都被當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遭批判，幾乎無一倖免。

第三，在「為人民服務」和「面向工農群眾」的口號下，做一些唐代文學的知識傳播和普及工作。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古典文學專家鄭振鐸以文化部長的身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為做好古典文學的普及工作而努力〉，號召古典文學研究者到人民大會中去，將優秀的古代文學遺產向廣大工農兵普及。程千帆隨後在《長江日報》上撰文，談「把祖國優秀的文學遺產普及到人民群眾中去」的體會（

《長江日報》，1955年1月7日）。當時，一批有影響的學者皆在從事這種普及工作。其中有關唐代文學的，如喻守真的《唐詩三百首詳注》（中華書局，1957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的《唐詩一百首》（1959）、馬茂元《唐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王士菁的《唐代詩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陳貽焮《王維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王瑤的《李白》（華東人民出版社，1954年），林庚《詩人李白》（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舒蕪《李白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李白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劉開揚《杜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年）、繆鉞《杜甫》（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浦江清的《杜甫詩選》（1954）、馮至的《杜甫詩選》（作家出版社，1956年）、《杜甫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傅庚生《杜詩散譯》（東風文藝出版社，1958年）、陳邇冬《韓愈詩選》（1962年編定）、童第德《韓愈文選》（1962年編定）、顧易生的《柳宗元》（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范寧《白居易》（新知識出版社，1955年）、王拾遺《白居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陳友琴《白居易》（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年）、萬曼的《白居易傳》（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繆鉞《杜牧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等。這批學者自己動手選目作注，甚至親自去檢閱摘抄文獻資料，而不是像當今習慣的那樣由名人掛名，弟子或別人代勞。他們以自己幾十年的豐厚積累和精深的專業眼光厚積薄發，使這批深入淺出之作不僅成為唐代文學研究的普及型的豐碑，而且他們那種以親身實踐所樹立起來的嚴謹、求實、平易的學風對今人更有示導作用。如馬茂元的《唐詩選》，選者在選目時，從唐人的唐詩選本，到《唐宋詩醇》、《唐詩品彙》、《全唐詩》、《唐詩別裁》直至《唐詩三百首》，無不加以參酌，比較其得失損益，據趙昌平介紹，單是全唐詩，就反覆看了三遍，然後從兩千多個作者、五萬多首唐詩中選出七十二家，五百多首。其中不僅有王、孟、李、杜、韓、柳等大家歷來膾炙人口之作，像崔輔國、祖詠、常建、孟雲卿等中小家優秀之作也多有入圍，特別是選入了相當一部分在當時被視為不能反映現實鬥爭、階級意識薄弱的詠歌友誼、山水、愛情之作。選詩過程中，還並對來自山鄉兩位中學教師的意見表現出格外的尊重^①，這都表現了選者的眼光和品格。至於選詩的注釋和作者介紹，無不是選者幾十年治學的結晶，或是當時新的研

^① 趙昌平：〈前言〉，《唐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究成果的濃縮。如介紹崔輔國是吳郡人，曾官山陰尉，實際上是在糾辛文房《唐才子傳》作「山陰人」之誤；李頎籍貫，《新唐書》、《唐詩紀事》均無載，唯《唐才子傳》作「東川人」。選者在李頎詩注中指出，東川與頎詩《宋少府東溪泛舟》中的「東溪」，《晚歸東園》中的「東園」為同一地點，皆是指潁水之東，並非《唐才子傳》所說的蜀東。看來雖皆寥寥數語甚至僅數字，用的卻是獅子搏兔之力。三十年後，作為一個歷盡劫波的垂垂老人，對當年這段治學往事發了以下一番感慨：「當時，我還不到五十歲，自以為來日方長，在攀登學術高峰的漫長道路上，只要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向前走去，總會逐漸接近預想的目標，不斷達到新的境地的；沒有想到，等待著我的卻是一場絕滅文化的空前浩劫！」^⑧作者說的是感慨萬千，今日的讀者聽起來也不免有扼腕之歎。浦江清的《杜甫詩選》，萬曼的《白居易傳》其價值和後來的遭遇也與此相類。陳邇冬《韓愈詩選》的遭遇更曲折一些。選者以宋人魏仲舉《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為底本，又擔心「只是坊間本，不可靠，遂參以別本多種，或佳刻本，或手批本，定字擇善而從」^⑨，可見其治學上的謹嚴。謹嚴還表現在選詩時也不貪多，從現存的四百多首韓詩中僅選了九十多首，加上注釋、介紹和一萬五千多字的「序」，全書才十萬多字，另外也不求全，所選絕大部分是古體，近體只占很小部分，因為古體最能反映韓詩的風格和藝術成就，足見其選擇之精。其注釋不但參酌舊注，做到融會貫通，而且參以自己豐厚的學養，間有創見。就是如此優秀的一個選本，由於六十年代中期政治氣候的變化，一九六二年編成後即被擱置，直到二十年後，才「幸得好心的同志於廢棄的資料中找出」，於一九八二年出版，但此遭遇比起童第德來又屬不幸中之大幸，因為童的《韓愈文選》與陳的《韓愈詩選》幾乎是同時編選又遭同樣命運，但當一九八二年《韓愈文選》出版時，童早已去世，無法親睹自己的心血面世了。

由於時代的局限，這這個時期的普及本也帶有以下幾個明顯特點：

一是入選的唐代作家、作品大多被認為有「人民性」，是「揭露批判封建黑暗，進步傾向比較明顯」。像王維、李商隱等因被界定為「表現大地主階級的閒情逸致」或「唯美派詩人」的作家作品，即使是唐代乃至整個古代文學中的一流大家，也不可能列為入選對象。

^⑧ 馬茂元：〈後記〉，《晚照樓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⑨ 陳邇冬：〈後記〉，《韓愈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二是出版時間多在前面提及的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二年前後這個特定的時段，而且在隨後的「反右派」、「反右傾」、「插紅旗、拔白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政治運動中，無不作為「宣揚封建主義的大毒草」而加以重加撻伐，古代文學研究與當時政治的關聯，從中不難看出。如舒蕪的《李白詩選》於一九五四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七年舒蕪淪為右派，張鵬等人便著文對《李白詩選》全部否定和徹底清算。大概是人民太需要李白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在無奈之中，又於一九五九年組織復旦大學中文系部分教師和一九五六級部分學員重新編注了一本《李白詩選》。

三是這批普及讀物對當時人們瞭解唐代文學、熟悉唐代作家，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整整影響了兩代以上的人，甚至在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後那個傳統文化的真空階段，正是它們的再版和翻印即時填補了空白。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編輯出版的《杜甫研究論文集》一至三輯，一九六四年編輯出版的《李白研究論文集》（上下），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唐詩研究論文集》，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的《古典文學研究彙刊》，文學遺產編輯部編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學遺產選集》、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文學研究室編、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文學史討論集》則代表了那個時代唐詩乃至古典文學研究的陣容和總體水平。

停滯荒蕪期 (1966-1976)

此時的大陸，陷入了「文革」的十年動亂之中。

這個時期的唐代文學，從研究意義上來說，已全部停滯和荒廢。已出版的唐代文學總集、別集、箋注、年譜、傳論、選本，一律斥之為「封建主義大毒草」而加以焚毀，正在編輯的撤稿，已在排印的撤版。郭沫若當時就說，他過去的文章都可以付之一炬，為奉獻於「文革」祭壇率先做出了榜樣。但另一方面，在古代文學領域又有著畸形的繁榮，不僅《水滸》、《紅樓夢》行情看漲，就是唐代的某幾個作家作品也特別受到關注，不但介紹他們的文章連篇累牘，他們的作品也成百、十萬的印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

一是出自「文化大革命」發動者和領導者毛澤東的個人偏好。

毛澤東本人有著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他愛讀《明史》、《資治通鑑》、《容

齋隨筆》，詩歌中最喜愛李白（後又傳出喜歡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所以當時王琦、朱鶴齡、馮浩等人關於「三李」的注本一印再印，而且還出專供老人閱讀的「大字本」。

二是學界人物的趨奉和個人審美口味的放肆宣泄。

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自四十年代出版以來，一直有著很好的口碑，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劉氏卻要用「儒法鬥爭為主線」加以改寫，將「中國文學史」變成「儒法鬥爭史」，以適應當時「評法批儒」的政治需要，從而成爲「曲學阿世」的典型。

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也是在這個背景下推出。這本揚李抑杜的專著在體例上就很特別，沒有前言，沒有序跋，而以毛澤東關於「人民性」、階級鬥爭和批判「封建糟粕」的三段「毛主席語錄」作爲扉頁。在論述李、杜時則採用了兩種不同的體例，論述李白時用縱線：李白的出生地、李白的家世、政治活動的第一次大失敗，第二次大失敗，流放夜郎等；論述杜甫則用橫剖：杜甫的階級意識，杜甫的門閥觀念，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嗜酒終生。這種不同的論述體例形成了不同的論述重點，有意造成了兩人間的不可比性，這無疑是不公正的，有人就此論定郭氏的投機和善變，我想問題可能更複雜一些。無可諱言，這當中有趨奉的因素，但也有個人的審美偏好，甚至還有歷史的原因。李、杜優劣之爭，這是段古老的公案。從元稹的《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並序》開始，尊李與尊杜，代皆有之。但有意思的是：尊杜者往往抑李，尊李者並不抑杜，至多不過是李、杜並重，而且歷代的研究狀況又是千家注杜僅一家注李，郭沫若出於對這個研究傳統的不滿，也出於個人對李白的偏好，蓄意要翻這個歷史的舊案。更何況，郭氏一生，喜作翻案文章：替曹操翻案，替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翻案，甚至爲商紂王翻案，所以，在《李白與杜甫》中大做翻案文章，抑杜而揚李，對於他本人來說，並非善變，倒是一以貫之。他在一九六二年就說過：「唐代的幾個詩人，我比較喜歡李白，這是我的口味……對於杜甫，我就不大喜歡。」^{②①}一九六四年，他又批評杜甫在《秋興八首》中的情調^{②②}。問題在於他選擇了「文革」這樣一個特定的時機，文章中又缺少一個學者應有的客觀和理性，變成了一種個人愛好的放肆宣泄，甚至指名道姓

^{②①} 郭沫若：〈郭沫若談詩〉，《文藝報》，1962年第3期。

^{②②} 郭沫若：〈寥廓江天萬里霜〉，《光明日報》，1964年2月12日。

挖苦馮至、蕭滌非等杜詩研究者沒有讀過杜甫全集，這就有失學術品格了。

三是出於「文革」政治鬥爭的需要。

李白、柳宗元、劉禹錫，甚至從五十年代以來一直受奚落的李商隱這時都成了「法家」代表人物，成了歷史上批儒的正確路線的代表。因此，他們的全集選集，尤其是人物評傳，作品選讀出了很多。這類文章有三個特點：

其一是以某某寫作組、某某革命大批判戰鬥隊或集體化名的形式出現。名義上是為了不突出個人，顯示集體的力量，實際上亦含有虛張聲勢和逃避個人責任的因素在內。如當時很活躍的「梁效」就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大批判寫作組的諧音；上海「革命委員會」的寫作班子「羅思鼎」亦即當時的政治口號「做革命的齒輪和螺絲釘」的螺絲釘的諧音。

其二是大學師生走出校門，與基層群眾共同組成寫作班子。一方面顯示「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一方面體現「工農兵是評法批儒的主力軍」。如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出版的《柳宗元詩文選》，就是由「北京內燃機廠鑄工車間、鍛工車間工人理論組和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七二級」共同撰寫。廣東汕頭甘化廠工人理論組則和中山大學中文系組成「李商隱詩歌評論組」，來分析評論李商隱體現「法家思想」的詩作。

其三是口氣專斷，曲解史料，直接成為當時政治鬥爭的工具。如北京內燃機廠鑄工車間、鍛工車間工人理論組和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七二級編的《柳宗元詩文選》，居然認為：「柳宗元的著作，以政論文《封建論》最重要，它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尊法反儒的進步思想。」而「他的散文與詩歌，也大多對當時社會黑暗以及對孔孟之道有所揭露和批判」^②。在廣東汕頭甘化廠工人理論組和中山大學中文系的「李商隱詩歌評論組」的筆下，李商隱不再是頹廢的唯美主義詩人，而是「晚唐詩壇反分裂的鼓手」，就連他的纏綿傷感的《無題詩》，也成了「晚唐儒法鬥爭的一面三稜鏡」^③。梁效則把李商隱《無題》中的「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曲解成李商隱決心追隨被放逐到海南的法家代表人物李德裕^④，來為當

② 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七二級：〈出版說明〉，《柳宗元詩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

③ 廣東汕頭甘化廠工人理論組、中山大學中文系「李商隱詩歌評論組」：〈晚唐儒法鬥爭的一面三稜鏡〉，《中山大學學報》，1975年第6期。

④ 梁效：〈論李商隱的無題詩〉，《歷史研究》，1975年第2期。

時的「評法批儒」服務。

十年「文革」動亂對唐代文學乃至整個古代文學研究的破壞是極為巨大的。它不僅表現在大量的歷史文物被破壞、文獻資料被焚毀、有關古典文學的圖書報刊被迫中斷、研究領域的一片荒廢，而且這十年中斷所造成的學術空白，整整影響了兩代以上的學人。現在四、五十歲的古代文學研究者，當時正是確立學術思想和需要打好基本功的青少年。十年的政治動亂所造成的學術上荒蕪和思想上偏執，妨礙了他們今後學術上的泓通涵泳和學術功底的札實深厚。即使是今天已成爲博士生導師的一批學者，大家互相聊起來，也都感到學養的不足、功底的不厚和思想方法的呆滯。這當然又多少會對他們的學生及後輩學人產生影響。

活躍新變期 (1977-2000)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隨之而結束，一九七八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陸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唐代文學研究也由十年的荒蕪停頓開始復甦，從而進入活躍新變期。以唐詩研究而言，據統計：從一九七八至一九九八這二十年間，共出版各類有關唐詩的著作近千種（還不包括文學通史、通論、綜論、總集中的唐代文學部分），論文萬餘篇。其中點校出版的唐人別集、合集或重印清以前學者的唐人詩集箋注本近一百種。如果說二十世紀的唐代文學研究是歷代中觀念變化最大、研究手段最多樣、研究成果最豐富的一個世紀，那麼對大陸的唐代文學研究來說，近二十年又是這個世紀中變化更巨、成果更豐的一個時期。從時段劃分來說，它具體可以分爲三個階段：一九七七至一九八〇爲復甦期；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九爲活躍新變期；一九九〇至二〇〇〇爲沉思縱深期。

一、復甦期 (1977-1980)

唐代文學研究在此時段重新起步，主要出現以下幾種變化：

一是撥亂反正。恢復柳宗元、李白、杜甫、劉禹錫、李商隱等人的本來面貌，但此時的恢復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評法批儒」的反批判，稱之爲「肅清四人幫流毒」，還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本體研究。如尤振中、秦兆基〈利用古典詩歌反黨的鐵證——評梁效、聞軍〈論李商隱無題詩〉〉（《江蘇師院學報》，1977年第3期）胡念貽的〈駁所謂「儒法鬥爭是中國文學史主線論」〉（《文藝論叢》，

1978年第5期)，牟世金〈評新版中國文學發展史〉（《文學評論》，1978年第2期），蕭滌非〈關於「李白與杜甫」〉（《新華月報》，1979年第9期），劉世南〈對《李白與杜甫》的幾點意見〉（《文史哲》，1979年5月號）等，主要是對文革中的研究方向、研究觀念乃至研究態度進行糾偏，至於作家的本事考證、詩意探究、風格析論，作家群體研究和文學思潮的宏觀把握，對大多數研究者來說，此時還未開始。

二是將因「文革」而被擱置的普及讀物以及「文革」前的論著，出版或再版。前者如詹鐸的《唐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錢冬父《唐宋古文運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胡雲翼《唐宋詞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劉國盈《韓愈》（中華書局，1980年）等。後者如夏承燾的《唐宋詞選》（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1981年重印），張友鶴《唐宋傳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重印），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李白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1977年修改再版），傅庚生《杜詩散譯》（東風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陝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再版）等。此時的思維方式和用語習慣還沒有完全擺脫「文革」陰影，就連作者也仍常常是文革中常見的集體署名，如署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唐詩選》，署名徐州師範學院中文系的《劉禹錫詩文選注》，署名武漢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的《新選唐詩三百首》等。

三是個別的研究專著開始出現，如繆鉞的《杜牧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陳貽焮《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劉開揚的《唐詩研究論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等。這批專著多是六十年代完成，因文化大革命而擱置，出版時又添加了一些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如劉開揚的《唐詩研究論文集》，初版於一九六一年，收作者一九五六年以來唐代作家的單篇論文七篇，一九八〇年再版時增加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四年論文九篇，只有〈論柳宗元的詩〉等三篇是七十年代末寫的。繆鉞的《杜牧傳》是在其《杜牧年譜》的基礎上拓展而成，用力頗深。該書一九六四年即定稿，因「文革」延至一九七九年方出版。作者在「後記」中強調「寫傳記，應當學習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對傳主生平加以描述論斷。我對於杜牧的事跡及其作品，雖然曾經用過些工夫，但是學習理論很不夠」，明顯帶有六十年代思想改造的痕跡。萬曼的《唐集敘錄》（中華書局，1980年）和夏承燾的《唐宋詞人年譜》（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情況也類似。

此時，有兩本專著開風氣之先，對後來的唐代文學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一本是傅璇琮的《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1980年），另一是程千帆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傅著對唐代二十七位以中小為主的詩人生平、交遊作出考訂，其中像司空曙、戴叔倫等過去很少有人觸及。這本著作的價值不僅在於資料豐富、論證周延，填補了文學史上的一些空白，更主要的是在於以下三點：一是糾正了一種研究偏向，指示了一個新的研究範式。我們知道在五、六十年代，大曆詩人是作為盛唐精神的倒退、形式主義的代表而被否定的，《叢考》中對大曆時期的詩人卻用力最多，這是作者有意在糾偏，因為「過去對大曆時期的詩歌研究是不夠的，一說到大曆詩風，往往作為形式主義加以批判，這樣作未免簡單化」²⁵。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研究者們對大曆詩人的關注，研究他們的行年、作品，衡估他們在盛、中唐詩風轉變中的地位和作用，直至出現像蔣寅等人的《大曆詩風》、《大曆詩人研究》和〈論天寶至大曆間詩歌藝術的漸變〉這樣有份量的論著，與傅在該書中的倡導不無關係。二是在該書的「前言」中作出了一種新研究體式的設想：「以某一發展階段為單元」，來敘述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群眾生活和風俗特色，並將作家的交遊、行為、創作逐年編排於其中，以此來探討文學興衰的規律，從最闊大的視野來考察時代社會對文學的影響。二十年後，傅氏的這一設想變成了現實，一九九八年，他主編的《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問世，從而在理論和實踐上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範式。三是倡導一種新的研究手段。作者有意識地運用丹納的地域學說和詩人群體理論，「從文學藝術的整體出發」，通過札實的考證論證了這批中小作家在唐代時代精神和詩歌風格形成中的作用，首開了群體研究之風。這在幾十年的國門封閉和十年的極左思潮以後，當然會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從此「叢考」式的群體研究成為大陸學人頗為看重的一種研究方式，繼之者有陳尚君的《唐代文學叢考》，吳在慶的《唐代文史叢考》，譚優學的《唐詩人行年考》、《唐詩人行年考續編》，王達津《唐詩叢考》等。

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的價值同樣不限於資料搜羅的豐富和考證的精當（如書中對主司與通榜、制科與常科、進士與明經、省卷與行卷等皆有細密的考證，並對前人之誤多有訂正），更為重要的是，他倡導了一種研究唐代文學的新的

²⁵ 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5。

思維方式，開啓了在廣闊文化背景下研究唐詩的先河。全書以大量篇幅從行卷的制度、歷史和文化背景等方面，討論了行卷與唐代文學發展的關係，並以詩歌、古文、傳奇這三種唐代文學的主要樣式來加以論證。研究唐詩要有廣博的知識背景，這也是程千帆的一貫主張。在此以後，傅璇琮的《唐代科舉與文學》；王小盾的《隋唐五代燕樂雜曲歌辭研究》、《唐代酒令藝術》；戴偉華《唐代幕府與文學》；孫昌武《唐代文人的維摩信仰》；葛曉音《論盛唐文人的干謁方式》；黃正健《韓愈日常生活研究》等都是在沿著這個方向探索。

二、活躍新變期(1981-1989)

這個階段的唐代文學研究，在學術機構的建立、學術活動的開展，學術刊物的發行，研究範圍的拓展以及學術思想、研究手段等方面，與七十年代以前相比，都呈現一種飛速變化和極為活躍的狀態。

1. 普及讀物的大量湧現

經過了十年的「文革」饑渴後，此時古典文學的普及讀物大量湧現。唐代文學方面以唐詩的選本和鑑賞類為多，其中又以唐人絕句的選本，唐詩鑑賞辭典為最多，每類都在三、四種以上，最多的達到十種以上。例如同是以《唐詩鑑賞辭典》為名的就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程千帆主編的《唐詩鑑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蕭滌非主編的《唐詩鑑賞辭典》，四川又有周嘯天主編的《唐詩鑑賞辭典續編》，潘百濟等人的《全唐詩精華分類鑑賞集成》和宋緒連等人的《唐詩藝術鑑賞辭典》等。至於絕句選本，除了將俞平伯、劉永濟、沈祖棻等人的早年選本一版再版外，又有孫琴安《唐人絕句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劉學鍇等《唐代絕句賞析》（正編、續編）（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尹賢《唐詩絕句選講》（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蔡啓倫《唐代絕句選》（山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姚奠中《唐宋絕句選注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大陸的一百多家教育、文藝類出版社，此時幾乎家家翻印或新選、新注《唐詩三百首》，如馬茂元、趙昌平《唐詩三百首新編》（嶽麓書社，1985年）、吳紹烈《唐詩三百首注疏》（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辛燮《唐詩三百首注疏》（浙江文藝出版社，1982年）、齊魯書社《唐詩三百首解析》（1982年）、金性堯《唐詩三百首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陶今雁《唐詩三百首評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等。

出版數量當然反映社會需求。普及的唐詩讀物在八十年代初的大陸大量印行，一方面反映了經過了十年「文革」的乾涸後，包括知識界在內的社會大眾對優秀的傳統文化的渴求；另一方面，普及讀物的大量需求又刺激出版社大量組織和出版作品鑑賞、鑑賞詞典、選讀、注析之類的普及讀物，造成此類出版物的重複和撞車，也吸引一部分研究者為利益所驅動去作這種低層次的重複而不去做深入的課題，一些精品也因此面臨出版難的尷尬局面。這是造成八十年代後期唐代文學出版物中凡品與精品、普及與提高比例失調，九十年代以來唐代文學研究在某些領域老是徘徊難以深入的原因之一。

2. 古籍整理成果豐碩

這是大陸唐代文學研究的優點，這種優點在八十年代開始得以充分顯露。

一是影印或整理、點校古本唐人總集和別集。影印中較著名的如清人董浩的《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唐五十家詩集》和《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高棅的《唐詩評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中華書局的「古小說叢刊」中的《大唐新語》，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開元天寶遺事十種》、《玄怪錄·續玄怪錄》等。點校整理中對選本要求更精、更注意匯集各本之長，也更注意系統性。古籍出版的南北兩重鎮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對唐人別集出版分別作了系統的規劃。中華書局編輯了一套《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其中唐代部分的如劉學鍇、余恕誠的《李商隱詩集解》，顧學頡點校的《白居易集》，徐明霞點校的《盧照鄰集、楊炯集》，劉開揚校注的《高適詩集編年箋注》，雍文華點校的《羅隱集》等。影印了《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這是現存宋本中規模最大的唐人集，包括駱賓王集、李太白集等二十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則分別針對唐代的大家和中、小家出了兩套叢書：一是收集大家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其中的唐代部分如瞿蛻園、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朱金城的《白居易集箋校》；瞿蛻園的《劉禹錫集箋證》；李嘉年《長江集新校》；陳鐵民、侯忠義的《岑參集校注》；蔣凡、儲大泓點校的《李賀詩集集注》；陳允吉點校的《樊川文集》；孫欽善點校的《高適詩校注》等。另一是「唐詩小集」，專門選擇唐代詩人中作品流傳不多，但在思想藝術上又別具一格的中小詩人如王績、杜審言、賀知章、錢起、王之渙、盧綸等，或一人一冊，或幾人合成一冊，在五年內

出版了三十多位作家小集，儘管其中良莠不齊，但對開拓唐詩的研究領域，當時還是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除了上面的兩家出版社外，一批質量較高的箋注或集注本也在全國陸續面世，其中像張蓬舟的《薛濤詩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詹鏞主持的《李白全集編年校注》、彭慶生的《陳子昂詩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華鍾彥《花間詞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周勛初《唐語林校正》（中華書局，1986年）、徐鵬的《孟浩然詩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任國緒的《盧照鄰集編年箋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

二是對前人的資料進行考證、輯補、彙編、索引。輯補方面的如王重民的《全唐詩外編》（全二冊）（中華書局，1982年）、孫望的《全唐詩補逸》、童千養的《全唐詩續補遺》；考證方面如岑仲勉的《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譚優學《唐詩人行年考》、《唐詩人行年考》（續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7年）；童第德的《韓集校註》（中華書局，1985年）；程千帆《古詩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吳企明的《唐音質疑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王達津《唐詩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郁賢皓的《李白叢考》（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唐刺史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李從軍《李白考異錄》（齊魯書社，1986年）；傅璇琮主編的《唐才子傳校箋》（中華書局，1987年、1989年）等。資料索引和彙編方面有傅璇琮等的《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中華書局，1982年）、河南大學唐詩研究室的《全唐詩重篇索引》（河南大學出版社，1985年）、《全唐詩人名索引》（中華書局，1982年）、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隋唐史研究室《隋唐五代史論著目錄》（1900-1981）（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馬緒傳《全唐文篇名目錄及作者索引》（中華書局，1984年）、劉進寶《敦煌學論著目錄》（1909-1983）（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主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著述資料目錄索引》（陝西社會科學院，1985年）、張萬起的《新舊唐書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李慶甲輯評點校的《瀛奎律髓彙評》（上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吉聯抗輯譯《隋唐五代音樂史料》（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周采泉《杜集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鄭慶篤等《杜集書目提

要》（齊魯書社，1986年）、孫琴安《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如此大量的前驅性和基礎性工作，為八十年代唐代文學研究活躍和新變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3. 一批重要的傳論、專論、通論開始出現

隨著資料彙編、作品編年、箋證的問世，年譜、評傳也隨之而來。此間比較重要的有：王拾遺《元稹傳》（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白居易傳》（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傅璇琮《李德裕年譜》（齊魯書社，1984年）；金啓華《杜甫評傳》（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董乃斌《李商隱傳》（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盧渝《王維傳》（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劉光裕《柳宗元新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左雲霖《高適傳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楊柳《駱賓王評傳》（北京出版社，1987年）；陳貽焮《杜甫評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另一類就是專論、通論。反映出研究者眼光和深度的專著有：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陳幼石《韓柳歐蘇古文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馬茂元《晚照樓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任半塘《唐戲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唐聲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閻琦《韓詩論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安旗《李白縱橫談》（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嶽麓書社，1984年）；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4年）；姜亮夫《唐宋詩論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吳孟複《唐宋古文八大家概述》（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祖保泉《司空圖詩品理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唐圭璋、潘君昭《唐宋詞學論集》（齊魯書社，1985年）；屈守元、卞孝萱《劉禹錫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鄧紹基《杜詩別解》；何法周《韓愈新論》（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吳熊和《唐宋詞通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等。

4. 研究方法上開始新的嘗試

隨著此時國門的打開和一些西方新學科和研究方法的引進，有的研究者開始不

滿足於單一的作家作品論以及考據、箋證、年譜、輯佚等傳統的研究方式，符號學、語義學、接受美學、文藝心理學、結構主義、審美發生學等新學科，比較研究、文本分析、心理分析、定量分析、範式論、系統論等一些新方法在研究者對此缺乏充分瞭解，整個社會心理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匆匆進入唐代文學乃至整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一九八三年七月，《文學遺產》、《文學評論》、《語文導報》、《天府新論》等幾家有影響的或前衛的刊物在杭州聯合召開「中國古典文學宏觀研究討論會」，可以說是這個時期方法論上一次集中的檢討和探索。會上把「宏觀研究」的對象分為「特徵研究」、「規律研究」、「關係研究」三大類，並探討了以心理分析、比較文學、系統論、結構主義等新方法來研究古代文學的可行性。這次大型的新方法研討，儘管存在著理論準備不足、運用上沒有很好地消化吸收等弊端，但它發生在國門幾十年封閉之後的思想解放之初，至少是敢於進行嘗試的理論勇氣還是值得肯定的。同時，它對拓展研究者的視野和採用新方法的興趣，也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八十年代躋身於唐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些年輕學者，如董乃斌、傅紹良、程國賦、蔣寅等人，就是以他們採用新視角或新方法的論著，從而奠定了他們在唐代文學中的研究方向和學術地位的。

自八十年代初，一批運用新學科和新方法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開始出現，其中以運用比較文學、文化詮釋學和當時稱為「新三論」^{②⑥}中的系統論相對多一些。一九七九年，錢鍾書的四卷本《管錐篇》問世。錢氏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運用西方文藝理論來闡釋中國古代文學。其中涉及語義學、符號學、風格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多種西方學科，其中運用得最多的是比較研究的方法，故在此之後大陸掀起了一股比較文學熱。一九八三年六月，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外語學院等共同發起召開了全國第一屆比較文學研討會，十九個省市一百四十多位學者出席了會議，會後出版了《比較文學論文集》（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其中關涉唐代文學的論文有朱維之的〈禪與詩人宗教〉，曹順慶的〈「狂迷說」與「妙悟說」〉等。一九八五年十月，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在深圳大學召開成立大會，季羨林在開幕詞中強調只有把東方文學真正納入比較文學的研究範圍，才能開闊視野^{②⑦}。北京大學從一九八二年起陸續出了一套「比較文學研究叢書」，上海外語學

②⑥ 當時的新三論指信息論、系統論和耗散結構論。

②⑦ 《中國比較文學年鑑 1986》。

院創辦了《比較文學》季刊，內有不少有關唐代文學比較的論著。散見於其他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有陳允吉的〈從《歡喜國王緣》變文看〈長恨歌〉故事構成〉（《復旦學報》，1985年第3期）；方平〈楊貴妃與埃及女王形象比較〉；（《文藝研究》，1985年第2期）；楊鐵源〈李白詩歌崇高美與西方藝術崇高美比較〉（《求索》，1983年第3期）等。與文藝美學研究相結合的如蕭馳的〈中國詩歌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王明居的《唐詩美學》（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陳銘《唐詩美學論稿》（中州古籍社，1987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東方文藝美學叢書」中的李元洛《詩美學》（1987）等。單篇論文有陶文鵬〈論孟浩然的詩歌美學觀〉（《文學評論》，1984年第1期）、〈論王維的美學思想〉（《美學》第五期）、金學智〈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音樂美——兼談白居易的音樂美學思想〉（《學術月刊》，1985年第7期）、麻守中〈中國古代詩歌體裁的美學特徵〉（《齊齊哈爾師院學報》，1988年第6期）等。八十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花城出版社合編了一套「開放叢書」，運用系統論、符號學等新學科、新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如林崗的《符號、心理、文學》（花城出版社，1986年），楊春時《審美意識系統》，楊匡漢《繆斯的空間》（同上）等。單篇論文方面運用系統論的如喬先知〈有關廣義文學系統論系列論文之一：從比較文學角度看中國文學的特質和規律〉、〈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系統原則〉等；運用資訊理論的有趙景波〈論中國古典詩歌潛在的信息系統〉（《齊齊哈爾師院學報》，1985年第2期）等；運用範式論的有王一川〈從「詩言志」看中國詩的原始模式〉（《文史知識》，1986年第1期）等。

對於八十年代新方法的引進和運用，在塵埃落定以後，基本上有兩種評價：一種是認為所謂運用新方法只不過是「套用新方法，濫用新名詞，以文飾其淺陋」，而且敗壞了研究風氣，「以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學界有一部分人，仍熱衷於撰寫虛空、浮泛，徒有方法之新穎，而無突破之實質的文章」。這部分學者認為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必須立足於經過千年歷史考驗的傳統治學方法，不必盲目崇洋」。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前些年的新方法熱雖負面影響較大，但傳統的研究方法也必須變化，必須尋找新的研究方法才能適應世紀的新變。他們認為，長期以來，我們很大一部分的唐代文學研究論著觀點內容重複、論點相似、手法陳舊，在低水平上徘徊而無實質性的突破，這正說明我們的研究者是多麼需要更新觀念、改變研究思路和手法，「而域外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正好可以使我們打破學界封閉多年後形

成的千篇一律的研究模式，可以為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注入新鮮的血液，使之生生不息，亙古常新」^②。

5. 組織上的整合與導向

在這方面，唐代文學學會及李白、杜甫、韓愈等研究會以及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起了不小的作用。唐代文學學會於一九八二年五月在西安成立，使大陸的唐代文學研究者得以結成一個方隊，集中對一些問題進行研究和探討，或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一些課題。該會每兩年召開一次年會，至今已開了十次。年會除了集中展示兩年來大陸唐代文學研究成果外，還就一些問題集中進行探討和交流。如在蘭州召開的第二屆年會即以邊塞詩討論為重點，並組織考察了河西走廊和敦煌遺址；在洛陽召開的第三屆年會著重討論了白居易和新樂府運動，唐代文學與洛陽的關係；在太原召開的第四屆年會則討論了唐代的山西作家以及學會如何組織人力完成一些唐代文學研究中的重大課題。在南京召開的第五屆年會是首屆唐代文學國際學會討論會，因此著重安排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學者介紹本國、本地區的唐代文學研究情況。在廈門召開的第六屆年會則關注《全唐五代詩》和《全唐五代文》的編纂情況，並對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等大家展開了較為充分的討論。在浙江新昌、紹興召開的第七屆年會則實際考察了「唐詩之路」。在西安召開的第八屆年會主要介紹唐代文學學會的各分會和兩個會刊的活動及編輯出版情況並考察了西安一帶的唐代文化遺址。在貴陽召開的第九屆年會，主要就本世紀以來唐代文學的研究成果進行回顧、總結和評價，並對唐代文學的研究方法和方向進行了探討和展望。二〇〇〇年十月在武漢召開的第十屆年會，著重討論了如何加強唐代文學研究的海外和國際交流，以及在跨入新世紀之際，古典文學研究如何適應資訊時代的新變化和新要求。至於李白、杜甫等研究會，亦分別就李白出生地、入長安問題、杜甫在湖湘、杜甫夔州詩，柳宗元與柳州，韓愈與潮州等都專門開過研討會。大陸的唐代文學研究隊伍是學界公認的團結狀況較好、出成果最多的一支研究隊伍，學會及其活動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② 杜曉勤：〈關於唐代文學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9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69。

唐代文學學會有兩個出版物，一是與陝西師大文研所（1989年後又加上廣西師大出版社）合編的《唐代文學研究年鑑》，一九八三年以來每年一本（有時是兩年合刊），介紹唐代文學一年以來的研究情況，設有「紀事」、「研究情況綜述」、「論文摘要」、「新書選評」、「國外研究動態」、「論文論著索引」等欄目，八十年代共出版了六輯，二百四十多萬字。（到二〇〇〇年共出了十二輯，四百五十八萬字）。另一是與西北大學合辦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代文學論叢》（一九八八年以後改稱《唐代文學研究》，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主要刊登唐代文學方面的論文，八十年代共出版了十一輯，刊載各類文稿四百五十多篇，近三百萬字。（到二〇〇〇年共出了十七輯，近八百萬字）。像這樣系統的出版本學科論文集，十幾年堅持不斷的，學會出版物中到目前為止也僅此一種。一些負有使命感的專家學者通過學會的年會或刊物，發表他們對唐代文學研究現狀、發展趨勢的思考和建議，對唐代文學研究的健康發展起著保證和導向的作用。例如在如何研究唐詩這個問題上，程千帆認為研究者首先要有豐厚的文化積累，他在〈唐代文學研究年鑑〉創刊號上對新一代唐詩研究者提了「五點希望」，第一點就是「不要使自己的知識領域過於狹隘，而是應當在盡可能廣闊的範圍內去吸取營養，充實自己……研究文學而不管當時其他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例如政治、經濟、軍事、宗教、藝術、社會風俗、中外交通，就必然會限制自己的成就」²⁹。王運熙則針對唐代文學研究中唐詩研究與散文研究的不平衡，在一九九五年的年鑑「筆談」上提出要「多研究一點唐代散文」；程千帆在第三屆年會的開幕詞中也發出類似的呼籲。馬茂元則針對性地批評了當時唐代文學研究中的低層次重複和浮泛之風：「一些內容基本相同的普及性讀物，則由於地方各自為政，各不相謀，又不免疊床架屋，重複出版；報刊上發表的湊熱鬧、趕浪頭、並無真知灼見的論述或評介文章，上述情況，也往往有之」³⁰。在唐詩的研究方向上，吳汝煜呼籲「要向中小作家擴展」，陳伯海則提議加強「唐詩理論體系建設」。董乃斌和吳企明則分別就重視對作家的心靈研究和研究方法的多樣化發出倡導³¹。在這方面，傅璇琮的思考和建議更充分一

²⁹ 程千帆：〈五點希望〉，《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84》（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

³⁰ 馬茂元：〈希望與祝願〉，《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83》，（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³¹ 董乃斌、吳企明：〈小議唐詩學理論體系的建設〉，《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84》，頁5。

些。一九八三年他對《唐代文學年鑑》的總體規劃提出四點設想：針對當時唐代文學研究的迅速發展，「應當抓住研究的新的趨向，如實地及時地 把他們反映出來」；建立資料館，蒐集國內外唐代文學方面的研究資料；創立唐代文學研究史；「充分注意、重視中青年研究者所作的努力，對他們近些年來的貢獻和成就要有充分的估計」^⑳。在第四屆年會的閉幕詞中，又針對當時在運用新方法上的爭論，提出「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只要真正下工夫進行研究，都會有所收穫。由於各種原因，有的同志可能偏重於宏觀研究，有的同志可能偏重於微觀研究，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存在，正是我們古典文學研究較過去充滿生氣的表現。不言而喻，無論宏觀或微觀，對我們大家都是需要的，應當互相補充、互相配合，而不應當互相排斥、互相歧視」^㉑。

6. 敦煌文學研究有新的進展

一九〇〇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在其後不到十年的時間內，洞內四萬多件敦煌遺書中一些有價值的寫本幾乎被英、法、俄、日、美等一些探險家洗劫殆盡，國內所藏雖達萬卷，但多為殘缺不全的佛道經典。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國際漢學界產生了以研究敦煌文物為對象的敦煌學，敦煌文學研究則是其分支，以敦煌遺書中的文學作品為對象。與唐代文學研究有關的是保存於其中的敦煌曲子詞和散見於佛道典籍中的隋唐五代詩歌、散文與小說。我國的敦煌文學研究始於二十年代羅振玉、劉復、許國霖等人。羅振玉的《敦煌拾零》、劉復的《敦煌掇瑣》、許國霖的《敦煌雜錄》率先對洞內的變文、詩歌、曲子詞的殘卷進行輯錄整理。五、六十年代的敦煌文學研究主要是彙集、校錄、整理，先後出版了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詞集》、《敦煌變文集》；任二北《敦煌曲校錄》；周紹良《敦煌變文彙錄》以及張次青的《敦煌曲校臆補》、蔣禮鴻《敦煌詞校議》等。六十年代初，通過國際交流，得到了英國所藏的敦煌文獻的微縮膠卷，大大豐富了敦煌研究資料。一九六二年，王重民、劉銘恕等合編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出版，它包括北京圖書館所藏的敦煌遺書簡目、斯坦因劫經錄、伯希和劫經錄、敦煌遺書散錄四個部份，至今

^⑳ 傅璇琮：〈年鑑工作要有一個總體規劃〉，《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84》，頁 20。

^㉑ 傅璇琮：〈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四次學術討論會閉幕詞〉，《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89、1990 合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6。

仍是大陸敦煌研究者必備的工具書。經過「文革」十年荒蕪以後，從七十年代末起，敦煌文學研究又重新起步：一九八三年秋在蘭州召開了「文革」後全國首屆敦煌學術討論會；一九八四年十月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成立。自一九八三年以來，敦煌研究院先後舉辦了五次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敦煌吐魯番學會舉辦了六次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創辦了研究敦煌學的專門刊物《敦煌研究》和《敦煌學輯刊》，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和甘肅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室還編印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通訊》和《敦煌文學研究情況交流》，為敦煌研究做資訊傳遞和聯絡工作。此時大陸的敦煌文學研究在五、六十年代彙集、校錄、整理敦煌殘卷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整理，從而更加系統、更加全面。八十年代彙集整理出版的敦煌文學研究資料和工具書有敦煌研究院資料中心〈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敦煌文獻資料分類類目表〉（《敦煌研究》，1987年第8期）、顏廷亮《敦煌歌辭研究論著彙錄》（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高國藩〈國外敦煌學研究概述〉（《中國史研究動態》，1986年第4期）、盧善煥〈我國台港地區敦煌學著述資料初目〉（上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通訊》84.2；84.3）、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敦煌研究院《敦煌藝術叢書》（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年）、北京大學古代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四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武漢大學歷史系《吐魯番出土文書（八冊）》（文物出版社，1987年）、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臺灣木鐸出版社，1982年）。周勛初、陳尚君、李時人、李劍國等則為了各自的學術著作《唐人軼事彙編》、《新編全唐詩》、《全唐五代小說》和《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把目光投向敦煌寫卷，從中搜尋新的資料，也使敦煌文學研究出現一個新的角度。更重要的是從八十年代起，敦煌文學研究開始從早期的原始資料整理轉向結合現存的歷史文獻，進行深層次的、綜合性的研究前面已提及的任二北的《唐聲詩》和王小盾《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即是代表。從文學研究而言，其成就具體表現在對敦煌曲子詞、詩歌、變文、故事賦以及敦煌文學的綜論和敦煌學研究等方面：

敦煌文學綜論、敦煌學研究 姜亮夫的《敦煌學概論》（中華書局，1985年）是八十年代第一部關於敦煌學的專著，他對敦煌文學的範圍、性質、特點作出界定，對素有爭議的「變文」定義和內涵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並對敦煌學研究史作了線條式的勾勒。張錫厚的《敦煌文學》（1980）則是大陸第一本全面介紹敦煌文

學的普及讀物。許維的《敦煌傳奇》（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則更帶有文學色彩。柴劍虹《敦煌吐魯番學論稿》內收集有作者近年來有關敦煌文學的多篇論文。張鴻勛〈試論敦煌文學的範圍、性質和特點〉則是八十年代最早的一篇關於敦煌文學的專論。作者對什麼是敦煌文學，那些作品才算敦煌文學作品作出以下鑑定：「所謂敦煌文學，是指保存在敦煌遺書內，唐五代時期在敦煌地區流行，表現普通人的生活、思想、願望和要求，而且採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民間通俗文藝形式，以詩文、曲子詞、俚曲小調、講唱故事為主體的文學作品，以及少數長期失傳、僅在敦煌遺書中發現的某些文人的詩文作品」；敦煌文學性質十分複雜，但基本上屬於俗文學的範圍，更多地反映市民的情緒和要求。作者認為：敦煌地處中外交通樞紐、既與中原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又受外來文化和佛教思想的影響，高國藩《敦煌民俗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從民俗學角度探討敦煌文學與民俗的關係及其價值，是造成這種複雜性的主要原因。敦煌文學綜論方面有姜亮夫的《敦煌學論集》（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反映了作者在敦煌學研究上資料搜集、校理、考辨、析論方面的綜合成果；王慶菽的《敦煌文學論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87年）則集中在對曲子詞和變文的研究上。另外還有王重民的《敦煌遺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4年）、敦煌研究院編的《敦煌研究（三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甘肅社科院編的《敦煌學論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編的《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

敦煌曲子詞研究 八十年代以來這方面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資料收集整理更為全面、系統。任二北在五十年代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一九七二年起，即開始著手編集《敦煌歌詞總編》，一九八七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書分為七卷，共收歌詞一千二百二十一首，比作者一九五五年出版的《敦煌曲校錄》收錄的五百四十五首多了一倍多。堪稱本世紀蒐羅最富帶有集大成意義的一部敦煌歌詞總匯。儘管《敦煌歌詞總編》所錄不限於「曲子詞」一體，而且其中有的作品是否屬於「歌辭」也還存在爭議，但「它為本世紀敦煌曲子詞的甄選、考辨、輯錄提供了一個更為廣博、更為堅實的文獻基礎，其價值和意義是不可忽視的」^④。周紹良的〈補敦煌曲子詞〉（《敦煌學論集》，1985年）首次刊布了

^④ 劉尊明：〈敦煌曲子詞整理研究的百年歷程〉，《文獻》，1999年第1期。

莊嚴堪所藏的《維摩詰經》卷背抄錄的十三首曲子詞。作者逐首標點、分闕，並改正了誤字。周氏還有〈敦煌文學《兒郎偉》並跋〉一文，收錄整理了十個敦煌寫卷中的二十四首《兒郎偉》詞，並據清代禁書釋澹歸《偏行堂集》卷八中的三首《兒郎偉》體的上梁文，指出這種體裁到清代康熙年間仍在流行，而且在唐代還有驅儼、婚娶、障車等功用。張璋、黃畬的《全唐五代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列專卷收錄敦煌詞四百九十四首，其中「雲謠集雜曲子」三十首；「其他曲子詞」四百六十四首，這一部分存疑較多。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合編的《全唐五代詞》（中華書局，1999年）收錄敦煌曲子詞六百三十三首，其中正編一百九十九首，副編四百三十四首。孫其芳的《雲謠集雜曲子校注》和孫藝秋的《敦煌曲子詞校釋》則是對敦煌曲子詞進行校注。孫其芳還有〈敦煌詞校注中的一些問題〉一文（《社會科學》，1984年第1期），針對時下幾種敦煌詞校注本存在的問題，指出「在校注中儘量做到保持原詞面貌是頭等重要的」，而要做到這點，就不能以宋代以來比較定型化的詞調使之就範；柴劍虹〈敦煌詞輯校四談〉（《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74）也談到類似問題。

除了對曲子詞的彙集校補外，敦煌歌詞研究在八十年代一個顯著成就表現在釋詞、方言、方音的研究上。任二北〈關於唐曲子問題商榷〉（《文學評論叢刊》第9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從釋詞出發對歌辭、曲和詞的概念作了比較嚴格的區分。他認為唐代文獻和敦煌寫本中的「詞」，「通通是『辭』的同音簡筆記字而已」，人們平時所說的「曲子」、「曲子詞」，只能證明唐代有歌辭的存在，卻不能成為囊括歌辭的總名。從而把長期以來弄得很混亂的名稱作了個釐清。孫其芳的〈敦煌詞中的方音釋例〉和〈方言釋例〉（《社會科學》，1982年第2、3期）則認為敦煌詞內的方音主要是西北方音，特別是甘肅方音。文章並分析了由於這些方音造成同音致誤，在輾轉傳抄中所出現的三種情況。從方言、方音角度研究敦煌詞，這是條有助於正確解讀敦煌詞的新路。與此相類的還有汪泛舟的〈敦煌曲子詞方言習語及其他〉（《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黃幼蓮〈敦煌文獻裏的俗語詞〉（《浙江師大學報》，1987年第3期）等。八十年代也開始出現一些對敦煌詞內容、藝術價值等方面進行探討的綜論和專論。吳肅森〈論敦煌歌辭與詞的源流〉（《社會科學》，1981年第4期）探討了敦煌歌辭的範圍和淵源，也為「詞的起源研究開闢了一條新路」。夢初〈淺談敦煌曲子詞的藝術〉（《社會科學》，1985年第2期）和汪泛舟〈敦煌曲子詞中民族、愛國詞分析〉

(《敦煌研究》，第2期)分論了敦煌曲子詞的藝術成就和思想價值。柴劍虹的〈敦煌寫卷中的《曲子還京洛》及其句式〉則是對敦煌曲具體詞作進行考辨。

敦煌詩歌研究 許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經過對四百多個敦煌詩歌寫本的整理、綴接和彙校，並充分吸收二十世紀幾代學人的學術成果。全書共輯錄敦煌詩歌一千九百五十二首(句)，其中上編《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共釐定詩集詩抄六十三種，詩一千四百零一首，下編《敦煌遺書詩歌散錄》輯收詩歌五百二十四首(句)。是到目前為止，輯錄敦煌詩歌最多最全的一個詩歌輯本。傅璇琮認為此書的功績有二：「一是總結已有成果，輯錄至今為止所能得到的最多最全的敦煌詩歌，可以體現世紀性的成就；二是提供新的文獻整理思路，即力求恢復原件抄錄的準確面貌，又力圖運用多種學科研究手段，特別是強調敦煌寫本之間、敦煌寫本與傳世文獻之間的互證，開闊對敦煌文獻清理、研究的視野」^⑤。敦煌遺書中的唐代詩歌作品，絕大多數為《全唐詩》所未載，因此八十年代對敦煌詩歌研究的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以此來校補《全唐詩》。而且改變了過去「輯佚」、「叢殘」等零補，開始了比較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劉業修根據王重民遺稿整理的〈〈補全唐詩〉拾遺〉(《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輯詩一百二十七首。蔣禮鴻〈〈補全唐詩〉校記〉(《敦煌學論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項楚〈〈補全唐詩〉二種續校〉(《四川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則是對王重民一九六三年發表的〈補全唐詩〉的校勘。陳尚君的《全唐詩補編》繼八十年代王重民、孫望、童養年的《全唐詩外編》之後，又輯得《全唐詩續拾》六十卷，四千六百餘首，殘句一千一百餘句，據輯者介紹，其中很大一部分即來自敦煌遺書。敦煌詩歌研究則集中在對王梵志詩的整理研究上，張錫厚的《王梵志詩校輯》(中華書局，1984年)和〈敦煌文學研究有待深入〉一文出版、發表後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周一良的〈王梵志詩的幾條補注〉(《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針對張注中明顯的疏誤和「據文改義」處提出嚴肅的意見。徐無聞〈也談敦煌文學研究〉(《光明日報》，1984年12月11日)則不同意張文提出的在輯補中「要根據約定俗成的原則，當改則改，當注則注」，認為「還是恪守不輕易改字的校勘學優良傳統為好，在校理中力求客觀審慎」。項楚的〈〈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補正〉(《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4期)則是對張〈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敦煌吐魯番文獻

^⑤ 傅璇琮：〈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序〉，《書品》，2000年第3期。

研究論集》第四輯)一文的失校、誤校、誤注及整理欠妥處進行補正。其〈王梵志詩論〉(《文史》, 1989年)通過對王梵志詩中與佛教有關的作品的分析,「深信這三百多首『王梵志詩』,絕不是一人所作,也不是一時所作,而是在數百年間,由許多無名的白話詩人陸續寫就的」。都興宙的〈王梵志詩用韻考〉(《蘭州大學學報》, 1986年第1期)則以張錫厚的《王梵志詩校輯》中輯錄的三百餘首五言白話詩押韻為根據,將其分為二十五個韻部,其中陰聲韻七,陽聲韻九,入聲韻九,並對此進行了具體的分析。

敦煌詩歌研究的另一個熱點就是對「唐人詩集殘卷」及其中「馬雲奇詩」的研究。一九七七年,《文物資料叢刊》首次刊佈了「P·二五五五號寫卷」中的唐人佚詩七十二首。整理者在王重民生前錄文的基礎上,將其分為「佚名詩五十九首,馬雲奇詩十三首」並定名為《敦煌唐人詩集殘卷》。八十年代,學術界陸續發表了一些對此研究的論文。較有代表性的有王重民的遺作〈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考釋〉(《中華文史論叢》, 1984年第2期),高嵩的專著《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考釋》,柴劍虹的〈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伯2555)初探〉(《敦煌學論集》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5)、〈敦煌唐人詩文選集殘卷(伯2555)補錄〉(《文學遺產》, 1983年第4期)、〈敦煌伯2555卷「馬雲奇詩」辨〉(《中華文史論叢》, 1984年第2期)等論文。其中〈敦煌唐人詩文選集殘卷(伯2555)補錄〉校補了「P·二五五五號寫卷」中七十二首以外的唐代詩文,共一百八十八首詩,文二篇(寫卷正面抄包括七十二首在內的唐詩一百五十六首,文二篇,背面抄詩三十二首),這些詩作只有十六首見於《全唐詩》,因此是極為可貴的唐詩資料。〈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伯2555)初探〉則對該卷的寫作背景、所反映的時代特色,以及與唐代內地文人詩作的一些關係作了初步的探索。

另外就是對敦煌寫本《秦婦吟》的研究。張錫厚的〈淺談敦煌寫本《秦婦吟》〉(《唐代文學論叢》, 1982年第1期)是篇翻案文章。認為《秦婦吟》雖表現了作者反對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態度,但「是一首難得的反映唐末農民起義部分歷史真相的現實主義名篇」。高國藩的《敦煌本《秦婦吟》新論》(《許昌師專學報》, 1987年第3期)也不同意當代學者對《秦婦吟》的否定。作者根據敦煌寫本中注明的抄寫年代,證明最早的抄本距黃巢起義失敗僅兩年,「說明《秦婦吟》確系韋莊在黃巢起義失敗時撰寫,因而是真實歷史的再現」,「《秦婦吟》這一現實主義傑作,它的最大特點是講了真話。正由於它真實地客觀地描寫了當時長

安的慘狀，並剖析了黃巢起義的前因後果，因而使他和這首詩受到了內外夾攻」。八十年代對其他敦煌詩歌研究的論文還有謝巍對《讀史編年詩》的研究（〈敦煌本〈讀史編年詩〉作者佚名考及其它〉，《江海學刊》，1989年第6期），李正宇對「葉淨能詩」和「龍泉神劍歌」的研究（〈敦煌文學雜考〉，《社會科學》，1986年第6期）等。

敦煌變文研究 變文的定義和文體的來源均存在許多爭議。六十年代前基本上有鄭振鐸、向達、孫楷第、周紹良、程毅中五家之說。五家在解釋上雖有差異，但有一點是共通的，即變文與寺廟壁畫上的變相有關，兩者相輔而行。至於變文文體的來源，孫楷第、王重民、程毅中等皆認為「是在我國民族固有的賦和詩歌、駢文的基礎上演進而來的」³⁶，「變文的起源沒有直接受到、或在體裁上竟完全沒有受到印度文學的影響」³⁷。港臺學者如饒宗頤、羅宗濤、邱鎮京等及日、法、美、英等國漢學界，基本上皆與王重民等觀點相近，無多大變化。但大陸從八十年代起，對上述說法有了突破。有人對變文在講唱中是否配合相應的變相，甚至變文是否是一種文體產生了懷疑。「因為在敦煌寫本中明標為『變文』而非韻散相間體者並非個例；同時，敦煌寫本中的韻散相間體又大多未標為『變文』」³⁸。牛龍菲則認為變文並不是一種文體，「『變』與『辯』通假，皆含有針砭過失之義」，因此「變文即是唱導化俗的『談辯』、『應變』之文」³⁹。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李永寧、蔡偉堂將敦煌《降魔變文》寫卷與莫高窟十九個洞窟的《勞度叉鬥聖變》壁畫及十餘種佛典進行詳細對照，從而為變文俗講與變相壁畫的關係找到了比較扎實的證據⁴⁰。

由於對變文的內涵理解存在著分歧，由此產生對王重民《敦煌變文集》所收作品是否皆是變文的討論。王氏的《敦煌變文集》出版於一九五七年，此書在編輯過程中，曾經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啓功、曾毅六位先生合力校訂，出版之後，徐震諤、蔣禮鴻先後補訂，是一部在國內外學術界較有影響的敦煌俗文學作

³⁶ 程毅中：〈關於變文的幾點探索〉，《文學遺產》，1962年增刊。

³⁷ 王重民：〈敦煌變文研究〉，見周紹良、白化文：《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³⁸ 曲金良：〈敦煌「變文」研究史述論〉，《煙臺師院學報》，1990年第4期。

³⁹ 牛龍菲：〈中國散韻相間、兼說兼唱之文體來源〉，《敦煌學輯刊》，創刊號。

⁴⁰ 周紹良、白化文：《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品彙編。進入八十年代以來，一方面有的學者仍在對此進行補訂，如劉堅、郭在貽、陳治文、項楚、袁賓等人；另一方面多數學者認為《敦煌變文集》包括的範圍太廣，劃分太粗，應該重新加以細分和研究。白化文的〈什麼是變文〉（《古典文學論叢》第二輯）將俗講文、俗講從變文中剔除出去，認為被收入《敦煌變文集》中被擬為〈伍子胥變文〉、〈孟姜女變文〉、〈秋胡變文〉、〈太子成道變文〉等皆不是變文。張鴻勛也認為比較完整的敦煌抄卷上有些作品是原有標名的，如變文、變、緣起、講經、文、詞文、賦、論、書、話等，他們「明顯地存在著風格、體式等方面的差異，如果一股腦兒地歸在『變文』的總名之下，通通算作『俗講』作品，是不能概括敦煌講唱作品豐富多彩的形式的」^④。作者主張將敦煌講唱作品分為詞文、故事賦、話本、變文、講經文（附押座文）五類，並逐一分析探考了各類在體制、淵源、流變、題材、語言、風格及演出方面的特點。張錫厚在《敦煌文學》中將敦煌講唱文學分為變文、詞文、話本小說、俗賦、講經文、押座文、雜文七大類。

對變文具體作品的綜論有周紹良、白化文編的《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舒佩實〈論變文在我國小說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貴州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張錫厚〈漫談敦煌變文的藝術特徵〉（《唐代文學論叢》，1984年）等。《敦煌學論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的幾篇論文：高國藩〈論敦煌民間變文〉則是從民間文學角度對變文加以論述；何國棟〈講唱文學的嘗試和先導〉則探討了敦煌俗賦的產生和流變的過程。程毅中〈唐代俗講文體制補說〉和王文才〈俗講儀式考〉則對唐代的俗講儀式以及源流作了探尋和考論。專論則集中在對一些作品的考證、校勘、釋義等方面，如蔣鴻禮〈關於〈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杭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2期），項楚〈變文字義零拾〉（《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2期），張金泉〈變文假借字譜〉（《杭州大學學報》，1984年增刊），盧善煥〈敦煌變文字義析疑〉（《敦煌學輯刊》，1984年第2期）等。白化文、程毅中〈對《雙恩記》講經文的一些推斷〉、張鴻勛〈敦煌話本〈葉靜能詩〉考辨〉（均見《敦煌學論集》）、孫悅春〈〈伍子胥變文〉校釋補正〉（《河北學刊》，1989年第2期）、趙達夫〈〈捉季布傳文〉校補〉（《唐代文學叢刊》，1987年），李純良〈敦煌本〈韓朋賦〉創作時代考〉

^④ 張鴻勛：〈敦煌講唱文學的體制與類型初探〉，《文學遺產》，1982年第2期。

（《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張鴻勳〈敦煌故事賦〈茶酒論〉與爭奇型小說〉（《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則是對具體作品的校補考論。

7. 唐代文學的斷代史和專門史開始出現

關於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從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到七十年代末，只有游國恩等人的《中國文學史》和中國科學院文學所《中國文學史》和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三種影響較大的中國文學通史。從八十年代後半期起，開始出現了唐代的斷代文學史和專門史有：羅宗強的《隋唐五代文學發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唐詩小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從軍《唐代文學演變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楊海明的《唐宋詞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熊篤的《天寶文學編年史》（重慶出版社，1986年），周嘯天《唐絕句史》（重慶出版社，1987年）等。

羅宗強的《隋唐五代文學發展史》是部斷代文學史，也是研究隋唐五代文學思想發展狀況的開山之作。該書的成功之處不僅在於資料的豐富，更在於他首次將零散的作家關於創作思想方面的言論，作品中所表現出的創作傾向，同該作家在文學史上的承續和批評史上的思潮綜合起來，從而勾畫出隋唐五代文學思想發展的清晰脈絡，其中把唐代天寶中到大曆中視為由盛唐文學思想到中唐文學思想的轉折，已普遍為研究者所接受。另外，書中對唐太宗等政治家在唐代文學繁榮中的作用，盛唐詩歌繁榮而散文卻滯後的原因，唐代文學思想發展的緩慢過程，它的過渡期以及不同文學思想間的複雜銜接等都有獨到的見解。周嘯天的《唐絕句史》是一部分斷代史，也是大陸第一部唐人絕句史專著。該書分別論述了五絕、七絕在唐代萌發的時間和原因，首次對唐代絕句的階段特徵和藝術經驗進行勾勒和總結，特別是對歷來毀譽不一的杜甫絕句，作者肯定它從內容到手法都有所拓新，並分析了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表現出作者獨到的眼光。熊篤的《天寶文學編年史》首次對唐代文學進行編年和分時段研究。天寶雖只有十五年，但對唐代文學發展關係極大，他既是盛唐文學的高峰，又是盛極而衰的轉折。作者以此楔入，來探索唐代文學的興衰流變規律。其特色是將這十五年的政治、經濟、文化與文學事跡緊密關聯，把作家和重要作品逐年編排於其中，間來以考辨。

在八十年代，一些研究盛唐氣象、唐詩分期、流變、文學集團、文學運動的論文也陸續出現，這為探索唐代文學的承續流變和文學史的編寫做好基礎性的鋪墊。

如傅璇琮、倪其心的〈天寶詩風的演變〉（《唐代文學論叢》（八）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不同意長期以來形成的評價盛唐詩歌的模式：王孟山水詩派、高岑邊塞詩派、李白、杜甫概括地代表了整個盛唐詩歌的發展、特點和成就，其他詩人則分別納入上述詩人的範圍和影響之中。作者認為這個模式，既不適用於天寶，也概括不了開元時代詩歌發展的特點和成就。作者認為「深刻的不安，是天寶時代社會上帶有普遍性的情緒，而在文學上，這種詩化了的深刻的不安，則是天寶詩風的基調。文章以孟浩然、王維、王昌齡、李白、高適等為例，分析了這個基調在詩人身上的反映和變化過程。另外一些論文，如孫琴安〈唐代七律詩的幾個主要派別〉（《學術月刊》，1988年第2期），馬承五〈中唐苦吟詩人綜論〉（《文學遺產》1988年第2期），趙昌平〈吳中詩派與中唐詩歌〉（《中國社會科學》，1984年第4期），羅立乾〈盛唐氣象說述評〉（《唐代文學研究年鑑》，1985年）等皆分別就文學體裁、文學流派、文學現象發表了較有價值的見解。

8. 唐詩學開始構建

一九八三年，傅璇琮鑑於當時唐代文學研究的迅速發展，便在《唐代文學年鑑》上發出重視唐代文學學術史研究的倡議，陳伯海則把這一倡議付諸實施。一九八八年十月，他的《唐詩學引論》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該書首次對這一新學科的內涵進行系統地考察，並對唐詩學的學科建設提出設想。在《唐詩學引論》中，作者綜合考察了唐詩的特質、淵源、流派、風格，對唐以來實際存在的研究史的脈絡進行了爬梳和勾勒。他把唐詩學的建設史分為五個時期：唐五代為醞釀期，宋金元為形成期，明代為發展期，清及民初為總結期，「五四」以後為創新期。八十年代末，他主編的《唐詩書錄》（齊魯書社，1989年）出版。到了九十年代，在衆多學者的努力下，這條從八十年代發源的涓涓細流終於成了滔滔江河。

這一時期的唐詩學單篇論文有周勛初〈從「唐人七律第一」之爭看文學觀念的演進〉，王運熙、楊明〈《河岳英靈集》的編集年代和選錄標準〉（《唐代文學論叢》，1982年第1期），許總〈唐人論杜述評〉（《唐代文學論叢》第五輯），梁德林〈《中興間氣集》的選錄標準與中唐前期詩歌風格〉（《廣西師院學報》，1987年第1期），孫方〈揚州詩局是怎樣編輯校刊《全唐詩》的〉（《河南大學學報》，1985年第5期）等，多為對歷代唐詩選本、對唐代詩人及其文學觀進行評論。如周勳初的論文認為嚴羽雖提倡盛唐詩，但只是欣賞那種保留漢魏古詩中渾

樸氣象的詩歌，正是從此標準出發，嚴才一再稱讚李白而不贊成杜甫那種精工의七律，這與明人推崇盛唐那種技巧全然成熟、表現精當的近體詩的觀念有所不同。在整個八十年代，對唐詩研究史和唐代詩學理論作出整體研究和評估的論文還較稀少，對某一朝代、某一時段唐詩學的集中研究也還未形成氣候。相比之下，對個別大家的詩學研究如「杜詩學」要充分一些，如鄭慶篤等的《杜集書目提要》（齊魯書社，1986年）、許總《杜詩學發凡》（南京出版社，1989年）等。

回顧八十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有其獨有的特色也有其不足，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學術思想上開始反思和檢討

這已不是一九七七至一九八〇年復甦階段那種針對文革的反批判，而是對五十年代以來的古典文學研究思想和批評標準進行反思和檢討。當時發表的一些論文如胡念貽的〈三十年來古典文學研究回顧〉（《文藝百家》，1980年），范寧〈論研究中國文學史的規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2期），陳言〈打破古典文學教學和研究中的框框〉（《重慶師院學報》，1980年第2期）等，集中分析了古典文學研究中以「人民性」和「現實主義」作為唯一標準所帶來的三個方面的弊端：一是把鮮活的、統一的文學現象作條塊分割，先剔除其中的所謂糟粕，再對剩下的所謂「精華」進行孤立的、封閉的闡述。例如李白其人其作，本應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按上述標準則必須進行割裂，指出《將進酒》、《江上吟》等是頹廢的，《嘲魯儒》、《夢遊天姥吟留別》等則是進步的。但《將進酒》中既有「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也有「鐘鼓饌玉不足貴，惟有飲者留其名」；《夢遊天姥吟留別》中既有「安能催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也有「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剔除其任何一面，肯定其另一面，就不是一個完整的、真實的李白。一個作家是如此，一個時代、一個作家群也是如此，如把他們割裂成一個個各自獨立、甚至針鋒相對的條塊，有的是「民主性的精華」，有的是「封建性的糟粕」，就無法感受到盛唐氣象或大曆詩人那種時代氣氛和群體意識，也就無法作橫向的統一或縱向的傳遞，也就無法分清這個文學人物、這個歷史時段的價值所在，以及他區別於其他人物、其他時代的文學特徵。二是根據假想的「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這條文學史線索，先設定一個框框，人為地排斥一些作家，劃定一些思想禁區，實際上並不是事物的本來面貌。例如，南朝樂府中的

《子夜歌》「夜長不得眠」與沈約的《夜夜歌》「北斗欄杆長」，兩詩的題材、手法都極相似，但因前者是民歌，就應肯定其價值；後者是宮廷詩人，就是表現了頹廢沒落的情緒。這在對《花間集》和《敦煌曲子詞》的評價中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三是由於對作家、作品先作一種政治歸屬或思想畛域的劃定，這就把一些生活放蕩或有變節行爲的文人排斥到研究範圍之外，如明代的阮大鍼和清初的錢謙益。阮大鍼被清代同光體代表人物陳衍稱爲三百年來第一人，錢謙益更是清初文壇領袖，宗宋派的代表人物，就因爲「民族叛徒的罪名是洗刷不掉的」而被列入了另冊，幾十年來從古代文學的研究物件中消失了。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至二十日，文學遺產編輯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和古籍所，信陽師範學院中文系和古籍所在信陽聯合主辦了「建國四十年古代文學研究反思討論會」，七十多位學者出席了會議。會上大家一致性的看法是：造成建國以來古代文學研究失誤的根本原因「是『左』的思想的干擾」。黃均認爲「政治權力對學術研究的干預，研究者自身素質不高，觀念上的偏頗，理論上準備不足，缺乏世界文學參照」是造成五、六十年代古代文學研究不景氣的主要原因^④。

這種學術上的反思和檢討，給八十年代及以後的唐代文學研究思想的活躍和探討的深入廓清了道路。

2. 宗教和唐代文學的關係研究撥亂返正，開始受到重視

八十年代前，宗教與唐代文學的關係，是個很忌諱的話題。即使在論述作家作品時不得已提到宗教，其基調也是，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鴉片，它幫助作家逃避現實，起著毒害心靈的消極作用。八十年代後，隨著思想上的撥亂返正，佛教、道教對唐代一些作家思想上的影響和創作上所起的作用也開始客觀地評價，一些作家與佛教、道家的關係以及一些詩僧、道士的行年、交遊和詩作也逐漸被發掘和梳理出來。在這當中，佛教與唐詩的關係研究相對要充分一些，道教與唐代文學關係的研究要薄弱一些。其特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宗教對某一作家的影響或其在作品中的表現開始客觀地分析和評估，但評論的對象此時還僅限於王維、李商隱、柳宗元、韓愈、白居易這類大家及其作品。

^④ 宗文：〈建國四十年古代文學研究反思討論會綜述〉，《信陽師院學報》，1989年第2期，下同。

鍾來因在道家與唐詩的關係研究中是比較出色的一位，他的〈唐朝道教與李商隱〉（《文學遺產》，1985年第3期）即是析論道教與唐代大家李商隱作品風格的關係。作者認為李商隱那種清峭、感愴、譎怪、隱僻、精深的詩風，均與中晚唐時期如癡如醉的崇道風氣有關。作者舉義山詩為證，指出義山的「中迷鬼道樂，沈為土民」等詩句，即是回憶他在玉陽山學道及與女冠相戀的經過，「前人解李義山詩，未知『鬼道樂』、『金華』等道典的含義，更不明義山移植道教『秘訣隱文』的手法，也未能把義山詩作綜合的考察，故都未解釋正確」。文章將道教對義山詩的影響分為三個方面：充滿仙風道氣的愛情詩；受道教房中術影響，大量運用隱比手法、比興體制，至使這些詩呈現隱晦、精深風格；受道教好靜虛無為影響，在戀愛悲劇中更易產生感傷、頹廢情緒，使他的詩塗上了濃郁的悲劇色彩。陳允吉的專著《唐音佛教辨思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收輯了作者八十年代論唐代詩人與佛學關係的十二篇論文，涉及王維、杜甫、白居易、韓愈、李賀五位大家，立論多從繪畫、佛經、偈頌等人們很少涉及的文化學角度，如〈王維「雪中芭蕉」寓意試探〉、〈論唐代寺院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韓愈的詩與佛經偈頌〉、〈李賀與《楞伽經》〉等。由於作者投向的是別人很少涉足的角度，因而也就得出了別人難以得出的結論。例如李賀曾自道：「楞伽堆案前，楚辭繫肘後」（《贈陳商》），但我們往往只注其「騷之苗裔」的一面，忽視了《楞伽經》對其宇宙觀和生死觀的影響。在分析李賀對死亡的敏感和奇詭幽冷詩風時，也多從其坎坷的人生遭遇和脆弱的性格特徵對此加以解釋，即使論及佛教對其影響，也沒有具體地與楞伽經聯繫起來。陳氏在〈李賀與《楞伽經》〉一文中指出：李賀詩歌中對生死的思考比一般作家顯得更為摯著深沈、更多哲理意味，這與他篤信《楞伽經》有很大關係。《楞伽經》就是一部旨在解釋世界萬物生滅和人生死現象的佛經，其開卷的兩句偈語就是「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作者結合賀詩，從「對宇宙和人生的看法」、「關於相對主義」、「超世間的思想」三個方面具體探討了《楞伽經》對李賀思想和創作風格的影響然後又從思想體系、思想方式、思想歸宿三個方面指出兩者間的不同，這就是李賀之所以成為獨特的李賀的原因。在〈論唐代寺院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一文中，作者分析了唐代寺院內「奇蹤異狀」、「地獄變相」、「曼荼羅畫」幾種壁畫對韓愈險怪詩風形成的影響。〈從《歡喜國王緣》變文看〈長恨歌〉故事的構成〉則是用比較文學為手段來探討佛教文學與白詩之間的關係。除上述兩位外，這類論文還有葛景春的〈儒道釋結合熔鑄百家的開放型思想—

一李白思想新論〉（《中州學刊》，1986年第2期），隗芾〈韓愈攘斥佛教的動機和效果〉（《汕頭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李醒華〈白居易的淨土歸宿〉（《廣東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等。

二是對一些僧人生平、作品的新論。此時還只限于賈島、寒山、皎然等影響較大的詩人和作品，如趙劍的〈賈島新論〉首次系統地分析了賈島的詩歌風格、審美情趣和思想歷程。作者認為，賈島的詩風並非歷來沿稱的「清奇僻苦」而是「平淡」，根本不能屬於韓孟的險怪詩派。作者通過對〈訪李甘原居〉、〈雪晴晚望〉、〈泥陽館〉等向來被認為是奇僻代表賈島詩作的分析，認為奇僻只是詞句中體現的物象，氣韻是則是平淡。其趨勢則是「從『氣象崢嶸』到『乃造平淡』」。對皎然的研究則集中在《詩式》上，如孫昌武〈論皎然《詩式》〉（《文學評論》，1986年第1期），董丁誠〈皎然《詩式》淺說〉（《唐代文學論叢》（六）），申建中〈中國傳統詩學的一座里程碑——皎然意境說初探〉（《文藝理論研究》，1985年第1期）等。蕭占鵬的〈皎然交遊考〉（《江海學刊》，1987年第6期）是不多的幾篇對皎然生平研究的論文之一。徐庭筠的〈唐五代詩僧及其詩歌〉（《唐代文學論叢》（七））和湯貴仁的〈唐代僧人詩和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唐代文學研究》（一））是僅見的兩篇綜論唐代詩僧及其詩作的論文。前者涉及寒山、拾得、貫休、齊己、靈一等著名詩僧的生平和詩作，以及他們思想、行為的世俗化傾向；後者對詩僧的得名、產生詩僧的原因進行了探尋，涉及了若虛、澹交、棲蟾等不知名的詩僧。錢學烈自一九八三年起，陸續發表〈寒山子與寒山詩版本〉、〈寒山詩語言研究〉等研究寒山的論文，八十年代末完成《寒山詩校注》（廣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這是八十年代研究詩僧的唯一一本專著。

總之，此時對詩僧的研究還沒有普遍展開，史料的鈎沈隨著《大正藏》的再版和敦煌資料和吐魯番文物資料的整理出版也剛開始啓動，真正獲得豐收，則要到九十年代。道家詩人及作品研究此時僅見蘇者聰的〈論唐代女詩人魚玄機〉（《武漢大學學報》，1989年第5期）等為數不多的幾篇，女冠詩人研究論文的湧現也要到九十年代。

三是受當時時代氣氛和學術風氣的影響，多宏觀綜論，多從哲學和文化背景發論。中華書局的《文史知識》雜誌於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刊出「佛教與中國文化」專號，其中周振甫的〈談談以禪喻詩〉、葛兆光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也談詩的理趣〉，以及陳仲奇、張錫厚對王維、王梵志詩的賞析，皆是在佛教在中國

思想史或中國文化中的地位這個大背景下進行的。一些以研究柳宗元哲學思想為主的論文如孫以楷〈柳宗元與佛教及佛學的關係〉（《安徽師大學報》，1986年第2期）、吳乃泰〈柳宗元的天人觀〉（《東北師大學報》，1986年第1期）、李塞夫〈柳宗元「勢」的社會歷史觀〉（《廣西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都被列入唐代文學研究的「述評」和「唐代文學研究論文索引」之中^④，可見當時對哲學和文化學這個背景的關注。當時出版的與唐詩有關的兩本專著：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孫昌武的《佛教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也都是「中國文化史叢書」之一。葛著〈中論及中晚唐詩人與禪宗關係〉時，頗多新解，如作者認為他們信奉的是佛教，不僅僅是禪宗一家，也沒有參透禪宗的玄妙頓悟：王維既信南宗，又信北宗，劉禹錫雖近禪宗，但只是隔岸看花、臨水羨魚；柳宗元貶在柳州後雖多與禪僧交往，但因受早年佛教影響，仍不滿狂禪之風。白居易所崇拜的佛教更是一個模糊的雜燴，幾乎見佛就信，對禪宗沒有什麼認識。孫昌武則另有研究佛教與唐代文學的專著《唐代文學與佛教》（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該書以柳宗元、王維、白居易、杜牧、顏真卿、李端等唐代詩文作家為例，論述了佛教對他們思想、生活方式上所產生的影響，其詩歌的通俗化、古文的表現技巧和寫法上的變化也都是佛典和僧人詩作影響的結果。作者還有單篇論文〈佛教與唐代文學〉（《唐代文學研究》（一））、〈唐代古文運動與佛教〉（《文學遺產》，1982年第3期）也都是綜論。在佛教與唐代文學研究上，孫昌武的通論、綜論和陳允吉的作家作品專論可以算作兩方面的代表。這個時期的綜論還有佟宗頤〈唐代詩僧重出甄辨〉（《中華文史論叢》（三））、程裕禎〈唐代的詩僧和僧詩〉（《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和上面提及的徐庭筠的〈唐五代詩僧及其詩歌〉、湯貴仁的〈唐代僧人詩和唐代佛教的世俗化〉等。道家與唐詩方面的綜論相對要少得多，只有葛兆光的〈道教與唐詩〉（《文學遺產》，1985年第4期）等為數不多的幾篇。另外，佛教與唐代文學的關係研究多為佛教與唐詩，與古文的關係只有孫昌武、劉國盈等人為數不多的幾篇，與小說的關係研究此時還未起步。道教與唐代文學的關係研究更是限於唐詩。

^④ 鍾來因：〈宗教與唐代文學研究〉，《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87》（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54；〈唐代文學研究論文索引〉，《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87》，頁429

3. 中外學者的交流合作由恢復正常到日益頻繁

一九七八年前，大陸是個封閉的社會。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改革開放力度的加大，中外學者在唐代文學研究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由恢復正常到日益頻繁。一方面大陸學者走出大陸、走出國門，去海外講學、訪問和參加學術會議；另一方面，一批批海外、國外學者也來到大陸參加學術會議，交流學術成果，與大陸學者合作進行學術研究。傅璇琮等認為：「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日益深入的當今時代，建立開放型的文學研究已經成為歷史的必然。我們作為古典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者，理應適應時代的需要，認真把握中國古典文學的這段外播歷史，發掘其內涵，總結其規律，使之在推動文學研究現代化的壯舉中，發揮應有的作用。」^④可見這種中外、海外學者的學術交流一開始就建立在理性自覺的基礎上。從八十年代後半期起，中外、海外的一些高校間就開始互換學者，一批唐代文學教師定期去海外以文會友，舉辦講座、傳授生徒。繆鉞和葉嘉瑩《靈谿詞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李華珍和傅璇琮的《〈河岳英靈集〉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可以說是這一時期中外學者合作研究成果的代表。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和陝西師大文研所、廣西師大出版社主辦的《唐代文學研究年鑑》，從一九九〇年創刊起就開設了「國外研究動態」（後改為「海外研究動態」），介紹港臺及國外唐代文學的研究動態。創刊號上即刊有尹錫康〈唐代文學在蘇聯〉，王麗娜〈美國對李白詩歌的翻譯和研究〉，董乃斌〈日本學者李商隱研究的新收穫——〈李義山七絕、七律集釋稿〉簡介〉以及美國學者李珍華的〈美國學者與唐詩研究〉。以後各期均有這方面的介紹。從一九九一年第五屆年會起，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年會就拓展為國際學術會議，每屆都有一批國外、海外的唐代文學研究者前來參加並提供了一些有分量的論文，而且交流有逐年增大的趨勢。一批海外、國外的學術基金也開始介入中國大陸的唐代文學研究，提供研究基金，資助專著出版，創辦學術刊物，由此產生了一批高質量的論著。「唐研究基金」(The Tang Research Foundation)就是其中之一。該會是由美國人羅傑偉(Roger E. Covey)一九九一在芝加哥創辦。根據該會宣布的宗旨，主要是「對中美兩國特別是大陸地區從事唐代歷史、考古、文學和藝術領域專業研究的學者，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援；對一部分學者非常有價值

^④ 傅璇琮、周發祥：〈《中國古典文學走向世界叢書》總序〉，《中國古典文學走向世界叢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

的學術研究專案給予資金支援；為中國學者發表高水準的專業研究成果，提供具備國際論文評審制度的高規格的专业學術雜誌；組織並支援一部分優秀學術專著的正式出版^{④5}。近二十年來，該基金會出版了「唐研究基金會叢書」十一種，其中有關於唐代文學的有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等，出版了五卷《唐研究》，發表了陳尚君〈新唐書藝文志補〉，葛曉音〈論初盛唐文人的干謁方式〉、〈論開元詩壇〉，郁賢皓、尹楚斌〈李白詩的集佚與辨偽〉，莫礪鋒〈論韓愈詩的平易傾向〉等一批高質量的唐代文學論文。類似的海外、國外學術基金還有美國的福特基金、日本的京都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基金」以及臺灣地區的「中華文化發展基金」、「國科會基金」和一些民間研究基金等，對大陸的包括唐代文學研究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都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介紹和翻譯海外研究唐代文學的論著。這項工作從改革開放初的八十年代開始，進入九十年代後，有加大、加快的趨勢。盧興基編選的《臺灣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文選》出版於一九八八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書中共選一九五六至一九八五這三十年間臺灣的古典文學論文二十八篇，其中唐代文學七篇（詩歌五，小說一，敦煌寫卷一），首開介紹臺灣當代古典文學研究之風。一九九二年，傅璇琮在《中國典籍與文化》創刊號首次對羅聯添的《唐代文學論集》等學術專著進行了專題研究。倪豪士《海外學者論唐代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宋柏年主編的《中國古典文學在國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其中第三編介紹了日、韓和歐、美及前蘇聯學者研究唐代文學的情況，包括對唐詩的總體研究，對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賀、韓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隱等大家的研究，對唐傳奇和敦煌文學的研究，其中的「美國『寒山熱』」和「中國詩歌對意象派的歐美詩歌的影響」反映了編選者的眼光。江蘇教育出版社準備出版一套由傅璇琮、周發祥主編的《中國古典文學走向世界叢書》，包括中國古典文論、詩歌、戲曲、小說散文在國外以及「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學」六種。

4. 中、小作家及作品研究開始受到重視

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到八十年代，唐代文學研究有個明顯的傾向：對三、四流的

^{④5} 「唐研究基金會」宗旨，其網址是：www.tangrf.com.cn

小作家研究不夠。據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資料室所編的《唐詩研究專著、論文目錄索引》，自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一這三十多年間，有專著、專論的唐代作家僅六十一人，而且集中在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柳宗元幾個作家，杜甫一人就占總數的五分之一還強。衆多的三四流作家或是被遺忘，或是只有一、兩則軼聞介紹或一首詩的賞析。鑑於這種情況，一些專家呼籲要重視對中小作家的研究。吳汝煜認為「唐詩研究領域要向中小作家擴展」，是基於以下四個原因：一是建國以來，「對一、二流大作家的研究形成熱門，而對三四流小作家的研究則比較薄弱」；二是小家的作品能經受住一千多年的時間考驗，說明它確實有流傳和研究的價值。「一般來說，小作家的作品未必能向大作家那樣全面深刻地反映一個時代的各種複雜的社會矛盾，但是他們在反映社會生活的某一個側面時則是比較清晰、明確、大膽的」，另外有的作品也很有藝術個性，研究他們，「這將有助於滿足具有不同審美趣味的廣大唐詩愛好者的需要」。三是這些小家往往喜歡結合成大大小小的作家群，研究他們，「還可以從中發現一些原來不受注意的詩歌流派。對這些詩派的研究，將有助於進一步真切地描述出唐詩的千姿百態的繁榮景象」。四是大作家在成長的過程中，總要廣泛地吸收和總結前人成果。「從文學發展史來看，倒是無數小作家的藝術創作孕育了大作家，造就了大作家，而不是由大作家孵化出小作家」。作者認為：「如果能有較多的同志把精力投入到對大量三四流作家的生平事跡、交遊活動、創作成就、藝術個性、風格流派等方面的研究之中，那麼唐詩研究將會開創一個新局面，整個研究水平也必將有較大的提高」^{④⑥}。在隨後召開的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三次年會上，一些學者也發出了類似的呼籲^{④⑦}。在研究實踐上，傅璇琮、譚優、程千帆、馬茂元等人則率先作出了榜樣，傅璇琮的《唐代詩人叢考》對唐代二十七位以中小為主的詩人生平、交遊作出考訂，其中像司空曙、戴叔倫等過去很少有人觸及。譚優學的《唐詩人行年考》所考對象的十分之六是趙嘏、張祜之類中小家，其《唐詩人行年考》（續編）考論了十三位唐詩人，除王維、王建外，其餘皆為中小家。其中對薛能、崔塗、薛逢等人行年的考辨，對我們全面認識晚唐詩歌風

^{④⑥} 吳汝煜：〈唐詩研究領域要向中小作家擴展〉，《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86》（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0。

^{④⑦} 葛培嶺：〈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三次學術討論會綜述〉，《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87》，頁10。

貌和理清當時的詩歌流變很有幫助。程千帆在建國以來第一本影響較大的古代文學鑑賞集《唐詩鑑賞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中有意選擇了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小家唐溫如的〈題龍陽縣青草湖〉，馬茂元則選擇了薛濤的〈籌邊樓〉。在一大批專家的號召和帶動下，唐代中小作家作品研究在八十年代開始受到重視。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出版了《唐詩小集》叢書，專門選擇唐代詩人中作品流傳不多，但在思想藝術上又別具一格的中小詩人爲對象。上海辭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海內第一部《唐詩鑑賞辭典》中，對一百多位中小詩人的生平和詩作進行了介紹和賞析，這在當時有著啓發性和轟動性的效果。此時，一批對中小作家生平交遊、創作成就、藝術個性、風格流派等方面的研究的論文也陸續問世，如霍松林的〈韓偓年譜〉（上下），郭殿崇〈唐徐州詩人劉商考〉（《徐州師院學報》，1989年3月）、梁超然〈《唐才子傳·馬戴傳》箋證〉（《廣西民院學報》，1989年3月）、劉德重〈呂溫生平事跡考辨〉（《文史》27輯）、吳在慶〈張祜生年辨證〉（《廈門大學學報》，1985年1月）等。

5. 學術爭論恢復正常並漸趨活躍

文學上的批評與反批評，是大陸學術界的優秀傳統，二十年代《紅樓夢》研究中就有過新舊紅學之爭，屈原是否有其人之爭；四十年代的李白身世之爭，五十年代的《水滸》討論和宋江評價之爭，《長恨歌》主題之爭，《胡笳十八拍》真偽之爭等。這種正常的學術爭論到了六、七十年代被「革命大批判」和人身攻擊所代替，真正的學術爭辯卻死去。八十年代隨著思想解放運動和整個理論界的活躍，唐代文學中這個優秀的傳統又開始恢復，並呈現活躍的態勢。這種論爭基本上有兩種類型：一是古已有之或五、六十年代就已進行過，八十年代又有新的發展，如關於唐代邊塞詩的評價、李白出生地、李商隱的無題詩的理解、李白詞二首的真偽，對「盛唐氣象」和唐詩繁榮原因的理解等；另一種是隨著研究的深入而產生的新的爭論，如李白幾次入長安之爭，有無新樂府運動之爭，杜甫與佛學的關係、元稹與宦官的關係等。這種爭論有的範圍較小，只限於相關的專家，如杜甫與佛學的關係、元稹與宦官的關係等；有的則掀起軒然大波，引起衆多媒體關注和海內外學人的重視，時間甚至長達幾十年。如唐代的邊塞詩之爭，即開始於六十年代，當時在極左思潮這個大背景下，有人從根本上否定唐代邊塞詩的價值，認爲其「嚴重的反戰思想，不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沒有積極意義可言，

起的純是瓦解鬥志的作用」^{④⑧}。到了一九八〇年有人又重提這場爭論，當年《文學評論》第三期刊登吳學恒、王綬青的〈邊塞詩評價質疑〉，從而又導致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爭論開始是圍繞開元、天寶年間邊塞戰爭的性質、盛唐邊塞詩繁榮的原因以及邊塞詩中有無愛國主義這三個問題展開，後來逐漸擴展至邊塞詩的內涵，初唐和中晚唐的邊塞詩研究和邊塞詩與地域、民族諸因素的關係。在討論範圍擴大的同時，其認識也在加深，其開始階段，往往以防禦還是侵略來判定戰爭是否正義，並以此為前提來對邊塞詩人、詩作作出價值判斷。後來則是放到中華各民族歷史統一進程這個大背景下來進行考察，傾向性的看法是唐代邊塞戰爭是當時消除分裂、締造統一的實際道路，同時也促進了民族的團結和融合，並給中原社會帶來了和平和安定。唐代的邊塞詩，對這種具有進步意義的邊塞戰爭「作了十分精彩的描繪，應該給予高度評價」^{④⑨}。另外，對當時西北的地理情況、邊塞的具體戰事以及當時各民族的關係，隨著討論的深入，也有了更多的瞭解和更深入的研究。這次討論時間上持續到八十年代末，全國幾十家報紙、雜誌捲入其中，產生了近百篇論文。直到一九九六年，新疆大學的蘇兆海等，還在撰文探討邊塞詩的定義。

有無新樂府運動和對白居易新樂府評價之爭是隨著唐代文學研究的深入而產生的新課題。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羅宗強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新樂府運動」種種〉，文章通過對當時寫新樂府的人數、理論提倡和實際創作的關係，否認歷史上有過一個新樂府「運動」。並認為「元白新樂府，從寫民生疾苦的角度說，是有積極意義的。就其藝術感染力而言，卻實在並非成功之作」。裴斐、王啓興也在此前後撰文，持與羅相近的觀點^{⑤⑩}。由此引發了一場爭論。對「新樂府運動」和白居易新樂府詩持肯定態度的以蹇長春、蘇者聰、張田、王春庭等為代表。蹇長春的〈新樂府詩派與新樂府運動〉（《西北師院學報》，1986年4月）從新樂府詩派詩人與新樂府運動產生的社會背景、作家的主觀因素等方面，論證中唐詩壇確實存在一個「思想傾向、文學觀點和藝術風格相近的詩人群體」組成的「新樂府詩

^{④⑧} 吳向迪：〈唐代邊塞詩簡論〉，《揚州師院學報》，1960年第9期。

^{④⑨} 葛培嶺：〈論盛唐邊塞詩研究的歷史觀問題〉，《第三次唐代文學學會年會論文》。

^{⑤⑩} 王啓興：〈白居易領導過「新樂府運動」嗎？〉，《江漢論壇》，1985年第10期；裴斐：〈白居易詩歌理論與實踐再認識〉，《光明日報》，1984年12月18日。

派」，「要判斷他們的文學活動是否構成一個運動」，只能根據他們當時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和在文學史上的影響來決定。張田〈白居易諷喻詩的產生和風格〉（《河北學刊》，1986年2月）認為白居易的諷喻詩思想上具有較強的現實性，藝術上深刻而簡練。建議「對白居易的諷喻詩要作歷史的具體分析，既不能苛求古人，更不能輕率地下否定的結論。蘇者聰的〈白居易的新樂府不能一概否定〉（《南充師院學報》，1986年4月）、王春庭的〈白居易評價之我見〉（《江西社會科學》，1986年4月）則是針對裴斐〈白居易詩歌理論與實踐再認識〉和王啓興的〈簡評白居易的新樂府〉進行對辯。這種爭辯，有利於活躍學術思想，促進學術研究的延伸和正確結論的浮現。

6. 散文研究與唐詩相比相對滯後

八十年代的唐代古文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吳文治的《韓愈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83年）、孫昌武《柳宗元傳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唐代古文運動通論》（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劉國盈《唐代古文運動論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陳幼石《韓劉歐蘇古文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吳孟復《唐宋八大家古文概述》（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的《樊川文集》、《皮子文藪》等唐文別集、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劉澤民點校的《陸宣公集》等，另外，劉禹錫、柳宗元、韓愈、白居易等大家的詩文選注也陸續出版，繆鉞的《杜牧傳》、王拾遺的《白居易傳》、吳汝煜的《劉禹錫評傳》等作家評傳中，也有對他們散文成就的評述。單篇論文涉及的範圍更廣一些，晚唐的皮日休、羅隱，中唐的權德輿、崔元翰，盛唐的李、杜散文也都有觸及。

但是，唐代散文研究與唐文實際的文學地位相比是不相稱的，與唐詩研究相比也相對滯後得多，與其他時段的散文研究如先秦散文研究相比，也有明顯的不足。這種滯後一是表現在研究的對象相當狹窄。從文學集團來說，中唐古文運動研究得相對多一些，晚唐的小品文作家研究得就少一些，咸通十哲研究在此時段還無人提及。就以就以影響廣泛的古文運動而論，韓、柳討論得要充分一些，元結、李華、獨孤及、皇甫湜等韓、柳前期或同期古文家則很少論及；再以韓、柳而言，唐宋八大家的選本、鑑賞出得較多，韓、柳散文獨特的藝術特徵，這種風格與他們的文學主張、與時代風尚（比如佛教的流行）有何關係？韓、柳散文與歐、蘇散文有何不

同等等研究，在八十年代都還未曾展開。就作家而言，面就更窄：除韓、柳以外，唐代的一些散文大家，如張九齡、陸贄、李德裕以及號稱燕許大手筆的張說、蘇頲等在研究上幾乎是空白。對白居易、劉禹錫等詩文大家，也往往更多地注意他們的詩作。至於從「四傑」到李商隱、韓偓的駢文更是很少有人提及。「至於唐代散文藝術的專題研究，如文體、文章風格與流派、藝術技巧、文學語言等方面，更有待於深入」^⑤。

唐代散文研究的相對滯後，在八十年代已引起一些學者的關注，王運熙就曾發出過呼籲：「多研究一點唐代散文。」他認為當時唐代散文研究滯後是不正常的，而要改變這種狀況，要做到四個打破：要打破對韓愈的偏見；要打破「唐宋八大家」框框；要打破輕視駢文的偏見；要打破重詩歌、輕散文的偏見^⑥。

三、沈思縱深段(1990-2000)

經過十年的活躍新變後，九十年代的大陸唐代文學研究由風起濤湧進入了深沈內斂的沉思縱深階段。從現象上看，這十年的唐代文學研究發展曲線，基本上呈馬鞍型：

八十年代末到一九九一年是個活躍期。這個時期挾八十年代中後期火爆之勢，各種學會和研究會紛紛成立、活動頻繁。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湖南平江召開「杜甫在平江」學術討論會；六月在四川射洪召開全國首屆陳子昂學術討論會；九月，唐代文學學會第四屆年會在太原召開；一九八九年三月，在廣東韶關舉辦全國首屆張九齡學術研討會；一九九〇年九月在成都草堂召開杜甫研究會第六屆年會；十一月在南京召開唐代文學學會第五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一九九一年四月，首次駱賓王討論會在浙江義烏舉行；五月，首屆王維詩歌學術討論會在西安召開並成立了王維研究會，「中國首屆唐宋詩詞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南京召開，「中國首屆李白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在馬鞍山召開；十月齊己詩歌研討會在湖南益陽召開。其間的著作和論文數量也較多，如一九九〇年出專著七十三種，發表論文九百一十篇；一九九一年專著五十九種，論文八百七十三篇，明顯高於整個九十年代專

^⑤ 孫昌武：〈散文研究〉，《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83》，頁 99。

^⑥ 王運熙：〈多研究一點唐代散文〉，《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85》（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 1。

著五十一種、論文七百四十九篇這個平均數⁵³。

從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五年是個低潮期。出版市場萎縮，學術刊物減少、發行量減少，著作和論文的數量明顯遞減。據統計，一九九二年發表論文四百九十八篇，一九九三年論文五百七十五篇，兩年專著六十八種；一九九四年專著三十三種，論文八百六十三篇；一九九五年專著二十一種，論文七百六十八篇。學會的活動節奏放慢，研究會的成立漸次消歇。一九九二年續前期之勢，還成立了韓愈研究會（8月於河南孟縣）和李商隱研究會（11月於廣西桂林、平樂），到一九九三年八月在廣西柳州成立的柳宗元研究會就已成爲絕響，在此以後，再無新的唐代作家研究會成立。

從一九九六年到本世紀結束是復振期。表現出的狀況更爲複雜多變。從數量上來看，這期間著作和論文數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一九九六年專著八十五種，論文八百零一篇；一九九七年專著七十種，論文七百零三篇；一九九八年專著六十九種，一九九九年專著六十四種⁵⁴。但由於商品大潮的衝擊，部分研究人員開始趨時，不願意再下那種既消耗時間又費力氣的輯佚、箋注、考辨之類基礎性札實功夫，甚至在普及類讀本中連八十年代的賞析文字也不願多寫，僅選些詩文，加幾句評語就匆匆推出。出版界中有些人乾脆把不存在版權和稿費的古本拿來重排或直接影印出版；第二出版渠道的盜版之風更加盛行。爲了迎合公款消費，編大型的「集成」、「大全」、「大觀」之類的叢書越來越成爲時尚，而且分類的名目越來越花樣翻新：或按人物，如僧人、道士、婦女、名臣、名將、帝王出個全集；或按情感、事類如思親、懷鄉、交遊、戰爭、愛國來編「大全」；或按物類，如山水、亭閣、花草來編「集成」。因此，比起八十年代，出版物的數量雖有所增加，但相對質量卻有所下降。現將八十年代末與九十年代末的唐代之文學各類出版物列表對比如下：

⁵³ 九十年代唐代之文學著作論文統計參用張明非：〈九十年代以來唐代之文學研究回顧〉，《唐代之文學研究年鑑 1999》，頁 39。

⁵⁴ 作者成書時，2000 年的著作、論文數因缺乏資料無法統計。

年份	著作總數	鑑賞辭典 (%)	普及讀物 (%)	選本	再版、翻印古籍	箋注、集解	專論通論
1988	61	6	20	18	5	6	6
1989	62	5	18	16	4	9	10
1997	69	5	22	23	13	2	4
1998	64	4	20	24	8	3	5

從上表可以看出，九十年代末與八十年代末相比，唐代文學的論著數量有所增加，但類別上考據類、專論、通論類明顯減少，直接翻刻古本的明顯增多，各種選本、選注也相對增多，鑑賞辭典和通俗讀物仍樂此不疲。這裏統計的是唐代文學方面出版物，還不包括含唐代文學在內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家作品或古今作家作品的分類叢書、集成之類。

值得慶幸的是，面對商品大潮的巨大衝擊，古代文學研究的普遍疲軟態勢，中國學者的傳統品格又一次迸發出絢爛的火花，他們又一次在固守和堅持，但此番的固守和堅持，不同於五、六十年代那種政治壓力下的學術品格的固守和抗爭，相反卻是在政治寬鬆，自由度、選擇性加大的情況下，人生追求上的自持和把握。「千淘萬漉終辛苦，狂沙吹盡始見金」，正是這種執著的自持和把握，使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成為繁華搖落後的虬勁，百川匯聚後的深沉。

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成果，集中表現在以下八個方面：

1. 文獻資料的輯佚整理、索引編目與八十年代相比，持續的時間更長，有時需要十幾年、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努力，因而更帶有總結性質，更加大型化、系統化

陳尚君等人的《新編全唐詩》已經努力了十多年，目前仍在進行之中。已經出版的曾昭岷、王兆鵬等人的《全唐五代詞》，也用了近十年的時間。與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文獻資料整理已遍及詩歌、小說、散文、詞曲、筆記等各種體裁，總集、資料彙編、辭典索引、補編、補遺、集解彙解、地理方志等各種門類，而且大型、全面、系統，更帶有學術總結的性質。如唐人小說方面資料總集有王汝壽的《全唐小說》（山東文藝出版社，1996年）；李時人《全唐五代小說》（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上下）（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方積雲、吳冬秀《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中華書局，1992年）；中華書局還於一九九四年推出一套《歷代史料筆記叢書》，其中有唐人筆記《明皇雜錄》、《東觀奏記》、《隋唐嘉話》、《朝野僉載》、《大唐

新語》六種。詩文總集方面有陳尚君的《全唐詩補編》（中華書局，1992年）；吳綱《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周祖謨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隋唐五代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1年）；陳抗、林滄等人的《全唐詩索引》（高適卷，李商隱卷，劉禹錫卷，杜牧卷，王維卷，韓愈卷，岑參卷，孟浩然卷，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卷）（中華書局，1994年）。詩文別集方面有裴斐的《李白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94年）、吳企明的《李賀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94年）、《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文史地理資料有郭預衡《中國古代文學史長編·隋唐五代》（北京師範出版社，1993年）、郁賢皓《元和姓纂（附四校記）》（中華書局，1994年）、周勛初《唐人佚事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隋唐五代墓誌彙編》（1992年）、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楊鴻年《隋唐兩京坊里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從上面開列的一長串書單中不難發現：

(1)九十年代的古籍整理不僅更帶有學術總結的性質，而且整理彙編的對象也更加具體、更加專門化，既有像「新編全唐詩」、「新編全唐五代詞」那種的總體性的彙編，更多的是細分為唐詩評論方面的、佚事方面的、筆記小說人名方面的，乃至小說中志怪傳奇類別的類編。另外，蒐羅的資料更加豐富、更加全面，整理、剔除也更加精嚴。如周勛初的《唐人軼事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收集唐五代歷史人物近二千七百人，共一百七十餘萬言，引用唐宋人所撰的雜史、傳記、故事、小說近三百種，是到目前為止蒐羅最富、規模最大、體例最精的一部唐五代人物資料庫。其《唐語林校正》（中華書局，1986年）則廣羅了《唐語林》的各種版本，並以唐人總集、別集、史書、類書及筆記雜著數百種參校，溯源考異，對其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和廓清，不僅找到了大多數條目的原始出處，又從《永樂大典》等書中輯得佚文十九條，使之成為歷代蒐羅最富、校讎較精的一個善本。郁賢皓、陶敏整理的《元和姓纂（附四校記）》（中華書局，1994年）也是一例。唐林寶於元和年間撰的《元和姓纂》是現存史料價值最大的一部古代姓氏書。但自南宋以來，輯本文字衍、奪、訛、倒處甚多。一九四八年，岑仲勉為其作校正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蒐羅之宏富，考訂之嚴謹，立論之精審，為當時的學術校勘樹立了標杆。郁賢皓、陶敏將《元和姓纂》和岑仲勉的《元和姓纂四校記》合為

一書，用文淵閣本、文瀾閣本和嘉慶刻本對岑氏所據的文津閣本對校，並以《世本》、《新表》、《古今姓氏書辨證》、《通志》等有關典籍參校，改正了岑著疏漏、錯誤之處；對岑氏未及校的《元和姓纂》中的重要異文加以補校；彙入岑氏之後五十年來的今人研究成果；對《元和姓纂》和《元和姓纂四校記》存疑處提出己見。因而使《元和姓纂》的整理校勘在岑著之上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陳尚君的《全唐詩補編》繼八十年代王重民、孫望、童養年的《全唐詩外編》之後，又輯得《全唐詩續拾》六十卷，四千六百餘首，殘句一千一百餘句，相當於《全唐詩》收詩總數的七分之一，作者總數的一半。遠遠超過了前人所輯唐代佚詩的總和。編者在集佚的過程中，遍蒐了四部典籍、方志譜牒、佛道兩藏、石刻法帖、敦煌遺書、域外漢籍，僅方志一類，陳氏就翻閱過兩千多種。以佛經而言，陳氏除充分利用了《大正新修大藏經》和日本的《續藏經》外，還翻閱了未入藏的敦煌本《壇經》、《祖堂集》、《明州樂林寺志》、《高僧山居詩》等，「在經濟大潮席捲神州的今日，如果沒有獻身學術的執著精神，是絕對做不到這一點的」⁵⁵李時人《全唐五代小說》費時十年，成書一百卷，收作品一千三百一十三篇（另有外編二十五卷，作品八百零一篇）且逐篇有考證、校勘。不但網羅了現有的各種單篇和成集的唐五代小說，而且還遍檢諸家別集、文章總集、叢書類書、佛藏道藏、稗史地書、敦煌遺書。他是「前人作家作品考證」和「八十年代理論研究成果」的集合⁵⁶，也是當前唐人小說資料整理階段性成果的代表。

(2)在這串書單的作者中，有的名字在八十年代就已出現，而九十年代成果更豐，並未因商品大潮和世俗而位移，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已成為當今大陸唐代文學乃至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有影響的乃至代表性的人物，其中傅璇琮的貢獻更者得一提。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傅氏一直懷著對學科建設的強烈使命感，除了前面提到的領導、組織、協調包括「唐代文學學會」在內的一些學術組織和學術活動外，更多的是從事唐代文學研究的實踐，主持編撰了一批有關唐代文學的大型文獻資料，撰寫了幾種眼光獨到的作家行年及資料方面的專著，以及一批有關唐代文學學科建

⁵⁵ 陶敏：〈評《全唐詩補編》〉，《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95、1996 合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56。

⁵⁶ 李時人：〈斷代小說總集《全唐五代小說》編纂的有關問題〉，《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99》，頁 288。

設的論文。自八十年代的《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李德裕年譜》、《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與張忱石、許逸民合作）之後，九十年代又與一些學者合作編校了《唐才子傳校箋》（中華書局，1995年）；《唐人選唐詩新編》（陝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唐五代文學編年史》（遼海出版社，1998年），《李德裕文集校箋》（和周建國合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以及個人的專著《唐詩論學叢稿》（黑龍江出版社，1992年）等，他主持的《中國古籍總目提要》亦正在進行之中。這些大型的學術資料齊備而嚴實，為研究者省儉了許多翻檢之勞，也為後學提供了入門之徑，是件功德無量之事。特別是其中的《唐才子傳校箋》，在其主編的四卷本出版後，隨著出土文物的不斷湧現和唐文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傅氏又約請陳尚君、陶敏這兩位古典文獻專家寫第五卷，作為對前四卷的增補和訂正。「善與人同」和「學術乃天下之公器」這個古訓和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唐才子傳校箋》出版過程中得到了很好的驗證。程千帆認為：「即使是對現代中國學術動態不十分留意的人，也不會忽略傅先生的學術活動，特別是他在唐代文學研究方面的活動和成就。總的說來，在本世紀最後三十年中，傅先生所取得的成績是卓著的，影響也是非常巨大的。」^⑦他的單篇論文〈文學編年史的編寫與唐代文學研究〉、〈關於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的思考〉、〈文學古籍整理與古典文學研究〉以及為《中國古典文學走向世界叢書》、《百年學科沈思錄》寫的序和《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的「自序」等，對唐代文學研究的現狀、得失，未來的走向、趨勢，應對未來的理論準備和實施思考，以及唐代文學的史料學、唐詩學、唐代文學史、唐代學術史等學科建設都有著細緻的分析、切實的建議和前瞻性的思考。

2. 別集的疏證、箋校、編年、考論由於出版的艱難而出現了一批精品

中國有句古老的格言叫「艱難困苦，玉成於汝」，很能說明大陸九十年代唐人別集研究情形。由於研究經費的短缺和出版業的價值取向，研究者不願選擇這類課題，出版業也不願做這類出版品。所以一旦出版，總有其獨到之處，一般說來都是精品，而且比起八十年代的同類出版物，積蓄的時間更久，資料的收集更為豐厚。以錢學烈的《寒山拾得詩校評》為例，八十年代初，作者的碩士論文即是《寒山詩

^⑦ 程千帆：《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序》（瀋陽：遼海出版社，1998年），頁2。

語言研究》，自一九八三年起，陸續發表〈寒山子與寒山詩版本〉等論文，八十年代末完成《寒山詩校注》交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當時雖屬填補空白之作，但疏漏錯處不少。作者從一九九三年起開始對該書進行補正，並利用出國講學之機，蒐集了港、臺、日、韓等一批海外資料，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又兩次去浙東天臺山寒山故地考察。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寒山拾得詩校評》（天津古籍出版社），可以說是著者近二十年寒山研究成果的一個集結，比起八十年代的《寒山詩校注》，更精當一些，也更豐厚一些。周勛初〈唐人筆記小說考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從目錄學入手，結合政治、歷史、宗教多種因素，將唐代筆記小說置於唐代文化的大背景下予以審視，然後再將微觀的實證性考辨結論上升為宏觀理論的闡發。這樣，既使考證不至於一葉障目、釘蝕瑣屑，也使闡發的理論不至於空洞浮泛。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收集作者八十年代以來有關唐代文學的考辨文章二十三篇。其中的《全唐詩誤收考》考出誤收入《全唐詩》的唐以前和宋及宋以後的詩作七百八十二首，詩句五十三句，詞三十四首，涉及作者一百十五人，引書達三百種以上。其《唐人編選詩歌總集目錄》，共考出唐人所編選的詩歌書籍一百三十七種，比今人所論及的多出八十多種，而且提供了大量今人未曾注意的材料。其〈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在全面考察唐宋元明有關記載的基礎上，認為《二十四詩品》並非司空圖所作，蘇軾的《書黃子思詩集後》與《二十四詩品》無關。此說一出，在唐詩學界、文論界引起了強烈震動。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完稿於九十年代初，因出版艱難而擱置，直到一九九六年，方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閒置的五、六年中，作者得以反覆磨勘增補，成為煌煌百萬言的巨著。比起九十年代初吳汝煜、胡可先的《全唐詩人名考》又有所發展增進：陶著不但考出何人，而且證為何人之後，並列出與此詩作有關的文獻；對其中事跡稍晦者，則廣稽文獻勾勒其生平，因而以多所發明、用思細密見長。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則對現存的唐五代二十八種詩格文獻進行校考。在每種詩格的「解題」中，對該文獻的存佚、歷代中外著錄、舊題的作者小傳、校考的依據及參考的諸本作出說明，並對該文獻的形式、內容作出分析。校考之中則廣蒐異本，參考諸本異文，對各詩格的關係、源流細加比較，吸收中外學者成果，以定取捨，使唐詩史、古典文學批評史的研究者，在論及唐五代詩格時，有了一個完備的、可以信賴的本子。

類似的箋證、校注還有：詹鍈主編的《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百花文藝出

版社，1997年）；錢仲聯、馬茂元《韓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劉衍《李賀詩校箋證異》（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項楚《王梵志詩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康金聲《王績詩編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賈晉華《皎然年譜》（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年）；王定璋《錢起詩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傅義《鄭谷詩編年校注》（華東師大出版社，1993年）；張志烈《初唐四傑年譜》（巴蜀書社，1993年）；祝尚書《盧照鄰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劉開揚《岑參詩集編年箋注》（巴蜀書社，1995年）；張錫厚《敦煌賦校錄》（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潘慧惠《羅隱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儲仲君《劉長卿詩編年箋注》（中華書局，1996年）；陳鐵民《王維集校注》（中華書局，1997年）；羅時進《丁卯集箋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陶敏、王友勝《韋應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等。

類似的考訂還有：吳汝煜、胡可先《全唐詩人名考》（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李健超《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閻文儒、閻萬鈞《兩京城坊補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林繼中《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吳在慶《唐五代文史叢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韓理洲《唐文考辨初編》（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三秦出版社，1995年）；吳在慶《唐五代文史叢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陳國燦、劉健明《全唐文職官叢考》（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

近年來，對資料考證在唐詩研究中的位置，以及如何看待資料考證和理論研究的關係，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有人認為九十年代的古典文學研究界有股「考據至上」和「制譜成風」的「私人化」傾向，他「是二十年代『整理國故』思潮的回流」，「是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窮則獨善其身』隱逸心態的現代變種」。前者是「一味以考據自娛，不以解決有價值的問題為目的，不以研究的『有效性』為準則，而是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裏標榜自身『博聞多識』，這正是典型的私人化心態」；後者則是「熱衷於為一位位大大小小的文學家編制年譜，排比他們的陳年往事、仕跡交遊、作品繫年，並以此為終極目的」，「這不也是典型的『私人化』傾向嗎」？論者認為這種「私人化」傾向「不僅消解了主流意識形態」，也「從根本上斫喪學

術的生命」^{⑤⑧}。尚永亮在唐代文學第九屆年會上代表第一組的發言中則強調「要重視研究中的理論創造。理論創造是學術研究的生命，沒有理論創造的研究是難以將學術推向深入的」，「這種研究，要比就某一偏僻問題作點小考證困難得多，也有價值得多。真正的學者不應避難就易，只著書不立說」^{⑤⑨}。杜曉勤在同期年會中代表第二組發言則認為：「資料考證與理論研究，各有所長，目前都取得了可觀的成績。二者並不是互相排斥、有高下之分的，如果能兼善並濟，在考證的基礎上再進行理論思考，則會取得更大的學術成就」^{⑥⑩}。

3. 專論和通論方面的論著與八十年代相比，給人一種鉛華洗盡、瘦峭精勁之感

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專論更加精深，更多新見，在標新之際也有著更深層的思考。如劉學鍇《李商隱詩歌研究》是繼作者和余恕誠合作的《李商隱》、《李商隱詩選》、《李商隱詩歌集解》之後獨立完成的一部專著。全書分爲〈本體篇〉、〈源流篇〉、〈研究史篇〉、〈考辨篇〉、〈餘論篇〉五大部分，涉及到對李詩的本體、源流研究（內中又有與樊南文的交叉研究）、李商隱詩歌研究史和行年考辨，可謂博大精深。既動用了作者在二十多年來李商隱研究中的豐富積累，又有所發展和創新。如專著的最後一部分，作者稱作〈餘論〉，僅一萬七千多字，卻彌足珍貴。它討論的是研究者們尚未涉及的李商隱詩歌接受史，而且力圖從這一新的角度來解決李商隱詩歌的多義性以及歷來人們對此的歧見。作者打算「結合在編撰《李商隱詩歌集解》的過程中所獲得的對這類詩特徵的認識，來說明這類歧解何以產生以及爲什麼能夠加以融通」^{⑥⑪}。可見作者的這種新的角度和新的努力正是他幾十年研究積累的昇華和飛躍。據悉，作者和余恕誠合著的《李商隱文校注》亦將在二〇〇一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更是李商隱研究的拓新。吳在慶是位很有學術個性的學者，他將「追求新的發現與突破」作爲自己著述的原則，這一精神在他的《杜牧論稿》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該書集中反映了作者十餘年來治

⑤⑧ 郭英德：〈論古典文學研究的「私人化」傾向〉，《文學評論》，2000年第4期。

⑤⑨ 尚永亮：〈唐代文學研究應該朝什麼方向發展〉，《唐代文學研究年鑑1999》，頁65。

⑥⑩ 杜曉勤：〈關於唐代文學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學研究年鑑1999》，頁69。

⑥⑪ 劉學鍇：《李商隱詩歌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04。

小杜的成果。凡論及杜牧的政治思想、文學主張、藝術風格，一概不蹈襲成說，而著重對那些「人所罕道或爭論紛紜的問題」發表己見。如論及杜牧政治思想時，著重討論學術界歧說不一的杜牧與牛李黨爭的關係；論杜牧文學成就，注意於研究相對薄弱的古文；研究詩歌時，又特意列出歷來較少注意的古詩；論及杜牧文學主張時，也不做泛泛地論述，而是著重討論歷代學者聚訟紛紜的杜牧與元白的一段公案。由此可見作者著述角度之獨到，亦可見作者在書中展示給人們的確是他多年潛心研究的成果。蘇北海的論文〈岑參西域詩及其歷史功績〉（《新疆大學學報》，1996年3月）一反傳統之說，認為岑參在安息一帶的詩作不應稱「邊塞詩」，而應叫「西域詩」，因為詩的內容主要是龜茲以東的風物及民族，皆在當時唐王朝境內，即使是最遠的熱海（今伊塞克湖），離那時的邊境還有幾千里；另外，過去皆認為高適、岑參的區別在於一是「尚質主理」，以記實為主，一是「尚巧主景」，以浪漫想象為主。蘇文則認為「寫實」也是岑參西域詩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作者以自己三上「赤亭」以及一些自然科學資料為據，指出岑詩《火雲山送別》、《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走馬川行送封大夫出師西紀》中所寫的「火山」、「胡天八月即飛雪」的奇寒，「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的狂風都是真實存在的，在今天的新疆一些地區仍然存在。作者把文史資料、自然科學、實地考察結合起來得出新解，應當說無論是研究結論還是研究方式，都是很有價值的。

二是論通涉獵的範圍更廣，更多了一些文學史海的鈎沉和思考方式上的創新。蔣寅《大曆詩人研究》是以其碩士論文《戴叔倫研究》和博士論文《大曆詩風》為基礎拓展加深而成。作者以地域文化和詩人群體為切入點，對劉長卿、「大曆十才子」、皎然、吳筠等三十多位大曆詩人的家世、生平、創作道路和文學風格的形成、流變，一一作了考索和析論。其中新見迭出，像包佶、陸羽等人的生平創作考證都是填補空白的開創性之作，不僅在唐詩研究史上有很大意義，對中國財政史、茶葉史、經濟史研究也是貢獻多多。程國賦的《唐代小說嬗變研究》以一個時代、眾多作品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嬗變規律，有目的地去揭示某些帶普遍性的結論。對其嬗變規律，作者從題材、體裁縱橫兩方面進行了探討。題材上分為神怪、婚戀、逸事、佛道、俠義五大類別：神怪小說方面後世的嬗變之作對唐人小說中「鬼物假託」的特點進行了揚棄，出現了從神化、動物化到人化、社會化的演變趨勢；婚戀小說的嬗變規律表現為門第觀念的逐漸淡化；逸事小說的嬗變一是描寫中心由逸事

向時事轉換，二是中心人物由唐人小說中的武人、官吏改換為文人，或被抹上濃厚的文人氣息，借助於唐傳奇中文人事跡的改造，表達文人得意的主旨；佛道小說的嬗變表現為佛道儒三家逐漸融合，其勸戒色彩加濃；俠義小說的嬗變也體現為社會教化功能的日益增強。體裁上的嬗變分為文言小說、白話小說和戲曲三大類，再分為話本、擬話本、雜劇、傳奇等若干小類和宋元、明清等若干時段。吳在慶的〈咸通十哲之論〉（《中州學刊》，1992年6月）首次對唐末的一個詩人群落——咸通十哲進行考論，考明十哲並非十人而是十二人，並對許棠、喻坦之等十二人的行年、創作分別進行考辨和比較，指出他們作為一個創作群體的共同特徵和價值取向，以及他們和中唐姚合、賈島等人的承續關係。

專論和通論方面代表性的專著還有：鍾優民《新樂府詩派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東方出版社，1993年）；鮑明煒《唐代詩文韻部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陳鐵民《王維新論》（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0年）；葛曉音《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胡先可《杜牧研究叢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詹幼馨《南唐二主詞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李華珍、傅璇琮《河岳英靈集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王拾遺《元稹論稿》（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儲斌傑《白居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李至樸《許渾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唐代文學學會《王維研究》（中國工人出版社，1993年）；余正松《高適研究》（巴蜀書社，1994年）；朱金城、朱易安《李白的價值重估》（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蕭瑞峰《劉禹錫詩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卞孝萱的《劉禹錫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丁鼎《牛李黨爭研究》（遼海出版社，1998年）；王蒙、劉學鍇主編《李商隱研究論集》（廣西師大出版社，1998年）等。

我們要把握唐詩的總體風貌、時段特徵，瞭解唐代文學詩體、文體及小說等的流變規律，這種作家群體研究、流派研究、分期研究等通論式的研究是必不可少，而這種通論研究又必須建立在深入獨到的作家研究以及體式、創作流程的研究之上。現在的問題是，類似上述的精到和富有獨創性的專論和通論還太少，某某類詩選，某某類大全之類的「選集」和「全集」卻太多。有些名曰專論卻並不專深，通論也顯得空洞浮泛，「臆測、假想成分多，真正能說明問題的過硬材料少」，「有些考證文章沒有一條新材料，卻冠以『新考』、『新說』、『新

探』」^②，我們常抱怨沒有精當的唐代文學史和體裁流變史，除了文學史料的發掘和研究仍嫌不夠外，也與缺少有眼光的專論和通論有關。

4. 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趨向是朝橫向拓展和縱向深入

所謂橫向拓展一方面是指研究範圍不斷擴大，在物件對象上，除了李白、杜甫、王維、韓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賀、李商隱等大家繼續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外，中小作家研究也普遍展開，還專門召開過張九齡、駱賓王、陳子昂、胡曾等人的研討會。李百藥、李治、郭元振、權德輿、玄奘、綦毋潛、皇甫冉、呂溫、可朋、竇群、牟融、李廓、薛逢、方幹、鄭嵎、魚玄機、李峒、鄭遨、崔致遠、胡曾、徐寅、孟賓于等過去很少觸及甚至沒有觸及的小家也開始了研究。如翟傳增〈鄭遨及其創作〉（《河南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吳在慶〈關於方幹生平的幾個問題〉（《文學遺產》，1997年第4期）、湯華泉〈劉珂生平事跡考辨〉（《古籍研究》，1995年第4期）等。在研究類型上，從傳統的詩文和唐五代詞研究擴大至唐賦和駢文甚至戲曲研究，如霍松林〈論唐人小賦〉（《文學遺產》，1997年第1期）、許結〈論唐代賦學的歷史形態〉（《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曹明綱〈唐代律賦的形成、發展和程式特點〉（《學術研究》，1994年第4期）、莫道才〈駢文在唐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廣西師大學報》，1990年第4期）、譚勇民〈唐宋戲曲理論四題芻議〉（《桂林教育學院學報》，1990年第3期）等。小說方面也不只注目於傳奇，國史、筆記、軼事、志怪等體類的作家作品研究，總體特徵和流變史的研究也已經開始，如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周勛初〈唐代筆記小說的內涵及特點〉（《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1995年第2期）等。敦煌研究也從雲謠曲子詞、敦煌變文擴展至敦煌賦、唐詩寫卷、壁畫故事及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如《敦煌賦校注》、《敦煌文書校讀研究》、《敦煌音義彙考》、伏俊連〈試談敦煌俗賦的體制和審美價值〉（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敦煌賦校補〉（《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4年第2期），張先堂〈敦煌唐人詩集殘卷（P.2555）新校〉（《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等。文學理論方面也不再只注意詩歌理論，詩韻、詩式、詩格研究在這一時期的成果更特別引人注目，如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

^② 張明非：〈九十年代以來的唐代文學研究回顧〉，《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99》，頁 41。

張少康〈皎然《詩式》版本新議〉（《國學研究》，1994年第2期），曹大中〈齊己〈風騷旨格〉十體臆說〉（《益陽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等，有關《二十四詩品》作者的真偽之爭更是人們關注的論題。

橫向拓展的另一種內涵是指涵蓋面更為廣泛，更注意整體的、宏觀的把握。對一個作家的研究，不僅注意其主要的創作成就，也考索他其他方面的創作情況，力求呈現一個作家的全貌，如對李商隱，不僅注意《樊南詩集》，也開始研究《樊南文集》，並著手編輯《李商隱資料彙編》。研究張九齡、皇甫湜的詩作，也注意他的文；研究張說、李德裕的文，也注意他的詩，這都使研究的視野更為寬廣，思考空間的自由度更大。同時，研究者在對史料作深刻的發掘和全面把握的基礎上，更注意一種歷史文化的橫向思考和人文精神的總體探究，這是更為重要的一種橫向拓展。余恕誠的《唐詩風貌》（安徽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1998年由臺灣文津出版社出版時改為《唐詩風貌及文化底蘊》）即是成功的一例。這部論著所討論的實際上是兩個方面問題：一是唐詩的總體風貌以及各個階段的風格特徵；二是形成這種特徵的唐詩本身及外部諸因素，其中談到的民族精神變遷和地域文化差異，強調了人文精神和人文關懷，這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即使注意到也似不及此論深刻，因而彌足珍貴，如在論析中唐韓、孟和元、白兩大進士集團詩歌風貌時，不僅從史科學的角度，辨析了這兩個不同文學集團，以及同一集團內的不同作家和同一作家不同的創作階段在創作風格上的差異，而且從當時「科學、文學、政治」三位一體的獨特時代特徵來探討這種風格的形成原因，以及他們身上所體現出的不同人文品格，從而跳出了傳統論家對唐詩風格特徵的外部描述和現象勾勒，為唐詩風格學的研究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也為唐詩研究從傳統走向現代化提供了範例。尚永亮的三本專著《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臺灣文津出版社，1993年）、《浪漫情懷與詩化人生——唐代文人的精神風貌》、《科學之路與仕宦生涯——唐代文人的仕宦生涯》（臺灣文津出版社，2000年）皆是從文化學或歷史文化學的宏觀角度來探討唐代文人的文人品格、創作規律和政治悲劇。在《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中，作者將元和文化精神概括為三個層面：不甘衰敗發奮圖強的復興精神和建基於多難興邦哀兵必勝信念之上的進取精神；立足現實志在用世而又充滿理性色彩的文化重建和文化追求；與激切昂揚的參政意識和批判精神緊相關聯的許國不復謀身的心性情懷。然後以此為背景，將柳宗元、劉禹錫、韓愈、元稹、白居易這元和五大詩人的貶謫分為三個階段，分析他們的執著意識和超越意識的個別特徵

和共同之處，他們熱衷於佛教的三層不同內涵；其貶謫文學的悲劇基礎和藝術上的獨特性。《浪漫情懷與詩化人生——唐代文人的精神風貌》則認為浪漫情懷與詩化人生是唐代文人生活中最閃光的亮點，作者從讀書山林、終南捷徑、漫遊干謁、邊塞田園等方面詳加考論，著重揭示其自由心性之養育，浪漫情懷之生成，壯大與平和之美，社會責任之承擔和凡俗世界之超越等文化品性和審美特質。《科舉之路與仕宦生涯——唐代文人的仕宦生涯》則以歷史文化研究的方法，從科舉考試、幕僚生活、政界角逐、朋黨之爭、貶謫生涯、劫後餘生、吏隱與超越諸方面，深入分析唐代文人的生存狀態和心路歷程，以及這種人生道路與其創作風格的形成和變化之間的關聯。類似的論著還有趙克堯〈盛唐氣象論〉（《復旦學報》，1991年）；孫昌武〈唐詩與文化積澱〉（《天津社會科學》，1994年）；林繼中〈由雅入俗：中晚唐文壇大勢〉；劉尊明、王兆鵬〈本世紀唐宋詞研究的定量分析〉（《湖北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胡濤〈大唐風度——唐代文人心態與詩境〉等。

所謂縱向深入包括文本研究的深入和研究層面的深入。

以文本研究而言，無論是作家生平、作品內容還是作家群體、流派乃至文學體裁、時段研究，都在向縱深發展。過去人們研究李賀的詩，往往著眼於賀詩的荒誕，色彩的濃重和死亡意識，馮芝生的〈李賀詩韻考〉則從賀詩用韻的獨特視角來探討賀詩風格；人們論及盛唐詩風的形成，往往歸功於國家的統一、南北詩風的融合，杜曉勤的〈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詩歌的藝術精神〉（《文學評論》，1999年第4期）則從地域文化理論出發，認為當時實際上存在著江左文化、山東文化和關隴文化三大塊，而盛唐詩風正是這三大塊互相碰撞、互相融合的結果，這都使作家研究和時段研究更為深入。在群體研究中，尙永亮的《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趙昌平的〈吳中詩派和中唐詩歌〉；臧清〈論唐末詩派的形成和特徵——以咸通十哲為例〉；胡可先〈吳富體考論〉（《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屆年會論文》，2000年10月）；李中華〈晚唐「三十六體」辨說〉（《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屆年會論文》，2000年10月）；賈晉華〈《漢上題襟集》與襄陽詩人群研究〉（《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屆年會論文》，2000年10月）；陳鐵民〈論律詩定型于初唐諸學士〉等，或是對一個歷史上確實存在，但過去很少注意甚至沒有注意的詩歌流派進行發掘，做一些開拓性的工作；或是從詩歌的藝術形式和表達方式來探討唐詩的流變歷程，從而把群體研究和總

體研究引向縱深。如吳相洲〈論盛中唐構思方式的轉變對詩風新變的影響〉認為中唐詩人構思的特點是有意打破盛唐意與象之間的平衡，或是特別強調物象，不要情意的統合作用；或是特別強調情意的表達，置物象本身的特點於不顧。作者認為「中唐詩風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這一構思方式的變化」^⑥。吳氏還有一篇論文〈文以明道和中唐文的新變〉（《文學評論》，1996年第1期），在比較盛唐蕭、李古文集團和中唐韓、劉等人的古文主張後認為「在文章中加強明道意識是中唐文章相對盛唐所發生的最大變化」。論文中對儒學復興過程及與現實關係，文以明道形成過程中一些重要觀念的確立，古文運動對前代的取捨，古文創作與傳奇的關係等過去不夠深入的問題也發表自己的新見，應當說都是一些有力度的較為深刻之作。

就研究層面而言，開始把關注的焦點由外向內，由作家的生活時代、生平事跡研究和作品思想價值評估、藝術特色描述等本體研究，深入作家心靈世界，探討其創作動機、情感變化和心路歷程。如董乃斌《李商隱的心靈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將對李商隱的行年考辨、作品內容風格析論轉移到詩心的探求上來。作者在書中不但強調將李商隱放在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縱軸和他所處的時代橫斷面所構成的立體座標圖系上來考察，更多的是對作家心靈世界進行了一系列頗有新意的探索。其中對李商隱詩歌語象——符號系統的分析示例：「蝴蝶」象徵意義的探索就是很有意義的一個嘗試。作者先從縱的方面對李商隱詩歌中最常用的語象之一「蝴蝶」進行歷史的考察，從中歸納出「夢蝶」和「化蝶」這兩個語象——符號系統，在此基礎上對李的以蝶為題的五首詩的象徵涵義作具體分析，從中得出精到之見。然後再從橫的方面聯及李詩中與「蝶」的語象有不解之緣的「蜂」語象，指出其內涵或顯或隱地皆與冶遊、豔情等男女情愛的象徵和潛意識有關。孟二冬的〈論中唐詩人的審美心態和詩歌意境的變化〉（《文史哲》，1991年），比較了中唐詩人與盛唐詩人在主觀情景、藝術趣味、審美標誌、境界追求上的不同，以及這種審美心態的變化與當時社會政治、文化特質之間的關係。類似的論著有王東蕾〈長吉心態新識〉（《河北師院學報》，1991年第3期）；王蒙〈混沌的心靈場——談李商隱無題詩結構〉（《文學遺產》，1995年第3期）；尚永亮〈冷峻：

^⑥ 吳相洲：〈論盛中唐構思方式的轉變對詩風新變的影響〉，《首都師大學報》，1997年第3期。

柳宗元審美情趣和悲劇生命的結晶〉（《江漢論壇》，1990年第9期）；全五德〈一位正直而軟弱的詩人——王維心態探微〉（《長沙水電師院學報》，1990年第1期）等。

儘管我們在上述兩方面都取得了驕人的成就，但是，無論是橫向的拓展還是縱向的深入，做的都還遠遠不夠。而且學者們對此的認識也不盡相同。最近，有的專家對如何處理大家與小家的關係提出不同的看法。袁行霈認為「研究的佈局有待進一步調整，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大作家和一流作品，並用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來帶動整個文學史學科的發展。文學史研究方法的改進也要靠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創新性研究來示範」^④。陶文鵬認為：「從研究課題來看，唐詩中的小家或以前不被重視的詩人越來越多地納入了研究者的視野，這是可喜的；然而對唐詩的大家、名家的藝術研究，除了李商隱研究收穫最大，白居易、劉禹錫研究也有一些新成果外，對於李白、杜甫、王維、韓愈、韋應物、劉長卿、孟郊、柳宗元、李賀、杜牧、溫庭筠、韋莊等人的研究論著不多，也很少能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深入開掘」，因此他認為要加強唐詩的藝術研究^⑤。郭英德則把對一些小家的研究稱之為「小題大做」，他認為「90年代以來，古典文學界盛行一種風氣，研究者在『小題大做』的標榜下，不惜其『小』地深挖細掘，把沈寂了數百年、甚至數千年的一些藏在歷史旮旯裏的小作家、小作品都拿出來搗騰一番，且美其名曰『填補文學史空白』」。郭氏認為沒有空白的文學史是不存在的，因為文學史不僅是「文學記憶」的歷史，反過來也是文學遺忘的歷史。「那些被歷史遺忘的作家、作品，並不僅僅因為其小，更重要的是因為在歷史上價值不高。在歷史價值的篩子中，它們被無情地篩掉了，這是一種歷史的公正」。他認為要填補空白「必須有一個無可置疑的條件，那就是這些作家、作品應具有被前人忽略，但卻不應該忽略的價值。『小』要在『大』的坐標系裏去衡量他的價值」^⑥。但從九十年代的研究現狀來看，「大家」仍是研究者們重點研究的物件，論文和專著也相對集中在十多位大家身上，而對中小家研究的文章並不多。唐代有三千多位詩人，目前我們研究到的包括接觸到的不到一百五十位。以中唐而言，曾被高棅稱為「中唐之再

④ 袁行霈：〈文學史研究的前瞻〉，《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

⑤ 陶文鵬：〈唐詩藝術研究的現狀與思考〉，《唐代文學研究年鑑1999》，頁30。

⑥ 郭英德：〈論古典文學研究的「私人化」傾向〉，《文學評論》，2000年第4期。

盛」，可以說是作家眾多，流派紛呈，但研究者的目光專注的仍是韓愈、白居易、柳宗元等幾位大家，這從九十年代大陸地區學術刊物上中唐文學研究論文中幾位大家所占的比例即可看出^⑦：

時間	文章總數	韓愈	柳宗元	白居易	李賀	劉禹錫	五人合計及占%
1990	226	40 18%	33 15%	37 16%	18 8%	22 10%	150 67%
1991	181	29 16%	30 17%	44 24%	16 9%	14 8%	133 74%
1992	132	23 17%	8 6%	33 25%	16 12%	4 3%	84 63%
1993	138	25 18%	24 17%	27 20%	15 11%	5 4%	96 70%
1994	209	28 13%	37 18%	35 16%	17 8%	8 3%	125 58%
1995	177	27 15%	17 10%	31 18%	11 6%	14 8%	100 57%
1996	186	21 11%	18 10%	42 23%	25 13%	16 9%	122 66%
1997	175	23 13%	23 13%	43 25%	28 16%	11 6%	128 73%
1998	191	32 17%	36 19%	36 19%	15 8%	14 8%	133 70%

從上表可以看出，研究文章最多的依次是白居易、韓愈、柳宗元、李賀、劉禹錫，這五人的研究文章要占九十年代中唐作家總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中唐作家何止千人。其他幾個時段的狀況也基本如此，盛唐時段更是集中在杜甫、李白、王維三人身上，以九十年代後期為例：

時間	文章總數	杜甫 %	李白 %	王維 %	三人合計及占%
1996	282	107 38%	72 26%	40 14%	219 78%
1997	230	91 40%	54 23%	31 13%	176 76%
1998	207	90 43%	64 31%	34 16%	188 91%

^⑦ 參看《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91-1999》七卷中的〈唐代文學研究論文索引〉（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2000年），頁356、320、358、416、355、267、407。

現在的問題是：對大家的研究並沒有全面鋪開，就研究的作品而言，所研究的往往只是這幾位大家作品總量的極小一部分，且是人們熟知和樂道的那一部分，有媚俗之嫌而少開拓精神；從研究層面上看，鑑賞多、選注多、介紹多、描述性的表達方式多，而像陶文鵬指出的那種藝術研究少。以統計表中中唐時代研究得最充分的白居易為例：白有詩三千多首，據有人統計，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五年白居易研究中所涉及到的詩作不到五十首⁶⁸。而且這當中又有一部分是淺層次的介紹、鑑賞和描述，或是既無新材料又無新觀點的重覆。如一九九〇年研究白居易的論文三十七篇，其中〈琵琶行〉的分析文章八篇，〈長恨歌〉的分析文章十一篇，這十一篇中討論〈長恨歌〉主題的六篇，均未超出五十年代就提出的「諷喻說」、「愛情說」和「雙重主題說」這一範疇；分析文章中占大部分的是並無新意的「賞析」和「解說」。同年的柳宗元研究三十三篇論文中，〈永州八記〉、〈捕蛇者說〉、〈三戒〉、〈種樹郭橐駝傳〉的介紹、賞析文章占十二篇，內容上也無多新意，很少能在已有成果之上再加深開拓。王維研究也存在類似的情況，據有人統計：八十年代以來，以「詩中有畫」或繪畫性為核心來討論王維詩藝術特徵的論文已多達六十多篇，這還不包括以「詩中有畫」對王維詩歌進行分析和鑑賞的文字⁶⁹。再以近年來取得較大研究成果的李商隱研究為例：李商隱研究會編了本《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年至1997年》，作為半個世紀以來李商隱研究的回顧和總結。共收論文五十八篇（包括一篇附錄），但對李商隱著作中占很大比重，而且在當時和後來均有較大影響的樊南文僅有一篇研究文章。五十八篇論文中，作者重見六次者一人，五次者一人，四次者一人，三次者二人，二次者八人。本書的選擇甚為嚴謹細密（例如只選論文五十七篇，並未湊數，有的論文選自《河池師專學報》這類人們很少注意的刊物），應當說它反映的是研究中的實際情況。可見在研究對象、研究隊伍等方面，仍有拓展和擴大之必要。由此看來，在今後的唐代文學研究中，我們一方面仍須拓廣範圍，加強對二、三流作家的研究，以重現唐代文學的本來面目和續接流變中的殘缺部分；另一方面要加大、加深大家的研究層面，力求從他的全部作品、全部人生、思想全貌來整體把握，對他的理論主張、創作歷程、藝術風格有一個深刻而獨到的理解。

⁶⁸ 張明非：〈九十年代以來的唐代文學研究回顧〉，《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99》，頁 41。

⁶⁹ 蔣寅：〈對王維「詩中有畫」質疑〉，《文學評論》，2000年第4期。

在流派、詩派、詩人群落、創作範式、時段研究、分期研究、總體研究等方面，儘管有了上面列舉的驕人成就，但也還有待於加深和拓寬；至於重視作家的心靈研究和個性研究，儘管甯宗一、傅璇琮等都發過呼籲，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5. 唐詩學論著增多

唐詩學是唐詩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主要是對唐詩的性質、體式、流派、風格等進行整體綜合性研究，並對一千多年來的唐詩研究學術史進行爬梳和勾勒。儘管這種研究從唐人自身就已開始，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但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學科理論構建，卻是在八十年代後期才出現，一九八八年，陳伯海出了本《唐詩學引論》，目的就是「突出地把問題提出來，喚起人們的注意」。進入九十年代後一批唐詩學方面的專著和論文紛紛面世，如黃炳輝《唐詩學史述論》（鷺江出版社，1996年），朱易安的《唐詩學史論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陳良運〈論唐代詩選家的審美鑑賞批評〉（《陰山學刊》，1995年第2期），王運熙〈唐代詩文古今體之爭和《舊唐書》的文學觀〉（《文學遺產》，1993年第5期），孫敏強〈從「比興」到「興象」——漢唐詩學形象理論發展軌跡試釋〉（《溫州師院學報》，1991年第4期）裴斐〈略論兩宋杜詩學中存在的一種傾向〉（《中國文學研究》，1995年第3期），陶文鵬〈20世紀前半葉的唐詩研究〉（《湖北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胡明〈關於唐詩——兼談近百年來的唐詩研究〉（《文學評論》，1999年第2期）等，從此唐詩學研究形成了氣候。

比起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唐詩學研究出現了以下新的特徵：

一是有了理論上的建構和操作方面的整體思考。陳伯海在八十年代出版的《唐詩學引論》中曾首次對這一新學科的內涵進行系統地考察。到了九十年代，他在八十年代實踐的基礎上，他對唐詩學建構提出了整體的設想和具體的實施步驟：第一步先採集收錄有關唐詩學的書目文獻，摸清「家底」；第二步循書目對歷代評論唐詩的資料進行整理分類成幾種資料性的書；第三步進行唐詩學的理論建構^⑦。目前進行的大概是第二階段，陳氏主編的《唐詩書錄》（齊魯書社，1989年）、《唐詩評論類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全唐詩彙評》（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俱以出版。朱易安的《唐詩學史論稿》也有著理論建構上的整體思

^⑦ 陳伯海：〈唐詩學系列研究介紹〉，《唐代文學研究年鑑1999》，頁305。

考。該書的首章就是「略論唐詩學史的建構」，分述了唐詩學的存在基礎、形成的文化背景及其意義，唐詩學的研究體系和建構，唐詩學批評方法的淵源和傳承等理論上的思考。黃炳輝〈唐詩學歷史回顧和走向預測〉（《廈門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認為唐詩學有史學和詩學兩種內涵。就史學而言，它應包括唐代唐詩學、宋代唐詩學、金元唐詩學、明代唐詩學、清代唐詩學五大層面，每個大層面再分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小層面。就詩學內涵而言，可大體劃為創作論、靈感論、風格論、語言論、聲律說、意境說、情志說、性靈說、格調說十大範疇。至於唐詩學的走向，作者認為除了繼續進行對有研究價值的唐集作出詳密的考訂、校箋，寫出高質量的詩人專論、傳記外，還有三個主要走向：一是從重構斷代唐詩學到重構歷代唐詩學，並著重研究以下問題：斷代唐詩學的每段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呈現哪些特點？有哪些貢獻？從經濟、社會、文化與唐詩學的聯繫上，去說明成果和局限的原因及對前段的繼承和發展；二是參照現代詩學理論，建立現代唐詩學體系；三是建立文化唐詩學，摸清唐代繪畫、音樂、書法、舞蹈同唐詩之間的關係。

傅璇琮等人則對包括唐詩學在內的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作出整體思考。他們認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歷代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想的發展、演進過程的研究，即古典文學史研究，另一是對歷代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想研究的研究，即古代文學學術史研究。目前的現狀是研究者們較為關注古典文學史研究而漠視古典文學學術史的研究。作者認為，科學的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研究應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文學資料的整理和考訂，用校勘、標點、輯錄、考證、箋注等方法編輯文學作品的總集、別集、選集、注本、譯本，編纂文學家詞典、文學書錄、作品提要、文學典籍索引等工具書，撰寫作家傳記、年譜考證本事和作品繫年；第二個層次是文學現象的記述和評論。包括作家、作品的專題研究，作家集團、文學流派、文學思潮的專題研究，文學樣式、文學題材的專題研究及文學鑑賞等；第三個層次是文學規律的探索和總結，即對各種文學現象的發生、發展、性質、特點及內在聯繫進行分析、闡釋、批評，對斷代或通代的文學運動過程作高屋建瓴式的描述，與其他學科作交叉研究或自身的比較研究，進行文學方法論研究，在文學現象和文學規律的涵泳中提升出文學觀念、文學思想和文學理論^①。郭英

^① 傅璇琮、郭英德、謝思煒：〈關於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的思考〉，《文學評論》，1992年第3期。

德、謝思煒等並依此理論編撰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中華書局，1995年）。全書分爲八章，分論從先秦到清後期的文學研究情況。其中的隋唐五代部份分爲「背景和特點」、「文學觀念」、「文獻整理」、「詩歌研究」、「文學史研究」五個方面。

二是唐詩學資料整理的涵蓋面更爲博大，往往是多位學者通力合作而成。陳伯海主持的「唐詩學系列研究」包括《唐詩學引論》、《唐詩書錄》、《唐詩評論類編》、《全唐詩彙評》四個子項目，共四百多萬字，由上海社會科學院、華東師大、上海師大、上海教育學院、湘潭大學的近二十位專家通力合作完成。周勛初的《唐詩大辭典》更是集結了八十多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全書共設辭條六千二百餘條，其中詩人條目三千九百條，比清編《全唐詩》的作者多出一千七百人，這當中還不包括在選目中剔除的《全唐詩》中誤收和濫收者。

三是對近百年的唐代文學研究給予較多的關注並開始總結。近百年來的唐代文學研究，無論是研究道路之曲折，研究者精神之堅韌，研究觀念變化之巨大，研究手段之多樣和研究成果之豐碩，都堪稱空前，而大陸近二十年來的唐代文學研究成果，更是近百年來最輝煌的一個時期。進入九十年代後，鑑於正處於新舊世紀的交接期，因此，或是總結本世紀，或是總結大陸五十年來尤其是近二十年來唐代文學研究的成果，研究其不足，探討未來的走向就成爲這個時段唐詩學研究中一道風景。研究總結近百年來唐詩研究狀況的有：文學遺產編輯部、黑龍江大學中文系編的《百年學科沉思錄——二十世紀古典文學研究回顧與前瞻》（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論文有胡明的〈關於唐詩——兼談近百年來的唐詩研究〉（《文學評論》，1999年第2期）；徐公持〈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近代化進程略論〉（《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董乃斌等〈史料·視角·方法——關於二十世紀唐代文學研究的對話〉（《文學遺產》，1998年第4期）；郭英德、過常寶〈困境和出路：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化歷程〉（《北京師大學報》，1999年第2期）；葛景春〈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中州學刊》，2000年第1期）；陶敏〈二十世紀唐代文學史料研究整理工作回顧〉（《唐代文學研究年鑑1999》）；陳尚君〈唐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唐代文學研究年鑑1999》）；劉學凱〈本世紀李商隱研究述略〉（《文學評論》，1998年第1期）；王淑梅〈七十年來溫庭筠研究述略〉（《文教資料》，1996年第3期）；葛曉音

〈唐代文學研究百年隨想——杜曉勤《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國學》網站，2000年10月25日）等。《百年學科沈思錄》是一九九七年八月在哈爾濱召開的「二十世紀古典文學研究回顧與前瞻」研討會的論文集，會議主要是對百年來古典文學研究、文學史的發展嬗變、新時期古典文學研究方法進行回顧、總結和前瞻。其中關於唐詩學研究論文的有劉學鍇〈古典文學研究中的李商隱現象〉等五篇。傅璇琮在該書的序中認為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基本經驗，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就是「創新」。為了避免低水平的重複和杜絕抄襲現象，傅氏建議建立材料庫，把已有的成果，包括理論闡述、文獻考證等作一次系統的梳理。在傅氏主持下，目前海峽兩岸的學者正在進行《當代中國唐代文學論文選》和《當代中國唐代文學著作提要》的編撰。徐公持在文章中認為，包括唐代文學在內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本世紀內走過了一條由古典型向近代型不斷演變的道路，其近代化進程大體可分為四個時期：一九〇〇至一九二八為學科近代化起步期，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為發展期，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為曲折期，一九七八至本世紀末為撥亂反正期和多元發展期。葛景春也把本世紀的古代文學研究分為四個時期，但分法又有不同：一九〇〇至一九一八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觀念、研究方法的轉型期，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是轉型的突變期，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是轉型的一元發展期，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九是轉型的多元開放期。胡明則認為一百年來的唐詩研究可以一九四九年為界分成前後兩半。上半世紀學術史從傳統的舊式唐詩評論到整理國故後現代學術意義的唐詩研究，有一個質的飛躍。其間蘇雪林的《唐詩概論》和聞一多的《唐詩雜論》價值較高。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上卷）、錢鍾書《談藝錄》和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則是其間不專主唐詩研究的大牌作品。一九四九「年以後，唐詩研究與整個古典文學研究一樣進入一個新時代。文學藝術『百花齊放』，但要求『推陳出新』，吸收民主性精華，剔除封建性糟粕，被列為整理和研究古代文學遺產的根本方針。先是人民性為準的，又有現實主義為標準，又有厚今薄古、古為今用為原則，再後又有階級鬥爭、儒法鬥爭……『百家爭鳴』異化為兩家鬥爭，學術研究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古典文學的研究侷縮到一個很小的隅角裏，唐詩研究成果罕見」。而「近二十年來的唐詩研究，無疑是一百年來唐詩研究也可以說是一千餘年來唐詩研究最光輝燦爛時期成就巨大，隊伍壯闊，氣象蒸蒸日上」。陶敏〈二十世紀唐代文學史料研究整理工作回顧〉，陳尚君〈唐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則是就百年唐詩學的某一專類進行總結回顧，劉學鍇〈本世紀李商隱研

究述略》，王淑梅〈七十年來溫庭筠研究述略〉等則是某一作家近百年研究史的回顧和總結。

郁賢皓的〈中國唐代文學當代研究述評〉（《南京師大學報》，1995年第4期）；陳友冰〈五十年來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比較〉（《文學評論》，2000年第6期）；〈臺灣五十年來唐代文學研究述論〉（《文學遺產》，2001年第1期）；王輝斌〈李白在四川研究綜述（1949-1993）〉（《社會科學研究》，1995年第2期）；〈孟浩然生平研究綜述〉（《四川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等則是對本世紀後半葉即當代中國唐詩研究的探討和勾勒。大都以一九七六年為界將大陸當代的唐代文學研究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真正的學術成果不多，「文化大革命」十年學術研究完全停頓，後期學術環境寬鬆，唐代文學研究突飛猛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陳友冰的文章還對臺灣五十年來的唐代文學研究進行了分期，歸納其階段性特徵，並對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的共通之處和各自優長進行了比較。陶文鵬的〈20世紀前半葉的唐詩研究〉是少見的研究本世紀前半段唐詩研究狀況的專論。作者將前五十年大體分為三個階段：本世紀初，在唐詩研究上取得較大成果的是王闈運。他的〈湘綺樓說詩〉、〈唐詩選評〉及〈湘綺樓論唐詩〉等單篇論文，把唐詩中的大家、名家放在中國詩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揭示其詩史上的特點、地位、傳承和影響，且見解獨到。當時，同屬於傳統派的唐詩研究家還有沈曾植、陳衍。「五四」前後的唐詩研究是和當時以「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特徵的文學革命緊密相關的。胡適的〈讀白居易〈與元九書〉〉和〈讀香山詩瑣記〉，運用西方近代文學關於理想與寫實兩大流派，兩種創作方法理論來評論唐詩，是把西方近代文學觀念用於唐詩研究第一人。他的《白話文學史》有關唐詩的篇章是本世紀二十年代對唐詩作總體研究的最突出成就。梁啟超一九二二年發表的《情聖杜甫》標誌著「五四」以後學人摒棄了傳統的儒家文藝觀，而樹立了反傳統的啟蒙主義文藝觀。李維一九二八年出版的《詩史》是中國第一部具有近代學術形態的詩歌通史。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學說和文藝理論在思想文化與文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傳統學術方法的繼續發展和西方各種新的學術思想、研究方法的引進，幫助學者打開了新的視野，使古典文學研究呈現繁榮的局面，其間成就最突出的是聞一多，其代表作有《唐詩雜論》和《唐詩大系》兩種。陳寅恪在四十年代中期完成的《元白詩箋證稿》則是一部在詩史互證中達到通解通釋的傑作。錢鍾書的《談藝錄》則顯示了本世紀前半葉唐詩藝術研究已達到了遠遠超出前人高度的水平。

由於近二十年是唐代文學研究成果最豐、最輝煌時期，又面臨本世紀結束和向新世紀過度，所以總結回顧這二十年成果和不足，從理論建設和實際操作上做好適應新世紀的準備這類文章特多。關於唐代文學研究的前瞻，作者將另作專論，這裏著重述論對近二十年唐代文學研究的回顧和總結。葛曉音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現狀的衡估與思考〉（《文學評論》，1997年第4期）認為八〇年代後的古典文學研究，無論是從問題的發掘，視野的開拓，還是思路的更新來說，較之八〇年代以前，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其最重要的進展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糾正了五六十年代學術研究中存在的教條主義和概念化的傾向，確立了求新創實的良好學風。其次是研究者的思維能力和論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第三是出現了一支以博士為主的年輕學者隊伍。蔣寅則認為古典文學研究在八〇年代初進入轉型期，其表現為在學術觀念上由邏輯或徑曰形而上學向歷史的回歸。學者的關注對象由點——著名作家、經典作品轉向面——思潮、流派、群體，有意識地對文學史的線索重新進行清理。學者不再專注於作家的取捨（精華、糟粕之分）、等級、品第高下，而是首先著力於清理事實；不是醉心於給作家貼標籤、打分數，論成就得失，而是關注文學史現象，努力發掘歷史的遺產，恢復文學史的原生態。這種轉型，在唐代文學研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世紀之交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揚州師院學報》，1996年第2期）。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把「眾所公認的成績卓著的」唐代文學研究成就取得歸結為三個原因：一是學會在組織、規劃學術研究、建設學術隊伍上的有效工作，二是學者群體具有嚴謹求實、團結開放的學風，三是研究思路的改變，即上面提到的學術轉型（〈唐代文學研究中的群體和時段研究〉，《唐代文學研究年鑑1999》）。張明非的〈九十年代以來的唐代文學研究〉（《唐代文學研究年鑑1999》）認為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與八十年代相比，又有六個特點：一是克服了八〇年代的浮躁、焦慮和困惑，也沒有了八〇年代引進新方法時的急功近利或無所適從，不再滿足於對西方文論的生搬硬套，而是立足傳統文化，在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上尋求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二是一批老專家不斷有高水準成果問世，而一大批在八〇年代即嶄露頭角的中青年學者學術個性已經漸趨成熟，成為生力軍。三是研究範圍從研究對象到研究領域、研究論題都有所擴大。四是研究觀念、研究層面都發生了變化。五是對新方法採取寬容平和的態度。六是比較研究的普遍應用。陶文鵬的〈唐詩藝術研究的現狀和思考〉（《唐代文學研究年鑑1999》）則更多地指出了近幾年在唐詩藝術研究方面的不足。作者認為，同碩果累累的唐詩文獻資料考辨整理、詩歌理論研究、史學研究思想文化研究相比，唐詩藝術

研究卻顯得進展不大，相當數量的論著普遍存在著見解平庸、陳舊、淺薄、空疏的毛病；有些論著搞外國文學理論的新名詞新術語的狂轟濫炸，生搬硬套、削足適履，將理論使人獲得審美興味和審美思考的藝術研究，搞成以艱深文其淺陋、空洞無物、索然寡味的文字垃圾。從研究的課題來看，唐詩中的小家或以前不被重視的詩人越來越多地納入了研究者的視野，這是可喜的，然而唐詩的大家、名家的藝術研究，除了李商隱研究收穫最大，白居易、劉禹錫研究也有些新成果外，對於李白、杜甫、王維、韓愈、柳宗元、孟郊、韋應物、劉長卿、李賀、杜牧、溫庭筠、韋莊等人的研究論著不多，也很少能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深入開掘。對唐詩藝術經驗，無論是微觀研究還是宏觀研究，都缺少使人耳目一新的新論著。陳友冰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十年》（上下）（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91年）是對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九這十年間古代文學研究觀念、研究方法變化的述論和研究成果的總結。其中第八章專論唐代文學的研究得失。

四是從總體上看，包括唐詩學在內的唐詩理論研究還較薄弱。胡明的〈關於唐詩——兼談近百年來的唐詩研究〉在回顧了近百年來唐詩的研究歷程後認為，一切古典文學研究包括唐詩研究，大抵有兩大範疇：史料的整理與史料的解釋。前者追求的是文學史實的完整認知，後者注重的是文學史實的理性闡釋。離開了史料的理性闡釋與理論總結，中國文學史規律的探討無從談起，中國文學藝術的歷史經驗無以總結。而當前唐詩研究的現狀則是作家作品的考證箋校、文獻資料的集成等史料文獻研究輝煌發達，唐詩發展史的闡釋、唐詩學則貧弱單薄；「唐詩史料學規模完備，唐詩學還在踽踽獨行，應該是改變這種格局失衡的時候了」。

五是對歷代唐詩學研究，展開得很不均衡，其中有的時段研究比較集中、比較深透，有的時段則比較薄弱，甚至沒有觸及，如對唐人的唐詩選本，宋代和清代的唐詩學尤其是杜詩學的研究要充分一些，金元明的唐詩學研究就較少，除了少數幾篇論元好問、楊慎、胡應麟、胡震亨的唐詩學和杜詩學外，其餘諸家幾乎未觸及。宋代杜詩學研究雖較充分，出現了許總《杜詩學發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有：曹之〈宋代整理唐集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7年第1期）、聶巧平〈宋代杜詩學論〉（《學術研究》，2000年第9期）等有質量的論著，以及林繼中《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和張忠綱《杜甫詩話校注五種》這樣的輯校本，但也還沒有看到像臺灣學者蔡瑜《宋代唐詩學》那樣的專著。另外，對歷代唐詩總集、大家的別集整理研究得多一些，幾種《唐人選唐詩》本子，白居易、韓愈、柳

宗元、李賀等人的研究資料彙編皆已出版，相比之下，小家資料的彙集，歷代關於唐詩的時段、流派、群體研究的研究卻顯得沈寂，探討和爭論在唐詩學研究中還很少開展，因而從總體上來說，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於深入。

6. 唐代文學史的研究取得了進展

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學史專著，有：子景祥的《唐宋駢文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趙謙《唐七律藝術史》（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楊海明《唐宋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羅宗強、郝世鋒主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許總的《唐詩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楊世明《唐詩史》（重慶出版社，1996年）；喬象鍾、陳鐵民主編的《唐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許總《唐詩體派論》（文津出版社，1994年）；阮忠《唐宋詩風流別史》（武漢出版社，1997年）；王運熙、揚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木齋《唐宋詞流變史》（京華出版社，1997年）；傅璇琮主編的《唐五代文學編年史》（遼海出版社，1998年）；阮忠《唐宋詩風流別史》（武漢出版社，1998年）；劉尊明《唐五代詞史論稿》（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年）等。單篇論文有張清華〈詩到元和體變新——談韓詩對杜詩藝術的繼承與創新〉（《殷都學刊》，1992年第3期）；袁行霈的〈百年徘徊——初唐詩歌的創作趨勢〉（《北京大學學報》，1994年第6期）；景凱旋〈孟賈異同論——兼論中晚唐詩歌的分期〉（《文學遺產》，1995年第1期）；傅璇琮〈唐初三十年的文學流程〉（《文學遺產》，1998年第5期）等。

九十年代的文學史研究有以下幾個特徵：

一是關於文學史的研究和編寫（當然也包括唐代文學史），八十年代也產生過幾部有影響的斷代文學史和分體文學史專著和若干有份量的論文，但基本上停留在實踐階段，九十年代在此基礎上開始了理論的思考，並發生熱烈的討論和激烈的爭論，一些有影響的學術刊物如《文學遺產》、《文學評論》《江海學刊》等皆為此開設過專欄或組織過研討會⁷²。一些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心得或編寫文學史的體

⁷² 如《文學遺產》1993年召開的關於文學史編寫的座談會，1997年4月15日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共同組織的對喬象鍾、陳鐵民主編的「唐代文學史研討會」的討論；《江海學刊》於1994年召開的「文學史觀與文學史學研討會」和1997年召開的「文學史學研討會」等。

會，對此發表不少有識之見。王兆鵬認為文學作品從產生到其價值的最終實現，必須經過創作—傳播—接受三個階段，因此文學史研究也應該由目前的作家—作品的二維研究逐步轉向作家—作品—傳播—接受的四維研究。他以本世紀對陶淵明、李白、杜甫、陸游等著名詩人的研究為例，指出皆是以現代研究者的價值觀念和審美標準在進行定位和定性，沒有揭示出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在不同時代所發生的不同作用和影響，未能揭示作家作品的價值和意義在不同的時代的漲落變化^{⑦③}。有的研究者認為，本世紀前八十年的文學史模式基本上是「他律」，即「詩—史範式」。這種範式只注重文學外部條件，而忽視了「心靈史」，忽視了文學形式的外部動因，因而許建平主張「建立心態文學史學」。借助於個體心理學及其分析方法，集體心理學及其分析方法和建立文學審美史心理學則是心態文學史的三個理論結構層次。林繼中雖也承認過去的文學史是一種「詩—史範例」，但也有發展和變異。作者以聞一多對文學史的研究為例，「雖然大略說來還是『以詩證史』的類型，但是所重在文化，而且似乎也並不忽視心靈史」。作者將聞氏的貢獻概括為三個方面：重視在文化視角下文學環境的復原工作；提供了文學環境如何「讀入」文學形式內部的分析樣本；在處理生活與詩的關係時，著力點是再現詩的環境，如研究唐詩強調「詩唐」，即唐人的生活是詩的生活，唐詩是生活化了的詩。袁行霈則認為文學史中恰恰要強調「史」，撰寫文學史應當具有史學的思維方式，要突破過去那種按時代順序將一個個作家作品簡單地排列在一起的模式，應當注意「史」的脈絡，清晰地描述出承傳流變的過程^{⑦④}。他在另一篇關於文學史研究的文章中，還提出要加強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研究和深入的文本研究。章培恒則認為，目前只有在中國文學史的宏觀研究上取得較大的突破，才能在總體上推動中國文學史研究的進展，這種宏觀研究包括文學觀念的檢討，馬克思主義的堅持，文學史分期的確立，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分界的打破等。章氏還認為，宏觀研究必須建立在微觀研究的基礎上，「就許多課題來說，倘若微觀研究不充分，宏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就含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⑦⑤}。

^{⑦③} 王兆鵬以及下面引用的許建平、林繼中、莫礪鋒諸文，均見〈關於文學史的思考〉，《江海學刊》，1998年第3期。

^{⑦④} 袁行霈：〈關於文學史幾個理論問題的思考〉，《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

^{⑦⑤} 章培恒：〈關於《中國文學史》編寫的討論〉，《復旦學報》，1996年第4期。

至於文學史的研究方法，錢志熙認為可分為基本方法和具體方法兩種。「基本方法為審美、歷史、邏輯這樣三種」，具體方法包括「近年來人們所引進的文本批評、母題研究、接受美學乃至熵的理論、耗散結構、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論等一系列新方法」⁷⁶。李建新認為文學史研究的傳統方法是歷史學、文章學、社會學三種，缺的是「文心搏動、是理論建構、是文學精神」，要想在研究上創新，就必須引入「大文化視野、新邏輯學思路、原生態式把握形式主義細讀、審美心理學分析等」新方法⁷⁷。關於文學史的分類和編寫，更是呈現一種眾說紛紜的態勢。鄧敏文將編寫的類型分為八種：綜合性的文學通史，綜合性的文學斷代史，專題性的文學通史，專題性的文學斷代史，分體性的文學通史，分體性的文學斷代史，地方文學史，民族文學史⁷⁸。羅漫則把非通史類的文學史分為十二類：分體文學史、斷代文學史、分體斷代文學史、流派文學史、區域文學史、民族文學史、婦女文學史、風格文學史、美文文學史、結構文學史、編年文學史、文學思想史、文學批評史。他還預測會出現九種文學史的新類型：批評文學史、計量文學史、中外文學交流史、原型文學史或題材文學史、哲學文學史、美學文學史、社會學文學史、宗教文學史、文化文學史⁷⁹。樊駿認為新時期編寫的文學史在體例和格局上均有創新和突破，他把這種創新和突破分為四類：一是擴大研究對象的時間外延和歷史範疇，將近代、現代、當代融為一個整體；二是按新的原則和線索重寫，以形成新的格局和面貌；三是編寫專題文學史；四是兼顧上述內容，寫成文學思想史或思潮史⁸⁰。文學史如何編寫，袁行霈認為鑑於中國文學發展存在文體、朝代、地域上的種種不平衡性，因此在說明文學的演進時，要避免單線平面式的勾勒，應當在突出主線的同時進行立體交叉式的描述。在描述中國文學演進時，還要注意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如雅俗之間的互動，各種文體的相互滲透與融合，復古與革新的交替和碰撞，文與道的或離或合等。另

⁷⁶ 錢志熙：〈審美、歷史、邏輯——論文學史研究的三種基本方法〉，《文學遺產》，1994年第5期。

⁷⁷ 李建新：〈文學史方法的歷史和新方法的誕生〉，《河北師大學報》，1995年第3期。

⁷⁸ 鄧敏文：〈體例論〉，《中國多民族文學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

⁷⁹ 羅漫：〈中國文學史的類型與功能〉，《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6期。

⁸⁰ 樊駿：〈關於近一百多年中國文學歷史的編寫工作〉，《河南大學學報》，1993年第5期。

外，要將過去慣用的評價式語言換成描述式語言；還要注意與其他相關學科的交叉研究，從廣闊的文化學角度考察文學^①。傅璇琮則認為目前的一些文學史「史的敘述是很不夠的，而是像一個個作家評傳、作品評論的彙編」，因而他倡導寫文學編年史，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動，重要作品的產生，文學上重要問題的爭論，以及與文學鄰近的藝術樣式如音樂、舞蹈、繪畫乃至宗教活動、社會風尚等擇取有代表性的資料，逐年編排，「從最闊大的視野考察一時代社會對文學的影響」，以補「長期以來文學史著作體例所感到的一種不足」^②。傅氏並身體力行，與陶敏、李一飛、吳在慶、賈晉華五位唐文獻專家通力合作，歷時五年編撰了一套四卷本的《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全書二百五十多萬字，將唐五代三百五十年間的文化政策、作家的創作活動及交往，此間的重要作品和重要的文學論爭，旁及社會風尚、宗教藝術等一一分段編年，以期給唐代文學研究者以新的視野、新的啓迪、新的發現。該書是一九九八年度古典文學類唯一獲得「國家圖書獎」的出版物。張炯則認為「完整意義上的中華文學史應該是涵蓋中華各兄弟民族文學貢獻的文學史，也應該是涵蓋中國各地區的文學史，即包括臺灣、香港、澳門在內的文學史，而不僅僅是大陸地區的漢族文學史」^③。總的說來，對文學史如何編寫，大家傾向性的看法是：文學史的編寫有些基本的認識必須搞清和統一，如和史料學的關係，和哲學、史學、民俗學等其他人文科學的關係，必須真正揭示出文學演變的規律而不是歷代作家作品的排列。以唐代文學而言，首先要搞清盛唐氣象、唐代詩人的人文精神、解決唐詩的分期流變等問題。除此之外，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只有一種模式、一種寫法，只要是嚴肅的學術研究，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寫法反而可以形成百花齊放的局面。

二是有的學者對此有系統的和長遠的準備，在作家、作品研究和時段、流派研究中注意其承續和流變，先用系列的單篇論文方式逐步反映其研究成果，然後在此基礎上綜合和重構。余恕誠繼《唐詩風貌》對唐詩橫向剖析之後，又開始對唐詩發展進行縱向尋繹，近兩年陸續發表有〈晚唐兩大詩人群落及風貌特徵〉（《安

① 袁行霈：〈關於文學史幾個理論問題的思考〉，《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

② 傅璇琮：〈自序〉，《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瀋陽：遼海出版社1998年），頁2。

③ 張炯：〈走向完整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中華文學通史」導言〉，《文學評論》，1996年第1期。

徽師大學報》，1996年第2期）、〈初唐詩壇的建設與期待〉（《文學遺產》，1996年第5期）、〈李商隱詩歌的多義性及其對心靈世界的表現——兼談李詩研究方法的問題〉（《文學遺產》，1997年第2期）、〈從李白到李商隱〉（《中國李白研究》，1998年第10期）、〈詩歌：從韓愈到李商隱——兼談文學演進中的穿透和位移現象〉（《文學遺產》，1999年第4期）。許總繼一九九四年的《唐詩史》之後又發表有〈論元和詩歌變態美特徵的形成和走向〉（《雲南社會科學》，1996年第1期）、〈唐詩歷史進程與存在方式之重構〉（《社會科學輯刊》，1996年第2期）、〈論唐末社會心理和詩風走向〉（《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1期）等，專門探討唐詩流變的架構及美學特徵。杜曉勤在九十年代後期集中發表了一批論文：〈論龍朔初載的詩風新變〉（《文學遺產》，1994年第5期），〈從永明體到沈宋體——五言律體形成過程考察〉（《唐研究》（二），1996年）、〈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詩歌的藝術精神〉（《文學評論》，1999年第4期），系統地從地域文化等角度論述盛唐詩風和詩律的形成，其間匯聚成《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東方出版社）和《齊梁詩歌向盛唐詩歌的嬗變》（臺北：商鼎出版社，1996年）兩本專著出版。程國賦則有研究唐人小說總體特徵和流變的系列論文，如〈從唐傳奇到三言二拍的嬗變〉、〈論唐代軼事小說的成因和嬗變〉、〈論唐代俠義小說的成因及其嬗變〉、〈《李娃傳》嬗變研究〉、〈漫談《昆侖奴》及其嬗變作品的敘事視角〉等，一九九八年集結為《唐代小說嬗變研究》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是出現了以流派、流變、藝術風格等內在特徵為劃分標誌的文學史。如劉揚忠的《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阮忠《唐宋詩風流別史》（武漢出版社，1997年）、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木齋《唐宋词流變史》（京華出版社，1997年）、趙謙《唐七律藝術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等。《唐宋词流派史》分為七章，第一章是對唐宋词流派理論思考和歷史回顧。作者不同意「豪放」、「婉約」這種簡單的分法，在回顧自宋至今的三派、四派、八派等分法及其理由後，作者提出「辨析唐宋词流派的理論標準」：必須有一個創作成就突出又有號召力的領袖人物作宗主；宗主周圍或身後聚集過創作實踐十分活躍且各自有一定社會影響的追隨者組成的作家群；這個作家群雖各有其創作個性和藝術風格，卻有著較為一致的審美傾向和相近的藝術風格。作者並依此將唐宋词派按時代順序分為十八種體：玄真子體、白樂天

體、花間體、南唐體、柳永體、小晏體、東坡體、山谷體、俳體、李易安體、朱希真體、吳蔡體、稼軒體、晦翁體、白石體、介庵體、趙昌父體、玉林體。第二章專論唐五代詞，對花間詞和南唐詞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認為花間詞是「正宗詞風的代表」，馮延巳則是「南唐詞感傷主調的奠基者和新詞境的開拓者」。作者對此書有很高的學術期許：「我力圖將此書寫成一部以流派演變史為主的新型唐宋詞史，因此不但要打破『豪放』、『婉約』二分法等傳統詞論，而且還要打破傳統詞史按時代先後聯綴單個詞人詞作的框架，注重從時代風氣、文人心理、詞學觀念、社會審美習尚等發展演變的角度，來全景式地把握唐宋詞流變過程；要變作家個體研究為群體研究；……要著重考察唐宋時期哲學、政治、宗教、社會習俗、民族心理等等如何深刻地作用於不同的詞人們，又如何影響不同的詞人群的創作觀念和審美情趣，以造成唐宋詞風格與流派百花爭豔、異彩紛呈的種種情況……從文化大背景下來說清唐宋詞流派產生、發展、演變的過程」⁸⁴。但上述期待值的實現，則還有待於進一步的努力。阮忠《唐宋詩風流別史》是對唐宋詩歌風格流別的探討，亦是「注重詩人群體及詩歌風格流變」，並在研究過程中「把社會文化、詩歌理論與創作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全書分為十二章，前九章分別討論了上官儀、王孟、高岑、李白、杜甫、大曆詩人、韓孟、元白、溫李九種詩風。韓兆琦在「序」中說：「這本書也許是受了流別史之『史』的制約，儘管從流別出發對唐宋詩人有所取捨，但時時注意所寫的是『史』，不免有過於求全的趨向，對詩風流別的論述多少有點沖淡」⁸⁵。但實際上缺少的也許正相反，即缺少滲透於其中的流變的痕跡以及和『史』的關聯，上述九章似是九個各自獨立的作家風格論。七律在形式上是近體詩藝術價值最高也是最難把握的一種詩歌體裁，他有著自身的特殊的發展與演進規律明代的胡應麟、清代的宋犖都曾對此規律進行過考察，並擬過唐人七律嬗變綱要⁸⁶。趙謙《唐七律藝術史》從韻律、風格、心態和結構四個方面來「探討唐代七律發展與演進的特殊規律，與此同時，考察各個時期七律作家創作上的得失，以及七律產生的種種藝術效果的不同內在機制」⁸⁷。全書分為七章：第一章是對初唐七律

⁸⁴ 劉揚忠：〈自序〉，《唐宋詞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4。

⁸⁵ 阮忠：〈序〉，《唐宋詩風流別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7年），頁5。

⁸⁶ 見胡應麟著《詩藪》和宋犖著《漫堂說詩》。

⁸⁷ 趙謙：〈自序〉，《唐七律藝術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頁5。

音韻風格的考察；第二章探討盛唐七律創作上的不平衡局面，題材與風格的長足發展卻神韻未揚；第三章分析杜甫七律的主要美學特徵——悲愴，以及首創了聲拗情蟠的拗律；第四章分析中唐前期七律的嬗變規律——從外部世界走向內省世界；第五、六、七三章闡述從中唐的白居易到晚唐的溫庭筠，唐人七律的繁榮經過及其歷史價值。

文學史研究和編寫方面，也還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差距還很大，要形成共識還有待於將來和更加深入的研究及實踐。如莫礪鋒就不同意「文學史學」這一提法，因為一則「即使這種研究工作偏重於理論的抽繹，也只須稱之為『文學史理論』，他仍可被包括在『文學史』之中，根本無須畫蛇添足地綴上一個『學』字」。二則編寫文學史的歷史尚不足百年，「文學史著作在學術上的進步仍是步履艱難。而文學史著作往往具有教科書性質這一事實，更使陳陳相因成為該學科的整體性缺點」，因此建立「文學史學」的條件尚未成熟。另外，莫氏對借鑑西方理論來提高文學史學科水平和即使建立了比較理想的「文學史學」後文學史研究能否就此出現飛躍，皆表示懷疑⁸⁸。至於文學史的編寫，也有人認為這個問題無須討論：「文學史應當怎麼寫，這又何必討論呢？你認為應當怎麼寫就怎麼寫好了」⁸⁹。具體到唐代文學史的研究和編寫來說，研究者們對唐詩史給予了更多的關注，而對唐代散文史、小說史尤其是駢文史的研究就顯得薄弱一些；在唐詩史研究中，唐詩分期、「盛唐氣象」、「邊塞詩派」、牛李黨爭等問題的探討和爭論展開的比較充分，對其他時段、詩人群體、詩歌流派如初唐的宮廷詩人、「方外十友」、晚唐的豔體詩人隱逸詩人研究較為薄弱，對一些新的詩風、詩派的發掘如吳在慶那樣對「咸通十哲」的發掘和研究就更少；以歷史演進為線索表述的多，探求其文學流變脈絡和規律的少；採用傳統的「詩—史」範式者多，探究作家心靈歷程者少；由盛唐到中唐詩風流變研究者多，由初唐到盛唐和由中唐到晚唐如何流變探求者少；從社會學和文藝學角度做作家生平及作品分析者多，研究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心靈歷程者少。因此，這方面的成績只能說是取得了進展。

⁸⁸ 莫礪鋒：〈關於文學史的思考〉，《江海學刊》，1998年第3期。

⁸⁹ 羅宗強語，轉引自傅璇琮：〈文學編年史的編寫與唐代文學研究〉，《唐代文學研究年鑑1998》（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7. 研究方向的多角度和多層次

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基本上突破了時代背景、思想內容、藝術成就三大塊這種機械、單一的分析方法，注意文學與多種因素的關聯，在深入到作家內心，注意其心靈歷程的同時，將研究領域延伸到史學、美學、文化學、經濟、藝術、哲學、神學、民俗等領域。對作家的評價，在充分佔有原始資料的基礎上，盡可能地調整視角，力求得出接近歷史本來面目的結論；對作品的理解，也超越了語言的詮釋和文藝學的鑑賞，擴展到民俗、社會學等方面。如果說八十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已開始向這方面的嘗試，到了九十年代就運用得較為普遍，較為成熟。這當中，運用的較為成功的要素與文化學、民俗、歷史與哲學、宗教的結合上。

與文化學、民俗學和史學的結合 李浩的《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文津出版社，1999年）從地域文化觀念出發，對與唐代文學發展有關聯的關中士族史事和關中地域文化進行考論和詮釋，在此基礎上為唐代的關中文學定位，並對牛李黨爭、蘇綽的文體改革作出新解。傅紹良的《盛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文津出版社，1999年）以杜甫、李白、王維為代表，分析儒、道、釋三家文化對唐代詩人的社會角色、價值觀念、生活形態的影響，以及所形成的人格特色、文化魅力所在。作者認為，盛唐詩歌的成就，就是盛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追求相互作用的結果。鄧志方的《浙東唐詩之路》則是一本很獨特的地域文化與唐詩關係的研究專著。著者以浙東剡溪為主幹，把這條古旅遊線上的十四個景點，與有關的二百零七首唐詩加以比較，並附有大量實證資料，以探求當年浙東唱和的地點、成員、規模和特色。戴偉華則專門致力於方鎮、使府與唐代文學的關係研究，九十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專著，如《唐代幕府與文學》（現代出版社，1990年）、《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廣西師大出版社，1998年）、《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等。《唐代幕府與文學》是對唐代文人入幕這一獨特的時代現象作宏觀考察。分析其中代表人物入幕的經歷、原因，他們在幕府中生活和創作的情況，並考察了幕府制度的演變及在唐代興盛的原因。《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則是在《唐代幕府與文學》的基礎上，從各類史書、文集、筆記金石著作中將唐代節度使、觀察使府中的文職僚佐一一稽出，並盡可能加以繫年，計的得二千五百餘人，近四千人。考稽之中又對新、舊《唐書》、《冊府元龜》、《資治通鑑》等歷史典籍和一些今人論著多有填補和辨誤。我們知道，吳廷燮的《唐方鎮年表》為我們研究唐代作家作品提供了許多方便，但作為方鎮的文職僚佐，研究起來，當然要困

難得多，惟其如此，其價值也就自不待言。從文化學、民俗學方面研究唐詩的專著還有程薈、董乃斌的《唐帝國的精神文明——民俗與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採用歷史民俗學和文學史交叉研究的方法，對唐代的民俗狀況作了全景式的描繪，從中探討節俗與相關傳說的動態結合過程中的歸一化，民間俠文化對儒道釋互補結構的補益，從而使這本關於唐代民俗的專著超越了一般的現象描述和資料的網羅，帶上了思辨的色彩和理性的思考。葛景春的《李白與唐代文化》是繼其《李白與中國傳統文化》（臺北：群玉堂出版公司，1991年）之後，對李白的思想及詩歌與唐代的哲學、宗教、民俗、時尚、音樂、舞蹈、繪畫、書法之間的關係，互相間的滲透和影響，作了全面和較為深入的探索。作者認為李白的思想是道家的自由精神和儒家理想主義的結合，具有兼收並蓄不拘一格的開放性特點；作者並通過唐人賞月的民俗和好酒的飲食文化來解讀李白的詠月和詠酒詩，從而跳出了對此的一般性解說。該書還闢專章探討李白與外來文化的關係，考察了李白與外來文化的接觸的情況，以及其詩所受的外來文化的浸潤。鄧小軍的《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則是在微觀考證的基礎上力圖建立一種文化學方面的理論體系。

這方面的代表性論文則有鄧小軍〈盛唐時期詩歌人文意義的再發現〉（《遼寧大學學報》，1994年第5期）、陶文鵬〈傳神肖貌詩畫交融——論唐詩對唐代人物畫的借鑒吸收〉（《文學評論》，1994年第6期）、葛曉音的〈論唐前期文明華化的主導傾向——從各族文化的交流對初盛唐詩的影響談起〉（《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陳選公〈唐代文學的文化規定〉（《鄭州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等。

佛教與唐詩研究的結合 同八十年代討論佛學熱相比，九十年代有所收斂和冷卻，但也似乎更專深了一些。八十年代的研究特徵一是表現為寬泛性，即是著眼於佛教與整個中國文學或中國文化的關係，這當然與當時的時代風氣有關；另一則是多為佛教與唐代作家、作品的關係研究。九十年代的佛教與唐詩研究出現了以下幾個變化：

一是在佛教與作家作品的關係研究方面，研究者已不再滿足於揭示作家思想上有哪些宗教情緒，它們在其作品中又有哪些反映。而是開始探究佛學或禪宗思想對其創作產生那些穿透，使其創作傾向如何發生位移；在作家思想上儒、釋、道是如何互動及其在不同時期、不同境遇下的不同表現，並著重於整體的把握和深層的思想

考。以佛教與王維的關係研究為例，閻琦的〈元和末年韓愈與佛教關係之探討〉（《鐵道師院學報》，1997年第3期）集中考察了憲宗元和十四年至十五年這兩年間，韓愈對佛教的態度由辟到近再到辟的兩番變化，並分析了產生如此變化的內外兩個原因。作者認為「遠貶潮州、衰朽的年齡及對政治前途的灰心失望，使韓愈的消極出世思想有所上升，於是，親近佛理、瞭解一下他素所不知的釋氏之學，藉以慰藉孤獨抑鬱的心理，同時也彌補自己在學問上的缺陷」，這是他由辟佛到近佛的內因；在潮州結識儒釋相通的元集虛和與大顛交往，是他產生這種逆向的外力推動。但由於韓愈這種轉變引起了一場沸沸揚揚的輿論，「儒者固有的立場以及中國文化人根深蒂固的品行和嚴格的自律精神，使他意識到親近佛理並不屬於他個人的自由，會對他安身立命處造成嚴重傷害，於是很快止步不前」；其外因則是憲宗去世，韓愈又看到了希望，此時接連上表，急於世用，佛家教義對他已失去價值，加上此時孟簡來信言及京城盛傳韓愈近佛，加速了他即刻表明反佛的態度。這樣對作家某一時期的思想變化進行梳理並探討其原因，比起泛泛而談，自然要深刻的多。尚永亮的〈論白居易所受佛老思想影響及其超越途徑〉（《陝西師大學報》，1993年第2期）則著重於整體的把握。作者認為，佛教在白居易身上，固然發揮了他作為學術影響的作用，但更重要的卻是作為一種人生指南。特別是倡言「安心」、「頓悟」的南宗禪，更是成為白居易在困境中的生活準則和追求目標。作者通過對白詩的分析，指出這種影響主要是「大抵心安即是家」的安心思想，「吾道尋知止」的知足觀念和「應似諸天觀天下」的看破態度。陳允吉的〈王維輞川〈華子岡〉詩佛家「飛鳥」喻〉（《文學遺產》，1998年第2期）從王維的一首絕句入手來剖析王維詩中的佛學意蘊，不僅有實地考察，而且追溯了中國山水詩景情理結合的歷程，從而賦予王維這類詩歌一個闊大的哲學文化背景。邱瑞祥的〈王維佛理詩之分類及淵源〉（《貴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首次將王維的近二十首佛理詩分為兩類：一類是將佛理和自己對佛理的體悟直接作為描寫物件，文學形式純為理念的載體；另一類是把自己對佛理的體悟寄寓在山水送別等題材中，使自然之景與宗教之理相融合，加濃了詩歌的文學意味。作者認為，前者與東晉的玄言詩一脈相承，後者則深受劉宋山水詩特別是謝靈運的影響。

二是研究的範圍有所拓展，從佛教與作家作品間的關係拓展為同一個時代、一個時段、一種詩歌範式、一個詩歌流派、一種文學運動、文學思潮的關係，如孫昌武〈唐代文人的維摩信仰〉（《唐研究》（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2

期)、〈中晚唐的禪文學〉(《唐代文學研究》(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2年)、陳允吉〈「牛鬼蛇神」與中唐韓孟盧李詩的荒誕意象〉(《復旦學報》, 1996年第3期)、張伯偉〈略論佛學對晚唐五代詩格的影響〉(《唐代文學研究》〈三〉, 1992年)、周春宇〈禪宗哲學與唐宋心境美學〉(《青海社會科學》, 1997年第1期)、姜光斗〈論梁肅的佛學造詣及其對唐代古文運動的貢獻〉(《唐代文學研究》(五)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年)、張晶〈禪與唐代山水詩派〉(《社會科學戰線》, 1994年第6期)等。孫昌武在〈中晚唐的禪文學〉一文中指出:中晚唐時期曹溪系的洪州禪的形成帶來了禪思想的變化,促成了禪的表現與文學的溝通,像傳法偈、示法偈、開悟偈、勸學偈、樂道歌等已由傳統的偈頌變為文學的形式,從而促使宗教教義、歷史與文學的綜合體——語錄的產生。陳允吉之文是談佛教藝術對韓孟詩派險怪詩風形成的影響。作者認為,杜牧在《李賀集序》中所說的「牛鬼蛇神」就是指當時佛教藝術中所塑造的鬼神形象。包括李賀在內的韓孟詩派的一群士子,他們「憤世嫉俗、恃才傲物,對現實生活中為常人所習慣、適應的一切,均投以不屑和不同的眼光,決意追求一種與世態人情相背向的超越」,「故佛教藝術那些遒勁怒張的『牛鬼蛇神』對於他們來說恰好正中下懷,殆由趣味之忻合理所當然地成為其詩歌摹寫和融攝的物件」。文章還具論了韓愈、孟郊、盧仝、李賀的詩作與此的關係。張伯偉有專著《全唐五代詩格校考》,書中多處指出唐五代詩格與佛學的淵源關係,其〈略論佛學對晚唐五代詩格的影響〉則是篇專論。作者認為,佛學對晚唐五代詩格的影響有兩個途徑:一是間接的,即通過皎然的《詩格》為中介,「晚唐人撰寫詩格,往往以皎然詩為範例,或以皎然的意見作為自己立論的基礎」;另一是直接的,晚唐五代詩格的作者很大一部分是僧人,如賈島、齊己、修遠、神彧等,或是與僧人交往甚密的徐衍、徐寅、鄭谷等。作者認為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門」、「勢」和「作用」這三個由佛家教理帶來的特點上。姜光斗的〈論梁肅的佛學造詣及其對唐代古文運動的貢獻〉是論佛教對唐代文學運動的影響。作者認為是佛學造就了古文家梁肅,而梁肅的「文氣論」對韓愈的「文氣說」又有著啟發和影響。

三是對唐代詩僧和禪文學的研究開始鋪開和深入。賈島的研究在繼續深入,如房日晰的〈賈島考證二則〉(《文學遺產》, 1992年第6期)考證賈島有邠州之行;徐希平〈「武功體」價值新探〉(《西南民院學報》, 1992年第4期)對其「武功體」作出新解,呂瑞慶〈賈島研究述評〉(《青海民院學報》, 1990年第

2 期) 則對晚唐以來賈島研究史第一次作出勾勒。賀秀明〈略論賈島對後世的影響及其原因〉(《廈門大學學報》, 1996 年第 3 期) 則著重探討了賈島對後世的影響及原因。與此同時, 對寒山、齊己、貫休、皎然等詩僧的研究也進一步鋪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 美、日、港、臺曾掀起一股持續多年的「寒山熱」, 大陸在沈寂了多年以後於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了對寒山詩的研究。除了上面曾提及的錢學烈專著《寒山拾得詩校評》外⁹⁰, 還有陳耀東的〈徵引、擬作、贗和——寒山子「熱」考〉(《唐代文學研究》(六),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 年), 這是一篇較詳實的寒山詩接受史研究。作者從歷代對寒山詩的徵引、擬作、贗和三個方面考察了寒山子在我國宗教史和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並闡述了其贗和系統版本的嬗遞。如果說陳耀東之文是寒山詩國內接受史研究的話, 王慶雲的〈論寒山詩及其在東西方的影響〉(《煙臺師院學報》, 1990 年第 1 期) 則是篇寒山詩國外接受史研究, 只是顯得單薄了一些。孫映達的〈寒山子思想真相〉是作者在第五屆唐代文學年會上的發言。他以寒山留下的詩偈將這位撲朔迷離的詩僧生平分為三個階段: 從歸隱到棄世學仙; 學仙不成, 精神苦悶; 由道入釋, 證得「真如」。作者認為, 其佛學思想大抵以大乘禪宗為歸依, 時間大概是大曆間人。〈寒山子身世考〉(《東南文化》, 1994 年第 2 期) 的作者嚴振非用《隋書》、《北史》與寒山詩相印證, 認為寒山子即隋煬帝時的滕王楊銑之子楊溫, 約生於隋文帝開皇三年(584), 卒於唐武后長安四年(704), 活了一百二十多歲。因作《零陵賦》被煬帝流徙海南, 後隱居浙東天臺山, 其考證可謂別出心裁。對齊己的研究曾於一九九一年十月在湖南益陽專門召開過研討會, 對其生平詩作進行研討, 有三十多位學者參加了會議, 可見齊己研究在大陸的規模。蔣力余將齊己的詩風概括為「清淡平和」、「清拔高雅」、「清幽冷峭」和「清新自然」四個方面, 詩風的形成則與他的佛學修養、禪林生活、高潔人格有關, 也受傳統詩風影響(〈試論齊己的清美詩風〉, 《船山學刊》, 1997 年第 1 期)。在貫休研究方面, 歷來對其生平行蹤眾說紛紜, 戴偉華〈貫休行年考述〉(《揚州師院學報》, 1992 年第 2 期), 對貫休的字、號、籍貫、別集、行跡交遊進行考述。田道英的〈貫休生平繫年〉(《四川師院學報》, 1999 年第 4 期) 亦對其作出新考。戴偉華曾依據其〈獻錢尚父〉詩說貫休在乾寧元年與錢鏐有交往, 田則認為〈獻錢尚父〉非貫休詩, 並據吳融〈西岳

⁹⁰ 關於此書的成書經過和價值, 見本文「九十年代成就」的第二部分。

集序〉和貫休的〈送吳融員外赴闕〉，認為貫休在江陵依成內最遲不遲於乾寧二年初。田道英文還將貫休的詩作加以繫年。王定璋的〈骨氣渾成、意境卓異〉（《西南民院學報》，1990年第2期）則對貫休的其文其詩作了全面的探討，但其文偏於內容方面的探討，意境方面似談得不多。貫休自編《西岳集》收詩逾千首，《全唐詩》及外編共錄其詩七百五十八首，佚句十二。劉芳瓊〈貫休詩歌訂補〉（《文獻》，1991年第3期）對此詳加考訂，得貫休存詩七百三十首，佚句九句。對皎然的研究，八十年代曾集中於對《詩式》的研究，九十年代在這方面繼續有論文面世，如陳金澤、畢萬忱的〈蒼萃前人，濫觴後世〉（《社會科學戰線》，1991年第3期），姜光斗的〈論皎然詩歌美學〉（《佛理·唐音·古典美學》中的一章，南京出版社，1991年）等。對皎然的生平、交遊考論亦已展開。如張靖龍〈皎然生卒年考〉（《唐代文學研究》（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考其生年約是玄宗開元八年，卒為德宗貞元二十一年。賈晉華則考皎然並非是謝靈運的後代（〈皎然非謝靈運後裔考辨〉，《江海學刊》，1992年第2期）。

道教與唐詩研究的結合 八十年代這方面的論文較少，九十年代除了在數量上大量增加外，研究視角和研究手段上也有所拓展和變化。

一是繼續道教對唐詩的影響研究，但比起八十年代研究面有所擴大，也有所深入。鍾來因在李商隱與道教關係方面有一系列論文，八十年代有〈唐朝道教與李商隱愛情詩〉（《文學遺產》，1985年第3期）等，認為李商隱的詩歌〈安平公詩〉、〈李肱所遺畫松詩〉、〈燕台〉、〈碧城三首〉等是描述他在玉陽山學道的情形以及其間與女冠的戀愛悲劇。進入九十年代後有〈李商隱玉陽之戀補正〉（《中州學刊》，1998年第4期）等，對此進行進一步考索。黃世中則從泛論李商隱其人其詩與道家關係擴大到整個唐代詩人和詩風，如〈論中晚唐文人戀情詩中的仙道情韻〉（第十屆中國唐代文學年會論文，2000年），〈論唐代詩人的崇道狂迷〉（《唐代文學研究》（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論唐人醉酒詩中的「道味」〉（《唐代文學研究》（六），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論唐人山水詩的道意〉（《益陽師專學報》，1994年第1期）、〈論唐代道蘊詩的審美情感〉（《溫州師院學報》，1994年第5期）等。〈論中晚唐詩人戀情詩中的仙道情韻〉列舉了中晚唐文人戀情詩中所蒙上的種種仙道情韻：「葛洪有婦、王母有夫」，神仙皆盡靈匹；道俗雜處，文士與女冠生死相戀；士大夫之豔遇、婚外偷情而假託遇仙等等，至於形成這種仙道情韻的原因，作者在〈論唐代詩人的崇道

狂迷〉中列舉大量唐詩和史料為證，指出「唐人對功名祿位、金錢女色、長生不死的追求，以至宣泄心中的失意淪落，獲得某種心靈上的自慰，正是唐人道教狂迷的主觀原因」；其客觀原因則是最高統治者皇帝、節度使們身體力行的大力提倡。文章還從新、舊《唐書》、《全唐詩》、《全唐文》、《唐才子傳》中搜尋出除四十多位道士、女冠詩人以外的杜淹、魏徵、王績等六十四位崇道詩人，並初步開列出他們生平和存詩情況。〈論唐代醉酒詩中的「道味」〉則專論唐代詩人醉酒詩中的仙道情味作者認為，飲酒是「詩人通趣」，「唐人某些醉酒詩所表現出的心理情愫及其外射的種種具象行爲，可以明顯看出受道教思想濡染的各種特殊心理態勢，其中最根本的是對現實支配法則的蔑視和反抗」；任心自適、不求當世，追求復歸自然，這種「唐人醉酒詩的又一種心理態勢，往往是『道味』中的神品」；「哀歎人生短暫，憂生念死；借酒避禍、畏禍托醉而得全於酒，是唐人醉酒詩中一種特殊的心理態勢，也是醉酒詩中道味較濃的一類詩」。類似的研究還有徐希平〈杜甫與道家及道教關係再探討——兼與鍾來因先生商榷〉（《杜甫研究學刊》，1999年第2期）等。研究唐代文學與佛學關係的專家孫昌武在二十世紀結束時，出版了一部探討道教與唐代文學關係的專論——《唐代道教與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二是從八十年代的影響研究移到對道士、女冠詩人和遊仙詩之類作品的研究。黃世中近年來在道教與唐詩的關係研究上頗有心得，除上面提及的影響研究外，還有專著《唐詩與道教》（瀟江出版社，1996年）和對道士詩人的專論〈佯狂玩世與獨醒心態——《全唐詩》道士詩人醉歌透視〉（《江淮論壇》，1994年第5期）等。葛兆光在九十年代專注於道藏的研究，論文〈道教與唐代詩歌的語言〉（《清華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則是他「十年來讀道藏」的心得之一。作者認為「古奧華麗的語言，豐富神奇的想象，深沈強烈的生命意識和追求自由幸福的願望，這就是道教給予唐詩的影響」。文中還對道士韋渠牟、劉商以及受過「道符」的顧況的創作傾向和詩歌語言進行了剖析。蔣寅〈吳筠：道士詩人與道教詩〉（《寧波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對這位盛唐道士的生平、詩歌創作及藝術風格進行了考論。文章認為吳筠年輕時代所學甚雜，並不專於道家，「只是經由某個契機比如應舉的失意，才篤志於求道的」。其詩在內容上以道為體，以儒為用，是列仙之趣的代表。「詩的結構乃至筆調也與謝靈運的模式疊合起來，具有濃厚的沈思性質。這沈思不是哲學式的懸想，而是近乎迷醉的幻想」。雖不乏社會批判，

但主要是全身遠害。吳筠詩歌在藝術形式上的特點有三：偏愛五言和古體；喜作聯章組詩；富有浪漫幻想色彩。李乃龍的〈唐代遊仙詩若干特質〉（《陝西師大學報》，1998年第3期）、〈道教上清派與晚唐遊仙詩〉（《陝西師大學報》，1999年第4期）是兩篇關於唐代遊仙詩的專論。前文對唐代的遊仙詩進行了分期，分析各個階段的特徵以及李白、曹唐遊仙詩的價值。作者認為從貞觀時代以俗世否定神仙，到王勃對仙道關係的再確認，再到陳子昂自覺地從入境生出對仙境的向往，這就是初唐遊仙詩演進的軌跡。中唐時代的遊仙詩折射出安史之亂後的社會和士人心態。疲弱的中唐社會已不能給遊仙詩人的想象之翼注入天外恣意飄揚的力量，只好撲騰於市井閭巷之間，這與盛唐遊仙詩恰恰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晚唐的曹唐是繼郭璞之後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以遊仙詩著稱的詩人。他的大遊仙詩是仙話和遊仙詩的第一次結合；他的小遊仙詩既是對傳統遊仙詩的集成，又把仙人仙境作了人間化處理，在那個虛幻的社會中注入了超現實的理想。後文則考析了唐代最大的教派上清派的方術觀、等級觀、空間觀和道釋兼容觀，對以李商隱和曹唐為代表的晚唐遊仙詩的浸染。李永平〈游仙詩死亡再生母題〉（《陝西師大學報》，1997年第4期）考察了中國歷代遊仙詩中水死成仙、蟬蛻、羽化、進入神秘仙境等死亡再生母題，其中提到李白的〈古風〉和曹唐的遊仙詩。文章認為這一母題源於亙古以來人類必死所產生的死亡意識，「一方面通過『水死』、『蟬蛻』、『羽化』、『入仙洞』等與死亡再生母題相溝通；另一方面，又通過道教與上古神話中的『崑崙』、『華胥之國』、『懸圃』、『蓬萊仙境』相聯繫，其本質思想還包含著遊仙詩作者在異化社會裏對理想社會的眺望」。

三是道教典籍和道教活動等本體研究開始起步。葛兆光〈「神授天書」與「不立文字」——佛教與道教語言傳統及其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影響〉（《文學遺產》，1998年第1期）指出佛教與道教在傳播方式上有著明顯的不同，佛教徒在理論上認可一種蔑視語言文字的觀念，不確立書寫文字在意義傳遞上的絕對性；道教的「神授天書」傳說卻是在製造關於書寫文字的神話，並賦予書寫文字以經典的權威性。這兩種不同的傳播方式，對中國古典詩歌都產生很大的影響，佛教不確立文字的權威性，成了六朝經隋唐至宋元佛教文學的主流，受佛教影響的詩歌多偏向於自然流暢，與口語相近。道教的那些夾雜了古典故和生僻漢字的讚頌，形制怪異難以認識的符咒，充滿神異色彩而且來歷久遠的祭祀儀式，常常使普通信仰者處在一種震懾與顫慄的心境中，也常常使那些有古典知識的信仰者感到又回到了自己所熟

悉的古典文化氛圍中，不僅擁有了自信，也擁有了文化的傳統和特權，於是在詩歌中也不免總是要模仿這種古奧與神秘。作者說：「我總覺得，唐代文學史上那幾次復古主義風潮，多少都有一點道教信仰的隱約背景；後來以文為詩或以學為詩的知識主義風氣，也多少與道教傳統有一些隱約的聯繫，像唐代詩歌中那些詰屈聱牙的澀僻文詞……古奧的意象……瑰麗濃烈的色彩……多少都與道教的符籙圖咒以及道教的神仙傳說有關。而唐代凡是詩歌風格多少有些綺麗神奇、詭秘變怪的詩人，如陳子昂、李白、顧況、李商隱、李賀也多少都有一些道教的經歷和經驗。」作者從道教的傳播方式以及這種方式造成的心態，來解釋唐代復古思潮和險怪綺麗詩風的形成，實為首見。毛水清的〈李白煉丹考〉結合唐代的煉丹術，對李白從事煉丹活動的地點、具體方法、師承、道友一一考釋，指出煉丹活動幾乎貫徹了李白的一生，至老不疲。葛景春的專著《李白與唐代文化》和郁賢皓的專著《天上謫仙人的秘密——李白考論集》，對領受《道籙》後李白的心態和所從事的道教活動進行了考論和分析。汪泛舟〈敦煌道教詩歌補論〉（《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首次對雜陳於敦煌道經和齋醮儀式中的道教詩歌的內容、特色、形式和途徑進行整理和分析，旁及道士、女冠的一些涉道詩和遊仙詩。作者舉齋醮儀式中的〈禮方十詞〉、〈步虛詞〉、〈唱和歌〉、〈祭神詩〉為例，分析他們分別在齋醮儀式中的作用以及所特有的神秘和信仰色彩。作者另有一篇論文〈敦煌道教與齋醮諸考〉（《1994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對藏於敦煌的四百多件道家文獻進行全面論述，〈補論〉則是專論詩歌。王立〈道教與中國古代通俗小說中的天書〉（《東南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以皇甫枚《三水小牘》、《雲合奇蹤》等小說為例，指出「天書」在英雄傳奇、造反興事這類小題材的形象塑造、情節展開以及懲惡揚善教訓意旨的表達上，有著幾乎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而「天書」這一母題的形成，與「先秦的兵家文化、秦漢神仙方術及此後的隱逸文化」，與「作為新道教的天師道」對道教的改進，「與書法藝術相關的扶乩」都不無關係。

四是研究面有所拓展，在個案研究的同時，開始注意道教與唐代文學的某個時段、某種體裁、某種表達方式、某種思想傾向之間的關係。葛兆光在八十年代初就有〈道教與唐詩〉（《文學遺產》，1985年第4期）論文發表，在這方面起步較早，九十年代初又有專著《道教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問世。作者從自然、社會和人三者關係這個廣闊的背景出發，來探討道教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和自身的演變規律。其「中編」主要談唐宋時代的文化嬗變與道教

的關係。作者認為巫覡本色；向老莊佛禪靠攏成為士大夫道教；與封建倫理聯姻，是唐宋時代道教的三種趨向。從唐太宗貞觀十年到玄宗李隆基時代則是道教的第一個鼎盛期。其原因是道教享受現世生活和追求長壽的主張與初盛唐社會洋溢的歡樂、熱情、浪漫的社會心理合拍，又加上統治階級提倡。葛氏另有〈從出世間到入世間——中國宗教與文學理想世界主題的轉變〉（《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則把研究範圍擴大到包括佛、道在內的整個宗教與文學關係的探討。作者認為其演進規律是由「天堂、仙境、極樂淨土」這種出世的理想境界，轉向老子「小國寡民」、《禮記·禮運篇》以及陶淵明〈桃花源記〉等入世理想。作者並指出，理想世界在文人心目中的轉向並不是一種偶然孤立的現象「在它背後有極濃的宗教背景」，道教的理想境界中實際上有非常世俗化的享樂主義傾向，這種「世俗享樂主義因素對過去理想世界主題的滲透是一種強烈的腐蝕劑」，而「佛教中關於宇宙與人生的哲理則是對過去理想世界主題的一種極強的融化劑」。申載春〈道教與唐傳奇〉（《山西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則從整體上把握唐代傳奇與道教的關係。朱易安〈中唐詩人的濟世精神和宗教情緒〉（《江海學刊》，1998年第5期）探討了釋道思想和當時的文學變革、詩人們的濟世精神關係。作者不同意把這種救弊變革的熱情和文學革新運動看成是儒學傳統和儒學重振的結果，而把士人變革失敗後與釋道的交往看成是消極的舉動。作者以白居易、韓愈、劉禹錫等著名詩人為例，證明宗教情緒不僅使他們的詩歌技巧和詩歌風格得以發展，也與他們的濟世精神互補。儒、釋、道在當時士人的實際生活中形成一種相互交融、相輔相成的關係，並導致了中唐士人採用了儒學為體、釋道為用的實用主義生存方式。

但總的來說，道教與唐詩研究，目前開展的還不夠廣泛和深入。除了一、兩本專著外，多是用單篇論文的方式，或是對某一作家的思想中的道家傾向，或是對其部分作品的老莊成分進行關係研究。涵蓋面還不夠廣，整體的把握也還不夠。對道家詩人及女冠詩的研究剛剛開始；對唐代遊仙詩、煉丹詩、送宮人入道詩、葵花詩、仙道類小說的研究有的剛起步，有的還未觸及；對道藏、道曲的研究和從中梳理出唐詩、唐代詩人行蹤，也似未見有成果問世；至於一些道教活動和道教儀式對社會包括對作家生活、創作和心靈的影響，不同的道教流派對詩人及詩人群落的不同詩風形成的影響研究，更是很少觸及。至少還沒有看到象臺灣學者李豐楙等對道教傳說、道教齋儀那種很深的體悟；在唐代文學與道教傳說、道教齋儀間梳理出一

條道教與文學互動的關係史；以及像李氏《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這樣的系列專著。

唐詩與音樂、舞蹈及繪畫關係研究 唐代文學與音樂的關係研究過去多集中在詞源和詞體方面，如程杰〈論詞所體現代音樂精神〉（《學術研究》，1987年第6期）、周延良〈隋唐燕樂與詞的關係〉（《文藝研究》，1996年第2期）等，但近年來從詩歌的角度多了起來。除了朱易安的《唐詩與音樂》（灑江出版社，1996年）外，還有〈細故末節論唐音〉（《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五次年會論文》，1990年）一文，從研究史的角度，認為明代格調派研究唐詩的最大貢獻就是發現了唐詩藝術本身的特殊品性——詩歌語言的音樂性，並揭示了這種音樂「符號」所表現的詩人「性情」的全過程。李楊〈唐代音樂詩的文化解讀〉（《東方叢刊》，1995年第2期）從音樂與文學的合流這個獨特的角度來分析唐代音樂詩的文化內涵和在文學史、文化史演進過程中獨特的文化意義。據作者統計：《全唐詩》中描寫樂器和器樂的詩篇約三百首，其中詠琴者約一百二十首，詠笛者約三十首，箏、篳篥、鼓、鐘、簫等其他樂器者有數十種，描寫音樂家達數十人，描寫聽歌賞樂者更多達四百首左右。它所表現的文化內涵有知音情結（如白居易〈琵琶行〉）、家園意識（如李白〈春夜洛城聞笛〉）和追憶衝動（如李商隱〈銀河吹笙〉）這三個方面。它給後人的文化啓示亦有三個方面：一是音樂詩只是將詩的筆觸深至音樂領域，詩與樂的共同審美選擇仍是一個不斷探尋、建構詩體的過程，仍舊未從本質上為詩的肌理輸送音樂性的質素；二是音樂詩有著自身不可避免的審美局限和創作局限。音樂詩往往沒有形成像田園山水詩派那樣的創作規模，亦沒有田園山水詩派那樣較為穩定的創作範式或創作風格。音樂詩創作上的特殊性，決定了唐人音樂詩創作總體上不是太圓滿的；三是唐代音樂詩呈現出濃郁的異域情調，這本身又一次昭示了唐代大文化環境的寬容性、開放性和消融性。張志烈〈杜甫詩文中的音樂世界〉（《杜甫研究學刊》，1998年第4期）舉〈朝享太廟賦〉、〈有事於南郊賦〉、〈封西嶽賦〉為例，認為在杜甫的「意識中，有一個與其政治主張相一致的理想的音樂境界」；又舉〈吹笛〉、〈聽楊氏歌〉等詩作為例，證明「杜甫不僅意識中有理想的音樂境界，而且鍛煉出高度敏銳的鑑賞能力」。而這兩個方面，是杜甫「深入理解並研究傳統詩樂理論的精華，有豐富的樂舞觀賞經驗，再加上自己一定程度的直接藝術實踐」這三個方面結合的產物。杜甫音樂詩中膾炙人口之作，當

推對當時三位歌舞明星——李仙奴、李十二娘、李龜年的詠歌。這方面的論文還有葛景春〈李白詩歌與盛唐音樂〉（《文學遺產》，1995年第3期）、鄧惠明〈唐代音樂詩審美價值分析〉（《西藏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吳相洲〈論初唐人對近體詩律的探索與詩歌入樂的關係〉（第十屆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年會2000）等。

唐詩與舞蹈的關係研究，張明非除了專著《唐詩與舞蹈》（灑江出版社，1996年）之外，尚有論文〈唐代樂舞詩的藝術成就〉（《廣西師大學報》，1994年第3期）專論唐詩中的樂舞詩。文章認為唐代的樂舞詩是唐代高度發展的詩歌藝術與舞蹈藝術相結合的產物，也是唐代一些詩人個人愛好與擅長的產物。這批樂舞詩的藝術成就表現在，產生了一批像〈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等名篇佳作；運用恰當的動詞、生動的比喻以及動靜相生等手法，藝術地再現舞蹈的動態美；使用多種修辭手法和景物描寫，創造審美意境，將舞蹈形象轉化為詩的美學形象。作這方面較為深入探討的論文還有趙文潤〈隋唐時期西域樂舞在中原的傳播〉（《陝西師大學報》，1997年第1期）、耿占軍〈《唐代舞蹈》關於「燕樂」流變正誤〉（《唐都學刊》，1997年第1期）、劉陽〈唐詩中所見外來樂舞及其流傳——兼論唐人詩中的「何滿子」〉（《中國比較文學》，1996年第2期）等。

唐詩與繪畫的關係仍多集中在王維詩歌「詩中有畫」的探討上，且重複較多，如徐伯鴻〈論王維寫景詩以畫法入詩法的成因〉（《信陽師院學報》，1994年第1期）、雨田〈王維「詩中有畫」的藝術特色〉（《文史知識》，1994年第4期）、徐正安〈一動一靜天地間——論動靜畫理在王維寫景詩句中的運用〉（《信陽師院學報》，1993年第2期）、趙玉禎〈王維詩「詩中有畫」成因〉（《江蘇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賈春〈淺論王維詩歌藝術性——以畫法為詩法〉（《文科季刊》，1993年第2期）。但從八十年代起，有的文章已不是就前人之定論進行演繹和探討，而是逆向思考或橫向擴散。如姜光斗、顧啓〈王維山水詩藝術初探〉（《重慶師院學報》，1981年第3期）認為傳統的「詩中有畫」提法只表現了王維詩歌融合繪畫藝術這一面，忽略了他融合音樂、書法等藝術形式。葉式生〈淺談王維山水詩的成就〉（《湘江文藝》，1978年第1期）則認為王維的山水詩中不但「詩中有畫」，而且「詩如電影」，是畫面、動作和音響的多重組合。蔣寅則對「詩中有畫」這一傳統之說提出質疑，這在前面已做介紹。

九十年代更有一批論著開始從總體角度來探討唐詩與繪畫的關係，如陶文鵬

《唐詩與繪畫》（灑江出版社，1996年）、王啓興〈唐代詩人與繪畫〉（《唐代文學研究》（七），廣西師大出版社，1997年）等。王文論述了唐代繪畫藝術空前繁榮和發展的情況，唐代詩人對繪畫藝術的熱愛，他們觀畫、求畫乃至作畫，並在這一審美實踐中產生了大量的題畫、詠畫詩。作者指出：「唐代詩人觀賞繪畫之後創作的詩文，是他們另一種形式的精神文化活動，與唐詩的繁榮關係至密。值得重視的是，唐代繪畫藝術的發展，畫技的進步，對詩人的詩歌表現藝術有重大影響，這又是應深入研究的課題」。陶文鵬〈傳神肖貌，詩畫交融——論唐詩對唐代人物畫的借鑑吸收〉（《文學評論》，1994年第6期）就是這個課題的深入，他從唐代人物畫與唐詩中人物形象描寫之間「相互感應和彼此借鑑」的關係這個側面，來探討唐詩和唐人繪畫之間的互動。作者認為，唐代繪畫中寫貌人物風氣的盛行，使得唐代的詩人普遍對人物畫有濃厚的興趣。或同人物畫家交往，或寫人物畫贊和記序，或以人物畫為審美對象，大量創作題畫詩，或本身就能創作人物畫。通過這些，詩人們「潛移默化地積澱了繪畫意識，培養出描寫人物形象的興趣，更鍛煉了運用詩歌語言捕捉人物的形象特徵從而揭示其內在精神的能力」。文章還分析了唐代人物畫的發展趨勢，精神風貌由初盛唐代干世濟世漸變為中晚唐代傲世憤世、避世出世，創作題材則由宮廷走向民間，宗教繪畫的日益世俗化，這在杜甫的〈醉中八仙歌〉、元稹的〈象人〉、韓愈的〈華山女〉等詩作的人物描寫或題畫詩中也得到相互感應。陶氏還有篇〈論李賀詩歌的色彩表現藝術〉（《文學評論》，1997年第6期），談繪畫的色彩在賀詩中的表現。關於山水詩與山水畫關係的探討論著要多一些，如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中的〈中國山水詩的藝術脈絡〉、馬秀娟〈王維與謝靈運山水詩之比較〉（《唐代文學論叢》（七），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韓經太〈論唐人山水詩的演生嬗變〉（《文學遺產》，1998年第1期）等。〈王維與謝靈運山水詩之比較〉中用來比較和判別的一個重要依據即是繪畫理論。作者指出：「盛唐山水詩較之南朝山水詩的突出變化可以說是由『以形寫形』發展成為『以形寫神』。」，這一變化與當時人們審美標準的轉變密切相關，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提出「以形寫神」，南齊謝赫《繪畫六法》的第一法就是「氣韻生動」，宗炳在《畫山水序》中提出「暢神論」。而盛唐山水詩「完美成熟的重要標誌就是以形寫神代替了以形寫形」，作者列舉了李思訓的繪畫理論，杜甫的題畫詩和王維的大量詩作加以證明。陳華昌的〈唐代題畫詩的美學意義〉（《唐代文學研究》，廣西師大出版社，1990年）從

題畫詩這個單一角度來探討這類詩歌的美學意義。

但是，唐詩與音樂、舞蹈及繪畫關係研究多為單一性研究，有的雖是專著，但多為一般性的介紹，缺乏深入的探討。至於系列性的論著，群體式的關注和集中式的討論，似乎還未形成氣候。另外，從現有的專著和論文來看，也多為總體式和寬泛式的，如何具論某一作家、某一群體、某一流派的創作傾向與舞樂的關係，這種影響和互動的脈絡和發展演變規律又是如何，也還有待於將來。

8. 研究手段的多樣化

比起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對新研究方法的引進和運用，有兩方面的長足進展：

從引進者來說，已克服了八十年代的浮躁，不再急功近利、盲目引進、囫圇吞棗、生搬硬套；也不再對此焦慮困惑、感到無所適從，而是立足於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廣闊而深厚的背景，去尋求與此相契合的表達體系。從批評者來說，儘管一部分學者仍堅持八十年代以來的否定態度，但多數學者基本上已不再排拒，而是以一種平常心 and 寬容的精神來對待；也不再計較方法的新與舊，「而是看他是否切合研究對象，是否解決實質問題。為了解決一個問題完全可以中西結合、古今結合，各種方法交替使用、並駕齊驅」^①孫昌武認為：「研究方法應多種多樣，每種方法都宜重視。國外有很多新的方法，我們掌握得並不夠。微觀、宏觀兩種方法是早就存在的，今日之宏觀研究實際是從五十年代之以史帶論演變而來，二者應結合，不宜割裂。」^②陶文鵬也提倡多樣化的研究方法。他以唐詩藝術研究為例，指出中國傳統的研究方法如注重整體性、直觀性、經驗性、模糊性等「當然要繼續運用，在運用中加強具體的分析、邏輯的論證，理論的闡發，以彌補其不足，使研究成果更系統化、更有科學性。我們也提倡廣泛地運用諸如文本分析、心理分析、定量分析、系統論、符號學、語義學、範式論、接受美學、結構主義、比較研究、審美發生學等新的科學方法」，「其目的是要取得新的審視角度、新的思維方式，尋出新的研究課題，從而發掘出新的內容，獲得更深刻的見解」^③。在第九屆全國唐詩年會上，一些學者還以王國維、陳寅恪等大師如何將傳統治學方法與當時的新方法結合起來

^① 轉引自杜曉勤：〈關於唐代文學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99》，頁 70。

^② 轉引自尚永亮：〈唐代文學研究應朝什麼方向發展〉，《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99》，頁 66。

^③ 陶文鵬：〈唐詩藝術研究的現狀和思考〉，《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1999》，頁 31。

爲例，說明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要學習、借鑑國外的研究方法，而是如何使之切合我們的研究課題，如何與我國傳統治學方法相結合⁹⁴。傅璇琮的〈唐初三十年的文學流程〉（《文學遺產》，1998年第5期）就是在傳統研究方法上的新變。作者把丹納的詩人群體意識和地域文學理論與中國傳統的考據索引結合起來，用一種編年方式，把不同地區作家的不同活動，放在同一時空背景下加以考察；在一年一年的時間推移中去發現文學流變的規律，從而提供了一個整體的時空新視角，便於對這個時代的文學風貌和流變規律綜合和整體地認識和把握。由於這種認識和把握是建立在札實的人文資料的考辨、排比之上，因而又顯得詳實可信。

在新的研究方法的具體運用上，較多使用的是比較研究的方法，其成果也最多，有不同時代不同作家的比較，如盛唐與中晚唐詩風比較，唐代古文運動與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比較，杜甫與白居易樂府詩的比較，韋應物、柳宗元五言古詩的比較；有同一時代風格相近的作家作品間的比較，如高適、岑參邊塞詩的比較，元、白比較；韓、孟比較等；也有不同國家但風格相近的詩人詩作比較，如李賀與波特萊爾，《長恨歌》與《歡喜國王緣》之間的比較等。九十年代後期更多地出現了不同創作群體和不同文學體式間這種範圍更寬泛的比較。如胡遂的〈論唐宋詞創作旨趣的發展演變〉（《文學遺產》，1999年第3期）即是從審美追求入手用比較的方法探討唐五代詞和宋詞的區別和兩者之間的流變。作者以「以色爲詞、以趣爲詞、以韻爲詞、以氣爲詞」這種新的分類方法來取代傳統的「以文爲詞、以詩爲詞、以論爲詞」，爲唐宋詞研究提供了一個新視角。程國賦〈唐傳奇於元雜劇相關作品比較〉（《學術研究》，1997年第2期）對現存的由唐傳奇改編的元雜劇，分別從科學觀、婚戀觀、市民觀三個方面加以比較，並分析了產生這些變化的原因，武漢大學張思齊的〈白居易閒適詩與基督教聖詩比較研究〉（《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屆年會論文》，2000年第10期）等，這種同源跨類比較，能加深我們對本體的認識。

另一種運用的比較多的是美學以及心理分析法，如孟修祥的《謫仙詩魂》（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董乃斌《李商隱心靈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陳友冰〈論李賀的抑鬱氣質與躁動心態〉（《江淮論壇》，1993年第3期），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等。董

⁹⁴ 杜曉勤：〈關於唐代文學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學研究年鑑1999》，頁70。

乃斌的《李商隱心靈世界》主要採用符號系統來破譯李商隱詩歌的情感特徵和其中的潛意識，這在前面已加例舉。陳文忠的《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是本將接受美學理論運用於中國古典詩歌研究的專著。全書四編基本上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編是闡釋構建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的理論方法體系。作者認為，詩歌創作和詩評、詩話雙線是中國詩史的獨特景觀，而歷代詩話的實質就是歷代詩歌的原始接受史。根據接受主體的不同，這種研究可分為四類：以普通讀者為主體的效果史研究，以詩評家為主體的闡釋史研究，以詩人創作者為主體的影響史研究，以及從接受史切入的詩學理論研究。其餘三編則是分別從闡釋史、影響史和詩學沈思史三個角度，通過對〈孔雀東南飛〉、〈飲酒〉、〈長恨歌〉、〈琵琶行〉、〈楓橋夜泊〉等不同性質、不同種類的「單個作品」微觀接受史研究，來揭示接受史研究的多種方法、途徑和多樣的可能性。對我們的唐詩研究，可提供一些新的視角和新的思考。例如作者通過大量資料證明白居易的〈長恨歌〉在唐代是選家沈默，評家毀多於譽。這「表明此作在當時只有流行性而無經典性，沒有真正進入『理想讀者』的審美視野」。究其原因，又不在作品本身，而是由於「當時並未確立敘事觀念」，因而對其詩的敘事特徵和價值缺少認識⁹⁵。尚永亮的〈人生困境中的執著和超越〉（《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屆年會論文》，2000年10月）則從對屈原、賈誼、陶淵明的接受態度來分析中唐貶謫詩人的心態。孟修祥的《謫仙詩魂》則著重從氣質、心理、個性等內在精神來重新解讀李白。對人們所熟知的詩人種種行爲，如好酒、慕仙、懷鄉、崇拜遊俠和歷史人物，對女性美的禮贊和婚外情等，皆從獨特的心理分析予以解析。美學和心理學的分析方法，除上述的論著之外，論文方面則有霍然的〈初唐四傑與唐人詩歌審美觀念的回歸〉（《東嶽論叢》，1996年第4期）、王富仁〈心理距離與情感接受——孟浩然〈春曉〉詩賞析〉（《名作欣賞》，1995年第5期）、許總〈衰世立足點的盛世回味——論大曆詩人的懷舊情結藝術表徵和時代特徵〉（《浙江學刊》，1996年第5期等）。

除此之外，還有部分學者採用統計學、語言學批評、原型批評和結構主義等方法。如趙謙〈杜甫五律的藝術結構與審美功能〉（《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4期）以結構主義研究方法將杜甫的五言律詩結構歸納為起興、客觀、雙線、縮連、比較、意象鏈等結構形式；劉明華《杜詩修辭藝術》（中州古籍出版社，

⁹⁵ 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97。

1991年)從語言學角度來研究杜詩的藝術成就;謝思煒〈杜詩解釋史概述〉(《文學遺產》,1991年第3期)從「倫理的解釋」、「詩意的解釋」等七個方面來闡釋杜詩史;吳相洲〈從系統論看盛唐之音〉(《北京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則從系統論出發,指出盛唐之音是個複雜的系統,它包括「興象玲瓏」、「骨力適勁」、「神采飄逸」、「平淡自然」四種內容,是由詩人的行為風範、思想性格、構思方式、審美觀點六種因素在同一個層次上作用的結果⁹⁶。劉尊明《唐五代詞史論稿》(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年)的最後一章則是用宏觀研究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二十世紀唐五代詞研究在總量、時代分布,選題、內容分布,文獻整理和研究方法以及詞學理論方面的特徵和成就,這些都是借鑑新方法研究唐代文學比較成功的嘗試。但總的說來,在運用新學科、新方法來研究唐代文學,對其學科和方法的深入理解和運用上妙合和熟練程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相當一部分的運用新方法的論文來說,八十年代學風上的一些不良風氣也還沒有完全消除。「有些論著搞外國文學理論的新名詞新術語的狂轟濫炸,生搬硬套,削足適履,將理應使人獲得審美趣味和審美思考的藝術研究,搞成以艱深文飾淺陋、空洞無物、索然寡味的文字垃圾」⁹⁷。有些學者對新方法引用的批評和前途的擔憂,也不為無因。

⁹⁶ 以上參用張明非:〈九十年代以來唐代文學研究回顧〉,《唐代文學研究年鑑1999》,頁41。

⁹⁷ 陶文鵬:〈唐詩藝術研究的現狀和思考〉,《唐代文學研究年鑑1999》,頁31。